

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8.05-2018.07)

文研通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8年第3期

2018年第3期
总第八期



总第八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八期（2018年5月—2018年7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周诗雨
编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目录

01 专题报道

- 邓小南院长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
会议上的汇报 02

06 文研学术

(一) 北大文研讲座 08

- [79]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19 世纪明治时
代日本人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
的看法 08
- [80] 戴木德：南太平洋上的中国天文系统？——
使“地”顺应于“天”的南岛扩张 10
- [81] 大卫·阿米蒂奇：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
时间和过去的未来 14
- 大卫·阿米蒂奇：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
球视域下的大西洋 18
- 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23
- 大卫·阿米蒂奇：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
主义与内战 25
- [82] 辛德勇：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与中国古代
的活字印刷 30
- [83] 叶启政：韦伯之“理念型”中的方法论与认
识论 35
- [84] 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37

- [85] 约翰·基恩：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41
(1927)
 - 约翰·基恩：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 45
 - 约翰·基恩：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 48
 - 约翰·基恩：娜迪亚·乌碧娜蒂《代议制民
主：原则与谱系》(2006) 52
 - [86] 郑振满：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
碑铭解析 55
 - [87] 杨建华：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58
 - [88] 赵刚：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
真 1960 年的一篇小说谈起 61
 - [89] 王庆节：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康德哲学的批
判之批判 65
 - [90] 涂逸珊：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 69
 - 涂逸珊：纪念死者的方式 73
 - 涂逸珊：性别文化构建与蒙古历史：一项
关于性别的研究 76
 - [91] 孙歌：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 79
-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83
- [34] 杜正贞：诉讼档案、民间文献与普通人的
历史——龙泉档案研究的尝试 83
 - [35] 段德敏：托克维尔论自由与权威 86
 - [36] 王彦晶：知识的逻辑——从哲学到人工智能 90

(三) 北大文研论坛 93

- [64] 周锡瑞等：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陕甘宁边区的
起源 9
 - [65] 郑振满、赵世瑜等：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
制度的延续性 98
 - [66] 韩潮等：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
折路径 102
 - [67] 陈平原等：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107
 - [68] 叶启政等：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
学经验研究 113
 - [69] 严志斌等：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 116
 - [70] 郭志刚等：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 121
 - [71] 叶炜、孙正军等：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 126
 - [72] 张治等：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 134
- ### (四) 文研汇讲 138
- [01] 高波：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
新运用 138
 - [02] 戴海斌：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
札》为讨论线索 140
 - [03] 杨建华：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 142
 - [04] 苏芑：从司马迁到张文虎——《史记》文
本的转续与更迭 144
 - [05] 孙歌：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 147

- [06] 郑振满：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 149

(五) 文研读书 151

- [11] 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
建——《甯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
建》新书研讨会 151

(六) 静园雅集 156

- [21] 陈海涛：精神与图像——敦煌北魏二五四
窟中的华夏美学 156
- [22] 冷冰川、周晨：新变里的传统——大书《冷
冰川》品读会 158

(七) 菊生学术论坛 160

- [09] 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60
- [10]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历史 172

178 静园学术

- 蜀石经三题 180
- 全球史与万民法 183

186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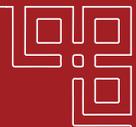
- 文研院邀请学者项目第四期结束 188

194 文研纪事





专题报道



【按语】

6月25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汇报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近两年来的发展情况。我们也特此转发邓小南院长这篇发言的原文，回顾文研院两年所走过的路。

邓小南院长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汇报

2016年9月成立时，我们并不十分明确今后要做什么。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面向未来，我们要为北大文科根本性的发展助力。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学科的简单叠加，真正有影响力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学科板块交互处。院系专注于学科建设，我们应该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建院之初，我们形成了三条原则，迄今一直是努力的方向。

涵育学术，激活思想

学术需要内在的思想力量，思想需要学术的根基，我们觉得，要充分尊重学术发展规律，“涵育学术，激活思想”是文科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大家共同的期盼。在建设世界一流的过程中，北大需要的，

学者需要的，就是我们该做的。创新需要根基，我们应该着重基础学科，搭建一个能凝聚、有厚度、可辐射的学术平台，实实在在地支持学者内心的愿望。这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方向。

所谓“能凝聚”，首先是要凝聚学者，凝聚议题。我们在整合调研的基础上，以“文明：中华与世界”为主题，形成了五大凝聚议题以及两个交叉序列。

在五项凝聚议题之下，我们的学术活动分为不同的系列，例如学术讲座、专题论坛、工作坊、读书班、田野考察、专项展陈、讲述活动，等等。一方面倡导跨学科的前沿对话，辩驳问难；一方面创建阅读思考的氛围，鼓励深耕细作。论坛是最受欢迎的形式，几乎次次爆满，从中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深度对话的期盼。有厚实



邓小南院长

的学术底蕴，有活跃的思想交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涵育”“激活”的宗旨贯彻在各项活动的始终，把我们的学生带到国际学术的前沿。

为夯实学术根基，鼓励潜心读书，我们每周都有多个跨学科的读书班、读书小组在二院活动。

学术需要积累，要有厚度，在大学中，要倡导正气与学脉的传承。青年人是北大的希望。我们郑重安排的未名讲座，都是青年教师主讲。120周年校庆期间，我们组织了讲述活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这一主题是青年教师们自己提炼的。他们说“传承就是一种坚守”，“师之所存，道之所存”，北大让他们感悟到学术生命的厚度和温度，“在这个校园里流动的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说，学术的追寻没有边界，传承不仅在北大传统的意义上发生新旧交替与延续，也跟随

时代走向世界。参与交流的资深教授，将“学缘与校魂”联系在一起，颇带感情地说，学术研究是精神的依托、人生的核心，做学问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北大的文化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民族命运的担当，值得回顾阐扬。我们先后与图书馆、赛克勒博物馆合作，后来也在二院地下空间，办过七场展陈，受到多方欢迎。

我们组织了四次多学科学者参与的田野考察。来自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艺术学、文献学的学者有积极充分的互动，也以此为契机，在地方建立了学科的教学基地。

文研院已经初步具有辐射效应。《北京大学报》每年两期“文研讲坛”，从学术内容、报刊发布到通讯、海报、微信，影响力逐渐有所传播。学术出版也在筹措中。



近者悦，远者来

要真正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前提是要敬畏学术、尊重学者。守正创新，要靠学人坚守，靠学人创新。我们作为没有教学科研人员编制的单位，更要靠“人”的凝聚。文研院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身在北大。学术事业中，学者的活力是决定性因素。

文研院开办前，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跨学科的学者恳谈会，梳理了大家的建议和质疑；我们敞开大门欢迎老师同学，欢迎各种学术见解和学术风格。我们所有活动，都是老师们积极支持的结果。院系老师想到好的主意，常来主动商议；国际学界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是老师们建议

邀请；大家研究中的前沿成果，也愿意在文研院首次报告交流。许多学人在这里结识，有的结成亦师亦友的关系，有的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许多学界老友，也在二院重新聚晤畅谈。

文研院一年多来，已经接受了来自海内外的75名驻访学者，其中包括来自台湾、香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土耳其、日本、新加坡的学者，既有国际知名的高端学者，也有富有潜力的青年学人。

邀访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每周的内部交流，都有他们治学心得的报告，有密集深入的讨论交锋。有多位学者已经或即将在考古文博学院、元培学院开设课程；也有的学者教授奥斯曼土耳其文献；有的参与组织或指导研究生读书，读书班也吸引了不少校外青年学人参加。

对于邀访学者的遴选，我们明确学术标准，从来不带个人色彩。公正严格审核的高淘汰率，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者前来申请。目前有两位来自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青年邀访学者，已经申请到北大入职。

清新风气，一流标准

这些年，学校一直在创新机制，校内新的学术机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有了空间，得以成长。我们意识到，大学建设不能只注重有形的数据指标；一流的开放环境，一流的前瞻思维，一流的沟通方式，

一流的和谐关系，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清新风气，一流标准”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口号，也是内心的追求和行动的指南。

某种意义上说，文研院是体制内的“特区”，学校赋予我们宽松的环境，我们有责任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努力建设气氛自由而精神凝聚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希望建立服务学科、服务学术、服务学者的良性运行机制，为大家创造更好的交流条件。

从建院之初，我们就着手完善各项制度、陆续订立了各类细则，逐渐改进了院内设施。我们活动的“主场”就在二院，全体工作人员都身处一线，都在第一时间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处处从学术出发，从学者出发，坐而论，起而行；有想法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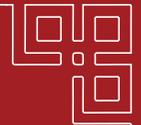
时沟通，有缺失人人补台。靠着这种“合力”，工作也有了“活力”。

耕耘开始有了收获。大家看到校园中需要我们，从教师到助理，在文研院工作有了自豪感。有些原本对建立文研院持质疑态度的老师，成了我们积极的支持者。这也让我们看到，理解是从共同的实践中来，学术自信要靠实在的建设。

今后，我们要脚踏实地，争取将文研院建设为北大的“学术品牌”之一。围绕重大前沿议题深化讨论，争取有积累、能持续、可预期，协助学校各院系，盘活、汇集校内外优质学术资源，凝聚视野开阔的学术领军人才，提高核心竞争力，为北京大学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79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19世纪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的看法

2018年5月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9世纪明治时代日本人眼中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伊斯坦布尔”。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峽大学荣休教授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管涛主持，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评议。

艾姗贝尔教授首先介绍了日本明治政府和奥斯曼帝国交往的历史背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1年到1873年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前往欧洲，与列强协商修订不平等条约。1873年，岩仓具视又派遣福地源一郎和西本愿寺的净土真宗僧人岛地默雷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考察奥斯曼帝国内由于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领事法庭”，以及埃及总督努巴尔帕夏（Nubar Pasha）提议的“混合法庭法”。这项法律被呈送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审批。虽然在当时，埃及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但在名义上仍附属于奥斯曼

帝国。苏丹对于签署这项法令与否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予以认可。埃及希望通过成立包括欧洲和埃及法官在内的新式法庭的方式来取代治外法权。福地源一郎见到了努巴尔帕夏，并获邀前往埃及做实地考察。福地源一郎在后来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日本学习这一制度。但是，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尤其是伊藤博文）反对学习埃及模式，坚持决定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1894年，日本通过同英国签订《英日贸易航海条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后来，日本在1894年打败清帝国，随后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在中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教授

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在此之后，日本政府向奥斯曼提出要在伊斯坦布尔享有治外法权，因为日本已经在国际法意义上完全成为欧洲列强一样的国家。

艾姗贝尔教授指出，山田寅次朗成为明治政府和奥斯曼帝国外交部协商的议题之一。日本政府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授予山田英国公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对此，奥斯曼帝国政府予以回绝，他们宣称，奥斯曼帝国正在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所以不能和日本政府签订新的此类条约。但是，奥斯曼帝国苏丹想要和日本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便通过旧的外交方式宣布给授山田“保护”。奥斯曼政府宣称：“山田先生是苏丹的特殊客人，受到宫廷的特别保护，所以不需要再另行签订条约。”

艾姗贝尔教授认为，小松宫彰仁亲王夫妇访问奥斯曼帝国（1887年）是两国之间高规格交往的开始。当时，日本是东方冉冉升起的“明星”，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欲和日本交好，并试图以两国的力量共同对抗俄国甚至是大英帝国。

两国交往中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所谓“1890海难”。1889年7月1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派出以奥斯曼帕夏（Osman Pasha）为首的庞大使团访问日本。在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圆满结束后，使团成员乘坐军舰埃尔图格鲁号（Ertugrul）返航回国。途中，在和歌山县串本町海域附近遭遇强劲台风，并最终在纪伊大岛檜野崎冲沉没。船上的618人中，仅有69人获救。日本政府为遇难者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葬礼，并派军舰将幸存者送回奥斯曼帝国。艾姗贝尔教授特别强调，当时，日本的葬礼一般是

按照佛教规范进行的，但从留存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神道教的神官进行了净化灵魂的仪式，伊玛目进行祈祷，神户的德国牧师也参与了仪式。2015年上映的电影由土、日演员合拍的《海难1890》便是根据这个事件拍摄的。

艾姗贝尔教授描述了山田在伊斯坦布尔的活动。山田担任商店经理一职，对投资感兴趣，在看到沉船事故和两国交好的新闻之后便决定前往奥斯曼帝国投资。山田的商店主要负责奥斯曼和日本之间的进出口生意。奥斯曼帝国出口烟草、皮革、干果、科涅克白兰地、药用鸦片等，并从日本进口瓷器、家具、装饰品、古龙香水、茶、丝绸等物品。山田几乎成为了非正式的日本驻奥斯曼帝国公使，他从日本带来明治政府官员和贵族送给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的野鸡、日本柿子和日本枫树。此外，山田在日俄战争中向日本政府传递了俄国舰队经过土耳其海峡的情报。

艾姗贝尔教授随后分析了山田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动机。山田原名中村寅次郎，其家族原本是德川时期的高级武士家族。明治维新以后，中村失去了税收收入和社会地位，并被过继给以茶道为生的山田家并改名山田寅次朗。在新日本已经没有晋升机会，这才奔赴奥斯曼帝国。

1911年，山田返回日本并出版了《土耳其画观》，主要介绍奥斯曼帝国历史、社会生活及伊斯坦布尔的重要地点。艾姗贝尔教授指出，这本书反映出他通过在伊斯坦布尔的商贸活动同明治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建立联系，因而融入了日本上流社会。从书中可以看出，山田提

别强调土耳其的文化和“东洋”文化非常接近。山田尤其赞赏奥斯曼帝国精英所主导的改革、街道文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普世主义。山田认为，土耳其是东欧和亚洲之间的桥梁——这说明他脑中并没有中东的概念。

此外，本书中还包括了山田在《太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反映出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看到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阶层受到了西方观念的深刻影响。山田希望土耳其妇女能够获得解放，并描述了伊斯兰布尔的一些名胜古迹。他也谈及伊斯兰教，但并没有将伊

斯兰教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唯一特征。书中还提及 1896 年亚美尼亚起义，然而，山田对这种族群间的暴力冲突感到很沮丧。

最后，艾姗贝尔教授总结道，山田的生活轨迹反映了明治时期传统、西方和普世文化之间的交融。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山田同情土耳其遭遇，尊重伊斯兰教，但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民众的第一身份，并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欧洲人也看作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撰稿：吴奇俊)

80

戴木德：南太平洋上的中国天文系统？ ——使“地”顺应于“天”的南岛扩张

2018 年 5 月 6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太平洋上的中国天文系统？——使‘地’顺应于‘天’的南岛扩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戴木德 (Frederick Damon) 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并作评议。

王铭铭教授首先介绍了戴木德教授的学术经历。戴木德教授自 1976 年起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研究课

程，并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伍德拉克岛和中国福建省泉州市进行过长时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范围涉及美国、南太平洋和中国这一广阔的三角区域。他深受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影响，对混沌 (chaos)、等级 (hierarchy)、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创建。他的民族志研究是在真



戴木德教授

实的物里寻找抽象的系统，在现实的人和物之中寻找宇宙论的模式。

本次讲座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导言、简介和“大迁移”、亲缘关系的暗示、总体价值、延伸、思维/地方的综合结构。戴木德教授旨在比较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的文化，在两地的天文学应用之间创建一种综合考察的方式。他认为，中国使自身全面符合于“天”的思想，这种做法与南太平洋区域的宇宙论系统之间存在出乎意料的一致性。

导言部分，戴木德教授介绍了研究缘起。自 1973 年起，他开始关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南太平洋社会系统。1990 年代的环境研究将他引向东亚和太平洋的历史、始于中国东南的南岛扩张，继而引向将东亚和太平洋联系起来的泉州。尽管中国研究原本是与南太平洋研究并立的独立计划，但当中国学者（尤其是王铭铭教授）将他引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后，他发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似性。在《树木、绳结与

支架》(*Trees, Knots, and Outriggers*) 一书中，受王铭铭教授有关中国天地观念的启发，他认为，正如中国的寺庙那样，浆叉驾船被理解为联结着天和地。制作船的木头源自地面的森林和田地，而驱动船的风力被认为和星星有关。船是风、水的复杂综合体，其航向更是风力和水力的合力。

在当地社会中，船也被用来隐喻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因此，它不仅是抽象之物，更是思维工具和行为模式。戴木德教授的另一个启发源自《山海经》和中国城市宇宙论中的内外观念。他在泉州治下的德化县和安溪县都发现“以内为外”和“以外为内”的观念：城的中心被认为是“外”，而城的外围反而被称作“内”。在《山海经》中，他也发现有关内外关系的记述，并认为这是中国古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木德教授德的研究缘起之三是大卫·帕克伦 (David Pankenier) 和丹尼尔·摩根 (Daniel Morgan) 有关中国天文学的著作，分别是：《早期中国的占星学和宇宙论》(*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以及《早期中国的天文科学》(*Astral Sciences in Early China*)。受该书启发，戴木德教授意识到时间的观念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其次，天被分为阴阳等二元对立观念，让他引入列维-斯特劳斯在“有二元组织这事儿吗？”一文中有关社会呈现自身存在的不同面向的不同方式之思考。此外，中国的空间结构观念使他意识到它与东南亚区域的联系，例如巴厘岛的房屋模式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结构。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戴木德教授表明，他要处理的是 16 世纪西方向欧洲之外的地

区扩张以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持续迁移。大约6000年前，所谓的“南岛语族”从现在的福建省向外迁移，掠过东非和南美，成为台湾和澳洲大陆之间这一广阔区域的主要居民，最终在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得以扩张。虽然考古和生物学的证据证明，早在8000到6000年前，华南和南太平洋之间就存在联系，但他试图考察的是这两大区域的文化体系的关联。他首先总结了这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的一些非常古老的差异。70000到10000年前，在亚洲大陆的南部，尤其是华南、东南亚乃至印度这一区域，根据季风管理土地（例如对水的治理）发展出谷物和稻作农业体系；大约30000年前，南太平洋区域受厄尔尼诺影响，通过火来管理土地，发展出树木和块根作物生产体系。

6000年前，亚洲系统增强，在规模上急剧扩大，南岛系统或许增强了，但规模趋于缩小。戴木德教授认为，来自华南的移民进入南太平洋区域必须改变以求生存——他们通过变“小”，重组来自中国的观念。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细微改变会引起整个模式的变化，因此，这意味着复制自我相似性的分形过程必定经历过一个实质性的转变过程。这使他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系统，什么时候是这样，以及它们如何在空间中变形。事实上，许多社会系统确实如此。2000年前，从印度南部，到福建，再到日本，这一广阔区域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力量，华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或许被低估了。

接下来，戴木德教授从天文知识、贝壳交换和等级观念等方面展现了中国和南

太平洋区域之间的亲缘关系。帕克伦和摩根在他们的书中都提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很可能建立在缺乏北斗星的基础之上，那时的北斗七星围绕着中空旋转。这成为中国政治凝聚力的一个原则：中心是空的，但能够使一切围绕着它。例如，中国典籍记载，皇帝之所以成为圣王，是因为他的“为”即“无为”。东南亚也发现有类似的政治结构，很可能跟中国有所关联。在戴木德教授进行田野调查的南太平洋小岛上，天空有两极，北面是北斗七星，南边是十字星，其间的所有星星都是东升西落，南北两极绕着它们运转。

星星的轨迹与树类比，如东方是树的根部，西方是树的冠部。当地人认为，船的航道也遵循星星的移动，地面的水上活动呈现的是天上的结构。南太平洋区域的众多岛屿组成人类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库拉圈”，岛民们通过贝壳的交换相互联系，而“贝”字在汉字里多与钱相关。两地都用贝壳来呈现债务关系。此外，在南太平洋区域，东北部的岛屿在地势上最高，特洛布里恩德岛则最低。然而，后者在该区域的社会等级中具有特殊的主导地位。这种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颠倒也是他从《山海经》中发现的一种社会模式。

戴木德教授认为，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天上的星星跟地面空间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两地某种“总体价值”的呈现。南太平洋区域的岛民们认为，每个岛屿都对应着一颗星，它处在某颗星星之下并由其定位。这种将每个岛对应一颗星观念，与中国“星野”体系相似。就天文说，中国的二十八星宿，称作“分星”；

就地面说，称作“分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将天上的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该区天象预兆着相应地方的吉凶。

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的相似性还能够从历法的构成方式、植物的意象和隐喻、星系跟船和大人物衣着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进一步延伸。中国有一套统一的历法，它是文明的象征；而南太平洋区域缺乏组织精巧的历法体系，各个岛屿或是有一种历法，或是有很多种历法。跟正式概念化的中国历法不同，南太平洋区域的历法更多是在经验层面的理解。该区域缺乏一个共通的整体知识体系，各岛岛民只关心本岛范围内的天文地理等知识，去往它岛则入乡随俗——这正是这片区域的社会运行机制。或许曾有一个连贯的结构，但现今已消失。岛民们用树而非历法来组织一切，并以根和冠的隐喻来理解区域内所有的岛屿，它的意象和形式与社会整体及其变化和关系相对应。

据戴木德教授推测，南太平洋区域有关树的观念是中国天干地支（枝）的变体。至于星系跟船和大人物衣着之间的关联，猎户座和天蝎座尤为突出。猎户座对应中国二十八星宿中西方白虎七宿的参宿，它与东方青龙七宿中的商宿（即天蝎座）在天空中此出彼没，犹如一对矛盾体。在南太平洋的船体结构中，有两个部件分别控制船的沉和浮，平衡这两股矛盾力的连接件与猎户座同名。在中国帝王的衣冠服制中，有一种名为“通天冠”，实则是银河的象征；南太平洋岛国的酋长们有一种冠与天蝎座同名——两地大人物的衣着服饰都与天相连。

讲座的最后部分，“思维/地方的综合结构”中，戴木德教授类比了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各自对银河的理解。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观念，银河被认为是天空中的河流，由一种生“气”构成，影响了河流的流向和庙宇的朝向，而“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了为何“日月星辰西移，水潦尘埃归于东焉”。南太平洋岛民也有类似“天圆地方”的想象，对银河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园子的结构和园艺活动，以及婚姻中交换男女的部落分界等。戴木德教授认为，他从中国“星野”体系中抽象出的结构类似于南太平洋区域的一种贝壳。这种贝壳来自于深海，被冲刷到岸上以后，寄居在其中的动物则去往高山，有一个从低到高的结构性翻转。这种贝壳/动物所呈现出的至高/至低，与中国太极的“极”一样，都为思维活动提供了坐标。在讲座最后，戴木德教授提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所假设的关于星星、力量和空间的宇宙论，应如何展开调查？倘若南太平洋区域的文化源自“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在大约6000年前确立的吗？是否应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以及南方的主导性？分析源自“中国”的思想在新地方的新运转，这种拓展有何启发？

评议环节，王铭铭教授表示，戴木德教授的研究拓展了“历史人类学”的时间维度，早在6000年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尚未形成之时，大陆和海洋上的交流业已存在。戴木德教授通过极其细微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跟学者的交流，使其研究成为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

不断获得新知而非得出结论。王铭铭教授从讲座中谈及的贝壳入手，在地处中国北方的夏商周王朝考古遗址中，发现大量贝壳。它们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这说明，大陆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必须依赖于海洋。由此，我们应反思大陆和海洋、南方和北方的关系。最后，戴木德教授同

在场师生就中国和库拉圈中的“结构”异同、天文体系与政治经济等其他体系的关系、跨文明比较的原型与连续性问题与展开交流和讨论。

(撰稿：罗杨)

81

大卫·阿米蒂奇： 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

2018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

本场讲座主要关注人文学科在当前面临的多重问题及历史学在解决这种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是接下来系列讲座的纲领。讲座伊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人文学科处于危机之中的宣告不绝于耳，这种危机表现在人文学科招生数量的减少、学生及家长们对学科就

业前景的担忧、科学和非科学学科边界的改变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大学管理者的工具主义倾向、大学经费被挤占等各种因素。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危机，而历史学或将担负起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

阿米蒂奇教授回顾了历史学的发展。在他看来，20世纪以前，这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研究过去的学问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实践的追求，即通过案例为统治者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公民们提供哲学教导。主流观点强调，历史学是公共生活的指南；西塞罗则干脆认为历史学就是生活的指南。因此，历史学在当下研究过去，为的是塑造未来；历史学家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应至少同对过去的关注一样多。随着19世纪



讲座现场

末到20世纪的学科专业化发展和自我设限，历史学失去了这种关注当下和聚焦未来的能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今历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尴尬位置：历史学家们在关于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政策讨论中鲜有话语权。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逐渐转好的势头，阿米蒂奇教授的两位同事格拉哈姆·阿尔森(Graham Allison)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受命组建对总统负责的历史咨询委员会(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通过分析现实情况的历史对应物，为总统阐明当下的机遇和挑战。尽管这一举措招致的非议远胜鼓励，但阿米蒂奇教授仍认为，这证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必将回归到关于政策和战略的、更广泛的讨论中去。这种回归将由历史学领域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拓展自己视界的新趋势——“跨国家”(transnational)和“跨世代”(transtemporal)研究的兴起来帮助实现。此二者使得历史学成为人文学科中唯一一个兼顾广度和深度，同时

跨越国家边界和时间分期的学科。

接下来，阿米蒂奇教授对“跨国家”和“跨世代”这两个概念做了解释。“跨国家”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中叶，在当时意味着寻找不同国家语言中的共同点和联系；20世纪50年代被律师们借以指称超出国家管辖权的法律样式(如关于环境或外太空的法律)；20世纪末才被用以概括所有不能涵摄于国家边界的观念、进程和活动。“跨世代”借用自解剖学，本意为“穿过大脑颞叶”。在历史学中，则意味着跨越那些出于研究的便利而人为划定的历史分期。“跨国家”概念强调的是空间上的联系和比较，不承认自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以来形塑了许多历史学著作的民族国家框架；“跨世代”的关注点则在时间，尤其拒斥那种从以20-50年作为时间尺度讨论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影响，这种倾向自19世纪70年代从生物学研究中兴起以来便蔚为主流。

阿米蒂奇教授继而分别介绍了“跨国

家”和“跨世代”研究的发展和现状。首先是“跨国家”研究。在过去25年间，国家框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国际的、跨国家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历史研究开始产生。国际性历史研究认为，国际社会虽是由国家组成的，但须透过国家边界绘制国家间关系。“跨国家”历史研究关注跨领土边界流动的进程、运动和制度，涉及环境、有组织犯罪、流行病和宗教等；比较历史联系由国家维度定义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全球性历史研究则涉及全球史、前全球史及次级全球化区域（如印度、亚太等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述路径都强调超越国家边界研究人类活动的本来面目，因为人类活动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政治边界的尺度上。

阿米蒂奇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着“跨国家”研究，他对自己的过往研究做了概



大卫·阿米蒂奇教授

要性的介绍。在2000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的观念起源》中，他探讨了英帝国的历史与英国国家建构的关系，认为英帝国的建立与英国作为民族国家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认同中崛起是相对同质的进程。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借助于英帝国的历史，英帝国也是英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延伸，二者同样都是当时国际竞争的产物。2007年出版的《独立宣言：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以美利坚合众国为研究对象，持有与“美国例外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产生及独立宣言这一美国化的美国历史文献具有“跨国家”的时机、内容、形式和影响。通过聚焦《独立宣言》及其“跨国家”的历史机遇，这本书回答了“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是如何变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这一问题。

2013年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进一步探讨“人们为何会产生身处于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想象”。阿米蒂奇教授认为，人类这种共同想象的产生是近五百年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变迁，其他重要概念（如民主、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和人权等）都以此为基础。正是在早期现代社会（大约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国家而非个人或公司是国际社会首要行为体的思想才站稳脚跟。主权国家之间处于无政府状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从主权国家中产生。这些研究能促使人们意识到，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前提非常脆弱，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政治学一些假设的正确性——如个人是否必须服从于国家、领土边界是否不能渗透、是否存在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等等。更重要地，既然认

识到当前的制度安排更多只是偶然的結果，我们才更可以设想其它选项。这会进一步将我们的关注转向“跨世代”历史研究。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跨世代”历史研究代表着对历史研究中传统时间框架的拒斥。传统的时间框架以生物学时间为基础，并在不断缩小：在1975–2005年间，大部分历史学家开展研究的时间尺度介于5–50年中；在1920–1980年的美国，大部分历史学博士论文的时间尺度从80年缩小到了30年。时间尺度的这种缩小表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历史”（longue durée）的衰落。布罗代尔的研究连接了三种时间尺度：以在物理环境中的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地质时间，以国家、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千百年时间，以及一个更短的简明而快速的变化周期。

“长时段历史”的提出以布罗代尔“对人文学学科的总体批评”（即知识，尤其是数据）的爆炸、对学科边界的总体焦虑、邻近领域合作研究的缺乏和“退步的，有害的人文主义”等为契机，指向当时叙事史学和社会与经济史研究中默认的5年、20年乃至最多50年的短时间尺度。过短的时间尺度使得叙事史学过于关注具体事件，容易局限于当下并为短期统治便利所利用，进而既不重视解释又不产生理论，既缺乏批判空间又不产生真正的知识。唯有“长时段历史”才能通过对较久远过去的关注通往较长远“未来学”。

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基于学科过度专业化的担忧在历史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广为传播。因此尽管历史学研究的关注对象毫无疑问主要转向短时段了，“长

时段”研究并未完全消失：关于“世界历史”和“大历史”的问题拓展了叙事史学的范围，如学者们开始从环境角度复述历史，将人类放在更广泛的自然进程中去理解；科技也开始介入历史研究，如使得学者们有了丰富的电子和数字档案及分析工具。这些因素都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更多地涉及长时段，甚至还远及三千年的基督教史以至一万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并充分体现在了过去十年关于冷战与移民、黑海与阿拉伯之春、女权与澳大利亚历史等研究中。

阿米蒂奇教授介绍道，其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中将内战概念放在古罗马以来两千年的时段中加以理解。当前，关于内战的定义蕴含着源自罗马法那自相矛盾的一整套概念，因此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内战只能是描述性的，是不可定义的，须通过多元历史加以理解。在许多政策制定和新闻报道的争论中，必须引入历史学的背景——这是“长时段历史”重要性的一个展示。除内战外，其他如常识、民主等思想史上的概念也是如此。

“跨世代”研究当前发展出了一些新模式。“大历史”是将过去回溯至宇宙起源的一种尝试；视域上较小的是丹尼尔·斯麦尔（Daniel Smail）的“深层历史”研究，着意于打通“历史”和“史前史”的界限，且只涉及人类四万年的历史；视域更聚焦的则是“人类世”（Anthropocene）研究，关注人类在整个地球范围内掌握了影响自然之能力的这二百余年，并与当下热点联系最为紧密。这三种研究各自具有宇宙学、考古学和气候学的特征。每一种研究都代表着历史

学研究视角的一次延展，也扩张了历史学研究的时间视域，超过人的一生、一代人或其他生物学上的时间阶段。

阿米蒂奇教授再一次强调，延展时间尺度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球治理正在走向失败，国家内不平等现象不断上升，气候变化的局面也将失去被挽回的可能。这些分别可追溯至 20 世纪中叶现代国际组织崛起、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上升和 18 世纪末期人类世的开始。对此，将历史化约为路径依赖无济于事。只有借助历史学回望过去，寻找尚未走过的新路径才能设想未来的新方向。若进行这样的研究，必须将时间尺度延展到以年代、世纪甚至千年为单位，就像丘吉尔曾说过的那样：“回望愈久远，展望也便能愈长远。”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总结道：在“跨国家”和“跨世代”研究路径的帮助下，历史学家可以与地方性和短期性视角相抗衡，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未

经管制的金融市场，人类世以来的气候变化、食物和水源供应，政治稳定和生物存续等——提供解决方案。大范围内，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是非历史学家所不能实现的。因此，阿米蒂奇教授自信地宣称，过去的未来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

交流环节，阿米蒂奇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延展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并不是要培育回到过去特定时间点的主张，而是可通过比较现状的不足与过去的优势来提供更多视野。他鼓励博士生根据案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问题，尤其将研究问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对话，利用数字档案减少研究的困难。他强调，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有别于以数据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便在于提供质疑精神、分析各种讨论的前提，并寻找关于未来的各种可能选项。

（撰稿：杨翔）

大卫·阿米蒂奇： 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

2018 年 5 月 16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

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

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易于产生一种陆地偏见：关心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依恋坚实的土地（terra firma）



阿米蒂奇教授（左）主讲，李伯重教授（右）主持

提供的各种便利，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土地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牵引。这种依恋或可称为“陆地中心主义”（terracentrism），它是一种对物种、物种环境和历史的短视。这种偏见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冒险进入海洋被认为是不自然的，船难和溺水被视作狂妄地拒绝我们作为陆生生物命运的合适报偿。然而，构成星球表面的 70% 是水，仅太平洋盆地便可容纳世界的整个陆地表面并留有余地。因此，海洋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星球却被称为“地”球（earth）。这似乎是一种悖论。

克服陆地中心主义的智识努力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开始声称，世界史的空间和规模可能会根据海洋的自然边界重新描绘。然而，在 21 世纪初期，学者们才将海洋带入历史，并产生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运动来推广所谓的“新海洋学”（New Thalassolog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那么“新”，因为它的大多数发起人都认为地中海模型（Mediterranean models）对于海洋史具有

首要地位，并经常将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著作视为萌芽之作。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将大西洋史视作一个专门的领域，并认为其与其他海洋史具备不同的范围和起源。然而，关注其他海洋和海域的学者对这一谱系进行批评和重构。他们展示的思想家、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对地中海以至大西洋以外海域的描绘和叙述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远早于相关学术活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因此，鉴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较长谱系，“新”海洋学并没有那么“新”。在这些水域拥有历史学家之前，它们便拥有“复数的历史”（histories in the plural）。正如太平洋、红海、南中国海和黑海持续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所显示的那样，其中大部分都延续了几千年而不是几个世纪。较之欧洲中心的概念如现代性和启蒙运动，海洋的深层历史为历史理解提供了更好的框架。

为展示 21 世纪海洋史的潜力和前景，阿米蒂奇教授转向讨论大西洋。在有些人看

来，大西洋是历史的典范海洋，甚至有人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 of modernity）。不过，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国际组织以最大努力将大西洋与其他海域区别开，大西洋仍不过是世界海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大西洋拥有多重而流动的历史，其中包括：关于海岸和沿海水域的大西洋沿岸历史（histories around the Atlantic），有关岛屿和公海的大西洋内历史（histories in the Atlantic）以及跨越大西洋的历史（histori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近五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忆和经历构成了许多大西洋的历史，但并未出现一个单一的大西洋历史。更全面的大西洋历史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地缘政治的大西洋主义兴盛起来；直到20世纪后半叶，自我标榜的大西洋历史学家才出现。而在本世纪早期，大西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曾短暂出现，随后被海洋史和全球史“吞没”。

在大西洋历史诞生之前，其实有许多分割的、不连续的大西洋——它们甚至不以“大西洋”命名，亦或是未被放入这一框架中。直到15世纪，大多数航行发生在近海，新发现的水域被勾连到已知的世界中而未能催生一种全新的视野。到了19世纪，仍然至少有两个大西洋存在。在赤道上方是“北海”（‘Mer du Nord’ / ‘North Sea’），或者像英国人将目光转向北美时所说“西洋”（‘Western Ocean’）；赤道下方有一个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往返航行构成的、基本独立的海洋系统，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海”（‘Mare Aethiopicum’）、“南洋”（‘Oceano Australe’）或“南大海”（‘Mare

Magnum Australe’）。路易斯·费利佩（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认为，19世纪中叶标志着大西洋历史的重大分水岭。蒸汽船将风帆和船只从风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系统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整合性大西洋的出现，使得有关更宏大的大西洋历史想象成为可能。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于1896年所著《美国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1638–1870》正是这一阶段历史叙事的典范，它研究了洲际之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表达了在其他大西洋历史出现之前的黑色大西洋历史（black Atlantic history），并将束缚和因强迫而流离失所的下层人口置于大西洋故事的核心。

下一波大西洋历史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写了“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这种共同体最初局限于北大西洋，但后来包括若干拉丁美洲国家。从教科文组织到北约等国际机构建设时代，李普曼成为国际主义种类的大西洋主义推动者。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大西洋世界”这一概念在外交官和法律国际主义者的著作中一方面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地缘政治表达，另一方面则成为一种历史实体。二战后的大西洋历史则以某种潜藏着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为基础展开叙述。它描述了欧洲人西进、殖民、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它所激发的革命、内战和解放运动。这是一种关于大西洋历史的目的论叙事，无论有意或无意，它的编年方式揭示了它仍将赤道之上的那个大西洋置于中心位置。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在20世纪后期，大西洋史面临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整合

大西洋史的各种不同潮流：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黑色和白色的大西洋；国家的和跨国历史。其次，要反对传统的时间和地理边界。第三，界定该领域的身份时不将它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切断。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大西洋史的迅速成熟只是部分地回应了这些挑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专论和文章在21世纪初迅速激增，大西洋史提供的广阔整合性路径正当其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国家框架能否捕捉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历史过程。

接下来，阿米蒂奇教授介绍了自己于2002年提出的有关大西洋史的三概念：环大西洋史（circum-Atlantic history）、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和内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这三个概念被用来解析当时的各种路径，并为该领域提出了前瞻性途径。环大西洋史即大西洋史作为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指的是作为一个交换和往来、流通和传播的特殊区域的大西洋历史。跨大西洋史即大西洋史作为国际性的、区域间的、政体间（interpolity）的历史，通过对帝国、民族、国家以及类似的共同体或集群（例如城市或种植园）之间进行比较来讲述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内大西洋史即大西洋史构想为当地史甚至是微观史，包括任何特定地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特定的机构与更广泛的大西洋世界的关系的历史。

阿米蒂奇教授表示，这一分类并不是穷举性的，并且他意在使这三个类别呈相辅相成的关系：环大西洋史使跨大西洋史成为可能，且二者均依赖于内大西洋史。在当时及之后许多年，它们都充分地把握了针对大

西洋世界的历史而开展的大部分学术工作，这一大西洋世界在海洋间的和全球的连接中被定义，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和多层次的系统，并被视为波浪之上和大西洋内部及毗邻地区的经验总和。但现在，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显得无所不包。近十年来，海洋史的演变表明了迫切需要扩展原来的三分法，以考虑大西洋史内部和外部的最新发展，并为大西洋史本身想象新的前景。由此，阿米蒂奇提出了关于大西洋史的三个新概念以补充原初的三分法：大西洋内部史（infra-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次级区域的历史；大西洋水下史（sub-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海底的历史；大西洋外部史（extra-Atlantic history）则关注大西洋世界的超区域（supraregional）历史。这三个新概念可以为重新激活大西洋史领域提供新颖的方式，并增加与其他历史分析领域的整合，同时充当那些最具前景的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的指标。

随后，阿米蒂奇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个新概念。大西洋内部史与环大西洋史截然相反：后者采用综合的、整合性的方法，前者则将重点放在那些更具体的和有界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会汇入或是毗邻更大的海洋，但作为岛屿和群岛、近海和海滩、海峡和海湾，它们具有整全的身份。大西洋内部史关注居住在这些次级区域的人群的历史，它不是大西洋作为多种内大西洋史聚合产生的结果——因并未预期这些地方应该连接到一个更大的沟通环路中去。大西洋也不是一个“世界”或说“系统”，而是一系列独特的空间和从中涌现的、相互竞争的愿景。大西洋内部史从邻近的海洋史中汲取灵感，因为这些

历史也试图将更广阔的海洋分解成其组成部分。正如红海的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海洋空间都是天生分裂的、碎片化和不稳定的场所”。有人认为，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势力愈演愈烈的时代，在叙述整合之余，全球史的未来也要讲述分裂和反整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分裂的大西洋与一个协调的大西洋能够揭示同等分量的东西。这是因为它更可能反映特定的经验，而不是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例如假定大西洋是欧洲的保护区或发明，或是陷入某种目的论假设，即大西洋一体化不可避免，甚至不可逆转。

大西洋水下史关注水位线以下或波浪之下的历史，涵盖大西洋的海浪、海流，海底的海洋生态系统及其居民，人类与大西洋自然世界的交往，乃至海洋内部发生的历史。海洋看起来可能是永恒的，构成了波浪之上种种历史事件深层而不变的背景。但是，大西洋水下史揭示了海洋作为变动的实体的历史，它会被人类活动（例如过度捕捞或污染）以及诸如气候变化这类更为宏阔的历史过程而改变。因此，大西洋水下史使得大西洋的历史与整个环境史更为充分地连接在一起。大西洋水下史也应该包括海洋下各类活动的历史。就目前而言，这一部分历史可能是大西洋史里面发展最不充分的。然而，随着海洋史受到环境史更加深刻的影响，它将面临更为迅速的发展。

大西洋外部史通过大西洋与其他海洋和海域的联系而讲述大西洋史。正如大西洋水下史所揭示的那样，海洋之间联系确保了将它们分开的任何尝试都是人为的和强迫性的。大西洋史与许多其他海洋的历史有关，如果

孤立起来看，它自己的历史可能会是一种任意的海洋内部史。若说大西洋太大，以致无法捕捉一些历史过程，那么同样地，它也太小，以致无法涵盖那些在跨洋、跨区域和全球范围运作的过程。从15世纪起，历史上的行动者就决不会把大西洋误认为一个离散的海域领域，帝国及跨国贸易公司同样形塑了大西洋和其他海域之间的联结。美国革命前夜，在波士顿港倾倒的茶叶源自中国，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往北美。后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中国和印度工人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将大西洋移民加入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球移民和交通运输的环路中。直到20世纪，大西洋才被认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与对全球历史更加开阔的构想截然不同。现在，是时候重新将它与更广泛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大西洋史摆脱近百年的孤独处境了。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总结道，大西洋内部史、大西洋水下史和大西洋外部史都在扩展和加深大西洋的历史：在时间上超越了现代早期历史中默认的界限，在空间上拓展到表面之下、跨越其不同水域并整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海洋的这一更广泛的范围内。通过从其他海洋史吸取方法和灵感，它们可能有助于使大西洋的历史叙事与全部海洋史进行更富有成效且持久的对话。如果大西洋史确实有未来，它会是通过海洋史的镜头所观察的世界史的一部分。

（撰稿：陈浩宇）

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阿米蒂奇教授手持《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中译本

2018年5月1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文研院特邀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主持。

内战，一个熟悉的词汇。我们似乎能够以现在的角度清晰地分辨出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哪些可被称为内战，哪些可被称为国际战争。内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到媒体上，但是，这一观念却不是历史发生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被发明的词汇，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内战的定义往往极具政治性。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在统一历史阶段中处

于不同立场乃至不同观念的人会对同一场战争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定义。本次讲座中，阿米蒂奇教授围绕自己的新作《内战：观念中的历史》，就内战如何被创造、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寓意的转变以及如何作为一种观念影响着政治走向进行梳理。

阿米蒂奇教授以“历史终结论”作为本次讲座的开端。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在全球取得全面胜利。这种胜利的结果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的战争将全面消失，世界会真正迎来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而所谓的“战



争的历史”也将寿归正寝。然而，阿米蒂奇教授表示，尽管大型国际性战争自上世纪中叶起就渐趋平息，但内战作为一种非国家间的冲突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据现场展示的图片和数据显示，尽管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消弭，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仍有大量的国家和人口被卷入内战之中，其中尤以南亚、中亚和非洲地区最为明显。冷战结束以来，每年几乎都会有约20个国家爆发内战，且破坏力并不比国际战争更小。二战结束以来，共有2500万人死于大大小小的内战之中，这相当于二战死亡人数的一半。除了直接剥夺生命，现代内战多发生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故而还带来了大量的难民、疾病、犯罪和社会共同体的瓦解等重大问题。这些破坏证明，“内战”作为一种“倒退的发展”值得我们历史的角度研究，并从观念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内战作为一个长时段的概念有其产生、转变和当代发展的过程。在文明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内战的观念，例如印度神话《摩诃婆罗多》中婆罗多族内部的斗争、罗马建城时期两兄弟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之间的争斗等。但是，直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内战”一词才真正地被创造出来。在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战争才被罗马人看作是内战。在此之前，战争是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的；自公元前1世纪起则出现了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即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同为公民的战争。随着苏拉和马略

的战争、凯撒和庞培的战争爆发，一种对于内战的共识得以达成——政治体内部的分歧是内战的导火索，而内战本身则是应当避免的错误行动。

在近代早期，内战的观念发生了转变。17世纪，英国内战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内战事件启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霍布斯认为，内战是在公共权力分裂之时产生的，只有两个不同的权力相互宣称自己具有主权之时发生的战争才能够成为内战；既然两者都具有主权，那么内战就是一种“非内部的内战”，而就对立的双方来说战争可以被称为内战、叛乱或说是革命。阿米蒂奇教授认为，18、19世纪是内战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两个世纪。革命世纪的到来使得“革命”这个带有进步意义的词汇大有代替“内战”的趋势。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爆发使得革命成为与内战对立的概念：前者代表着进步和发展，后者代表着痛苦和灾难。二者均代表国家内部的战争，但相互之间又有所隐含。美国革命时期，尽管有众多资料将这次战争描述为英帝国之中的内战，但美国人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将独立的革命战争作为自己的口号。

19世纪内战的代表是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这次战争被林肯总统称为“伟大的内战”，南北双方共处于一个政治体之中，避免了分裂主义。19世纪中叶，内战的含义再次发生转变。密尔等人试图将内战置于法律的框架之下，从而使其“文明化”。内战不再被视为内部公民对公民的战争，而将人权观念引入其中。这种定义使得美国内战双方有了明确的正义和非

正义之分，也给予了对内战进行国外干预的理由。20世纪，尤其是在冷战的影响下，内战出现了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内战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回忆”，但它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它不再能被清晰定义，表现出来的影响似乎也都是国际性的。同时，以《日内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人类法的发展将战争的观念放在了国际框架下。在将来，国际间战争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全球内战的观念在“9·11事件”之后的时代或可被使用。

通过勾勒从罗马时代内战概念的发明，到近代早期的演进和18、19世纪历史的影响，再到20世纪冷战的作用这一历史进程，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对内战的理解确实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迁的，且不同的理解有助于使我们从观念的角度理解过去。同时，梳理历史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现在所发生的内战，从而更好地避免这种暴力形式。

讲座最后，王立新教授向阿米蒂奇教授提出或可在未来将中国20世纪的内战纳入研究的建议。王立新教授还表示，阿米蒂奇教授及其著作《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是研究内战的重要一步，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此外，研究内战有助于我们保卫和平、避免战争。

（撰稿：孙晓斌）

大卫·阿米蒂奇： 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



2018年5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四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讲座伊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对于

21世纪初来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1795）或许是启蒙时期世界主义的标志性文本。康德的论著凭借其普遍主义、对掠夺性民族主义的厌恶以及对全球正义的锚定，已成为当代世界主义思想家的基石。康德论证说，在“世界公民权利”的政权下，永久和平的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他在早前的论证中承认，并不清楚永久和平是“一般性地适用所有人类，或者是特别地适用



于国家元首，他们永远不会停止战争，或者只是为做着甜蜜梦想的哲学家准备的”。对此，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康德或已想象出和平的可能性，但他本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他的世界主义观念是渐进的和发展的，根本上也是冲突性的（conflictual）。世界主义的发动机是“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迫使人们即便经历了破坏性的竞争形式也要寻求和平。康德文章的标题源自一个酒馆中对墓地的讽刺性描绘：唯一真正的永久和平或许是坟墓的平静。康德的世界主义目标可能是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宁静，但通往和平的道路仍会有尸体散落之上。

对于康德来说，世界主义与和平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并非必然或自然的。相

比之下，大多数当代世界主义思想家——即使是那些最为自觉受到康德影响的思想家——都毫不怀疑世界主义是一种关于和平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peace），甚至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和平主义哲学（pacifist philosophy）。当今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旨在减少和防止个人作为个人而非有边界的国家或民族的公民或主体产生冲突，强调尊重他人作为理性自主的行动者的做法和信仰。同时，基于对相同人性的相互承认而进行对话，并通过协商一致解决争端。当代世界主义的终极目标被定义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城邦（polis）或政体，激发对立的各种因素（包括民族主义、部落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产生分裂的偏见），全面性地让位于对相互承认、平等包容以及和平的世界性承诺。人际和国际争端可以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并根据普遍正义的规范来定夺。世界主义想象中的社会是宽容的、平等的和普遍主义的，任何争夺的动机都会蒸发而和平则会占据上风。

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这一所谓的选择性亲缘关系阻止了学者们产生世界主义可能与战争有所关联的认识，且战争或许会揭示世界主义的局限与可能性。1989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战争浪潮激励着一些理论家去质问世界主义可为减少冲突提供什么，且反思世界主义在理论上是否足够强劲到面对21世纪非传统战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挑战。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意图的政治现实主义承诺，或许正是康德本人会构想的。

本次讲座，阿米蒂奇教授从历史角度出发考察世界主义与内战的关联，也为上

述晚近这一研究动向提供支援。在大多数当代世界主义者看来，世界主义与内战或不具备任何关系，或只具有一种矛盾的关系。然而，充分的历史证据显示，世界主义和内战并非完全疏远或在概念上不相容。在欧洲启蒙运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主义与内战相纠缠的切近起源。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在康德达到了高潮，但它是托马斯·霍布斯关于人性的观念与普芬道夫有关人类社会性更加乐观的看法相结合而出现的。这种结合物产生了一种适合于帝国全球竞争时代目的论式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在他的《万民法》（1758）中作了经典的表达：各国将相互沟通他们的产品和知识；世界各地都会盛行稳固的和平，并以其宝贵的成果来丰富它；工业、科学和艺术将不仅满足我们的需求，更会被用来促进我们的幸福；将再也听不到解决争端的暴力方法：所有的争议都将由节制、正义和衡平来终止；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大型共和国（une grande république）；人们会像兄弟一样生活在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公民。

对于瓦特尔以及四十年后的康德来说，这是一个将在未来实现的梦想，而不是在当下享有的现实。因为个人的利益总是与共同利益相冲突，暴力之手并非不可见，对这一手段的摆脱也并不总是光荣的。瓦特尔的许多愿景逐渐发展并成熟为启蒙时期作为一种哲学和政治立场的、世界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它们的胜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如何胜过世界主义思想中更具冲突性的那些脉络是一个未曾讲述的故事，而其起源可在18世纪欧洲找到。瓦

特尔本人并不认为世界主义与和平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他不仅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世界主义理论家之一，还是这一时期对内战最具创新性和持久影响力的分析家。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因为欧洲“第二次百年战争”（1688–1815）期间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蒙上阴影——它既是这一系列冲突的产物，也是反思它们的手段。它不是单一的学说体系，而是一系列论点。面对具有深厚古典根源的冲突性世界主义（conflictual cosmopolitanism）提出的同样强烈的论述，像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瓦特尔不得不为世界性的和平主义抗辩。

世界主义与内战在启蒙时期的互动借鉴了对文明（civilization）及其最具破坏性的不满作出思考的古典传统思想。这段较长的历史是两座城市的故事，或者说关于城市的两个古典概念：polis和civitas。在比喻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标志着人与动物、文化与自然、宇宙中有序与无序的元素的界限。基本的词源学表明，希腊语 polis 位于“政治”的根源；而拉丁文 civitas 是公民或 civis 精心建造的居所，是“文明”的家园。这个城市是人类能够在法治之下通过合作及和平的方式充分展现人性的地方，并且远离野性的危险和无知。然而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座城市也经常成为内战的舞台，即公民之间或者说同一个城市的居民之间斗争的舞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战或者城邦内的武装冲突长期被称为“非自然”的，以及为何从古典时代到现在内战都被想象为极其野蛮和兽性的。

因此，这两座城市的故事同时是两个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故事，“世界城邦”和“内战”这两个概念是内在矛盾并且不稳定的。当第欧根尼称自己为世界公民时，他表达了对城邦有限性及其亲密关系的蔑视，并且否认对任何共同体的依恋。成为一个像宇宙（cosmos）一样不确定的、政体的公民，实则是不以任何有意义的形式成为公民。同理，内战也颠覆了罗马关于战争的主导观念。战争被视为针对外部敌人的、合理的敌视状态，然而“内战”中的敌对者是公民同胞。根据罗马正义战争理论，公民之间的战斗不可能是一场战争，因为它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朝向外敌的。“内战”这个概念便是一种有意的矛盾表达，传达了对破坏城市文明的公民间斗争的厌恶。罗马对有关内战的叙述传递的一个主要教训便是：建立城邦并且文明化，便有内战之虞并且容易遭到致命的伤害。只有沦为内战的牺牲品，才有可能辨识共同体本身的边界——无论是早期罗马城的原始界限，还是罗马扩张之后的整个意大利半岛，甚至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而囊括的整个东地中海地区。

世界主义通过扩大城市的边界来扩展内战可被想象的环境。因此，两个世界主义的内战概念出现了：一方面，因为所有人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另一方面，建立在罗马观念之上的是，内战可能会扩展到比国家或民族更大的共同体以至包括各个文明、帝国乃至整个人类。这两种有关内战的世界主义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都有所表现，前者的经典表述出现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马吕斯·

彭眉胥（Marius Pontmercy）质问道：“内战……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存在‘外部’的战争这回事吗？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战争不都是兄弟间的战争吗？”

在欧洲各国近一个世纪的战争中，有关“欧洲内战”（European civil war）的修辞激增。它既可被用作一种文化统一性指标，也可被用来标示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文明上的差异。不过，欧洲并不是唯一可被想象成内战舞台的跨国共同体。一个帝国可以被指称为单一的城邦（civitas），它包含欧洲及欧洲之外的领土。后来被视为革命的历史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帝国内战。大西洋世界的评论家将18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的危机看作一场发生在不列颠人之间的内战。只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后，国会将殖民地组建成“美利坚合众国”，这场冲突才不能再被想象为内战。由此，对于新的美国及其潜在的盟友而言，一个越洋帝国的内战至少转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

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全球内战的概念是启蒙时期世界主义带来的一个未曾意料的结果，它的全部意涵或许到了20世纪才完全展开。与18世纪一样，世界各地战争的扩散激发了人们对内部冲突不断扩张的边界进行哲学思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21世纪初的“全球反恐战争”，这个世纪的巨大跨国冲突常被看作是投射到大洲甚至全球屏幕上的内战。作为内战舞台的共同体被想象得越来越宽广，从“欧洲内战”扩展至有关“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各种概念。

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加埃塔诺·萨尔

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在1914年警告他的读者说，他们现在目睹的不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全球内战”，没有人可以在其中保持中立。冷战进一步促进了内战观念界限的扩大，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1月发表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所说的那样，这场冲突将被称为“一场分裂和折磨人类的全球内战”。两个月后，卡尔·施密特在西班牙发表讲座，谈及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释放的“革命阶级敌对的全球内战”。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1963）中指出，20世纪互相关联的战争与革命带来了一个新现象，“世界大战似乎是革命带来的后果，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内战，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据相当一部分公共意见看来，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

“全球内战”最近被用来表示像基地组织这样的跨国恐怖分子与美国和英国等成建制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斗争。在一些人看来，“9·11”之后对“全球内战”这一概念的使用意味着内部冲突的全球化，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被投射到了世界舞台。在更广泛意义上，“全球内战”也被用来意指敌对派别之间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斗争——它们完全摆脱了传统战争形式施加的限制，回到了一种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在这种冲突中，“内部”与“外部”，国家内与国家间的界限完全模糊。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4年写道：“我们当代世界的特征便是普遍的和永久的全球内战，以及有效

中止民主的持续暴力威胁。”面对“全球内战”不可阻挡的进程，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2005年观察到，“例外状态越来越成为政府在当代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他将这种范式追溯到霍布斯和修昔底德，但它最切近的谱系源自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内战概念的范围虽然扩张了，但它仍带有某些传统内战观念的特征。全球内战的概念携带着一种关于普遍人性的观念，就像内战的所有概念一样，它恰是在冲突和对抗变得明显可感的时候表明了包容性和共同性的边界。人类正是通过这个巨大共同体或是世界城邦内的冲突确认了他们的统一性。如果没有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在概念上拓展视野是不可能的。世界主义蕴涵的乐观主义及其矛盾心理继续讲述着我们对普遍人类共同体的希望和恐惧。正如整个启蒙运动存在阴影一样，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世界主义是一种关乎冲突与妥协、战争与和平、内战与文明的哲学，这一令人不安的结合正是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撰稿：陈浩宇）



82

辛德勇：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与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

2018年5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与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辛德勇教授首先介绍了此次讲座的缘起。不久前，罗振玉旧藏的九十七枚铜活字字钉从日本回流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国早期青铜活字重大发现学术论证会”，邀请印刷史、钱币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鉴定研究，辛德勇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亦形成了关于这批字钉的一些推断。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曾到日本避难，经济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可能在当时出售了这批铜活字字钉，同时也卖出来一批甲骨。因此，随铜活字字钉一起保存下来的“假预证”在情理上是可能的。

接着，辛德勇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在电脑上翻转处理后的字钉图片，介绍了这批铜活字的基本情况。

从材质上判断，这些铜活字的下限不晚于明代中期，因为明代中期以后主要以黄铜为主，中期以前则以青铜为主。再者，作为一种实用的印刷字钉，可以通过比较雕版印刷书籍的字体来推断其制作年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通行的雕版印书字体，因此黄永年先生曾强调，字体是判断雕版印刷古籍版刻年代的第一要素。由于铜活字字钉是在雕版印刷通行的背景下制作的，因而其字体风格也理应与制作时通行的雕版印书字体相一致，至少不会存在太大的差距。而从字体来看，辛德勇教授认为这批铜活字与南宋浙本的欧体字风格最为接近，也可能会晚至元代早期，但一般来说，应当是在宋元之间。同时，铜活字的铸造



辛德勇教授（右）主讲，高峰枫教授（左）主持

地点也最有可能是宋浙本覆盖的地域范围之内，大致在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一带，尤其是浙江、苏南、皖南这些雕版印书的欧体字比较典型的区域。而这一论断也与钱币研究学者的判断一致——从锈的程度上看，铜活字应当是铸造于江南，有千年历史。

那么，这批铜活字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铜活字的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发达、制作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呢？辛德勇教授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颠覆传统学术的认知，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史料的记载如果相对丰富，则不易被推翻。而要判断这批铜活字的意义，便需要引入印刷史的相关知识作为参照。

众所周知，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在仁宗庆历年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这也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的最早记载。人们普遍把毕昇视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认为用这种活字来排印书籍“既经济，又便捷”，“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但是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的看法，如黄永年先生便认为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术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在毕昇发明后并没有广泛付诸应用。辛德勇教授补充道，除了黄永年先生所说的性能原因之外，泥活字印刷还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陷——摆出来的字钉，忽高忽低，造成版面凹凸不平，着墨不均匀，有些低下去的字甚至根本上不上墨。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活字本中普遍存在，可知这一缺陷始终难以克服。另外，从《梦溪笔谈》的记述来看，毕昇的泥活字“薄如钱唇”，其实也是为了最

大程度地追求稳定性，保证版面的平整。

要厘清活字在印刷史中的作用，首先要彻底摒除现今把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做法，辩证地看待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科技史研究。辛德勇教授强调，不管是应用时间的先后，还是社会应用范围与影响作用的大小，在中国，活字印刷都远远不能与雕版印刷相比。1377年高丽王国印制的《直指心体要节》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一部分人眼中，这大有近代铅印技术源于高丽的势头，于是便奋起力争，希望把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定为古登堡效仿的楷模。事实上，就活字印刷的使用历史和使用的发达程度而言，高丽都要远远超过中国，原本“清楚的背景”被现在的中国本位所遮蔽了。

在毕昇创制泥活字之前，雕版印刷术在社会上通行已久，技术相当成熟，印刷品也非常精美。那么，毕昇的新技术若要取得社会的认可并付诸实用，就要考虑效果和效率两个方面。沈括记述说，毕昇在使用泥活字之前曾用木活字实验，但是“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也就是说，每一个字钉的材质疏密程度参差不齐，膨胀率大小不一，印出的成品墨色此深彼浅，毕昇只好放弃此方案，但这并非最关键的原因。毕昇为了提高活字排版的平整性，在承放字钉的铁质平板上铺垫一层敷料，即“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再制作一个被沈括称之为“范”的铁框来圈住字钉。排版完毕后，在铁板下面加火烘烤，使敷料熔软，随之用一平板在上面按压，

使各个字钉的表面处于同一平面。正是因为要采用这样的工艺来调节字钉的高度，毕昇最终采用了泥活字——木质的字钉容易与敷料相粘结，再次使用较为困难，而泥质字钉表面光滑，印刷过后再用火烘烤，熔开敷料后用手一拂即可取出再用。虽然泥活字解决了效果的问题，但也大大牺牲了效率。辛德勇教授认为，沈括的记录只是一种囫圇操作困难的“纯理论”推测，就实用意义而言，泥活字是一项失败的尝试。

毕昇的试验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是也引得一些后人效仿其术，如周必大尝试用铜板承放字钉。元成宗大德年间的王祜在《农书》中记录了他所见的活字印刷情况其一，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盃、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其二，为其不便，又有以泥为盃、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其三，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盃内界行印书。

以上都是在毕昇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大致适用于南宋时期到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之前。若是时间久远，则王祜无法有如此清楚的了解，而“铸锡作字”是在“近世”，应当是南宋后期到元代初年。辛德勇教授继而分析道，在这一时期，就汉文书籍而言，极少见到应用活字技术印书的记载，更没有活字印刷品存世，文献记载中也没有清楚说明当时所用的活字材质和具体排印工艺，因此，直到此时，活字印刷还是很少实际的应用。

辛德勇教授认为，从字体风格上看，罗振玉旧藏的这批铜活字字钉应该铸造于南宋至元代早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王祜以前试用与改良毕昇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考察，这批字钉应当也是一种改良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尝试。首先，这批字钉可以明显分为甲、乙两大类型：甲型字钉略呈扁方柱状，底部多有凹入的臼窝。个别字钉改换成扁足式突出的四隅；乙型字钉由左右两方侧视呈“门”字形。“门”字形的上下两侧，犹如立地两足，而由上、下两方侧视，可见一穿孔贯通“门”字形字钉的上下两足。

这两种类型的字钉，字号大小不一，可分成大（约1.7×1.8cm）、中（约1.3×1.3cm）、小（约0.9×1.0cm）三种型号。但在同类型号中，乙种的高度至少都要大于甲种一倍以上，这意味着甲、乙两种字钉是无法摆排在同一版面上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套不同的铜活字字钉。从字形上看，这两套字钉都铸造于同一时期，而宋元时期的铜活字在文献中很少记载，传世的也极为罕见，晚近时期同一藏家能够搜集到几批来源不同的宋元时期铜活字字钉的概率极低。因此，这批字钉原本应属于同一主人。再者，铜价昂贵，铸造也会耗费极大功力。辛德勇教授认为，只有在试验的过程中，才会这样做——基于预定样本的需要，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铸造很少一部分字钉，以供试验印刷的效果；或者分别用这两套字钉各自引出一部样本，考察其总体效果，相互比较，以便从中择取一套字钉，付诸实用。此外，从字钉的图片也可以判断其试验品性质，字

钉很多还带有初铸成形时所附带的多余铜块。而只有清除这些多余铜块，字钉才能用来排版。即使是处理得比较像样的字钉，也基本没有使用痕迹，这些都表明这批字钉是没有用过的制品。

辛德勇教授继而分析，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的高度有明显的差别，如果不用敷料，排版出来的字版，版面一定很不平整，而之前谈及的“臼窝”和“双足”的形制特点明显有利于与敷料结合，调整版面也相对容易。而乙种字钉下方的穿孔，若以“铁条贯之”，正合乎“作行”，也即整齐字行的需要。如此，参照王祜所说的锡活字的情况，也可以对这批铜活字的铸造年代做大致判断：这批铜活字字钉应与王祜所记载的锡活字同时，都是为改良活字印刷术所做的尝试，时间大致是在南宋后期到元代初年。铜与锡同属金属材料，对于印刷用的活字字钉来说，表面形态接近，因此锡活字因为表面光滑“难于使墨”而导致成品“率多印坏”的结果，铜活字也难以避免，这应当也是这批铜活字字钉难以付诸实用的原因之一。而正因为金属活字的试验失败，王祜才会重新尝试木活字，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与中原王朝控制区域内的情况不同，西夏很早就应用了木活字印刷。史金波先生认为，“一些西夏境内需要的汉文书籍，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宋朝或金朝如果已经刻印，西夏就可以引进，而不一定需要自己重新开雕印刷。西夏文书籍则不然，非要在本国雕印不可”，

这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平阳府姬家雕印”《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版画也可

以证明，此时西夏的运输成本大于雕版的制造成本，印刷业发展比较落后。辛德勇教授认为，从西夏文本中一些注记书名、版次的汉字也可以推断出从事雕版、印刷和装订的工人主要是汉人，西夏的雕版印刷技术来自中原汉地。而这些汉地刻工若是懂西夏文字，雕字的效率必然大幅度降低，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西夏很早就应用了活字印刷。从西夏的活字印本来看，单个字的墨色此深彼浅，差异明显，而如果采用泥活字印刷则应该大体相同，这正证明了排版时未用敷料，导致了字钉或高或低。而在不设敷料的情况下，泥活字没有采用的必要。这种深浅不一的印刷效果在后世的木活字印本上则普遍存在，因此，西夏人的活字应当是木活字。至于是否受到过毕昇泥活字技术的影响，则无法肯定。

如前所述，王祜在金属活字失败后开始改用木活字印刷技术，完全舍弃了下设敷料这一道工序。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可行，但是这一创造在社会应用层面上却明显败给了雕版印刷，原因何在呢？辛德勇教授列出了四个需要考量的方面：第一点是社会对出版速度的需要有多大；第二点是出版者可承受的出版印刷费用是多少；第三点是读者和作者对印刷品质量的要求有多高；最后一点为对所出版书籍多次重印的期望有多高。

在明代中期以前，雕版印刷大体可以满足社会需求，人们更为看重最后两项因素，看重雕版印书的良好质量。但是明代中期，情况开始转变。井上进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中指出，明朝的出版业在正德、嘉靖年间繁盛。黄永年先生认为，是“前

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导致了文人们不再满足于“四书”、“五经”和当时人的诗文集，要求多读古书，而古书的旧本在这时已流传不多，因此需要翻刻。世人的阅读范围大幅度扩展，印刷业的效率便要相应提高。

辛德勇教授指出，明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字体总体上依旧是“刀”将就“人”的状态，刻本字体追求与写字字体的相近，但已经颇为松懈，精美程度降低，大体上是赵孟頫的“赵体字”，雕版效率低。而这一时期人们便开始转向活字技术，较大规模地采用了金属活字印书。从效果来看，墨色依旧是或浓或淡，可见没有使用敷料，那么采用金属活字便与调整版面平整度无关，应当是为了增强字钉的耐久性，加大字钉重复使用的次数和时间，进一步提高活字印刷的效率。但是这种活字印刷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在万历年间便结束了。这是因为雕版印刷渐渐失去了人们毛笔书写时的笔意，笔道的形态已更便于运刀，从“刀”将就“人”变为“人”将就“刀”，辛德勇教授将这种变革简称为“嘉万革命”。新的字体高度程式化，为雕字工匠专用，即现在所说的“宋体”，与人们日常用毛笔书写的字已经不同，书手必须经过专门的“行业培训”才能上岗。由于这种字体专为“刀”刻而设，技艺熟练的书手上版速率比原来更快，刻字效率大约可以提高一倍。

活字印刷退居印刷市场的边缘后并未消失，但是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常见于印刷家谱祠志和“低端”文人诗文制艺的集子。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现了朝廷主持的大规模铜活字印刷，如《古今图书集成》等，

印制的铜活字是刻制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活字书籍的正文大字及小字都镌刻得十分精良，从版框拼接的严密到版面高低的平整，乃至字行的端正都极其完美，骤然超越以往的活字印刷。考虑到这些铜活字本中最早的一部《星历考原》印行于康熙五十二年，基本同时，康熙命来华耶稣会士马国贤，用西洋蚀刻法印成了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辛德勇教授认为，这时的铜活字印刷应当有外来因素介入，与耶稣会士传授的西洋技术相关，可能是接受了马国贤传授的蚀刻技术，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活字的排版技法。而这样的铜活字印刷活动亦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在世间传承扩散，从福州林春祺耗费“二十余万金”用二十年间时间铸造“大小各二十余万字”来印书的例子中，也可看出铜活字印书并没有普遍性意义。

辛德勇教授最后总结道，罗振玉旧藏铜活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当时就有了发达的铜活字印刷，它仅仅是一次失败的试验所留下的一些遗物而已，体现的只是古先人们对活字印刷的探索历程。提问环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听众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如雕版印刷术在中西方实践情况的对比、上墨手段的改良等，辛德勇教授与高峰枫教授也一一做出解答或补充。

（撰稿：杨晓清）

83

叶启政：韦伯之“理念型”中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2018年5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韦伯之‘理念型’中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主持，北京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张静教授首先就叶启政教授主要的学术贡献及其本人与北大的渊源做了简单介绍。讲座伊始，叶启政教授表示将结合最近的所思所想就韦伯“理念型”与自己关心问题相契合处展开论述，而非针对韦伯“理念型”概念深入讨论其社会学思想。叶启政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深入到所谓的“后设理论”的问题中考察韦伯“理念型”概念。“ideal type”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相较于“理想型”，被翻译为“理念型”更符合德国哲学传统对“idea”概念的论述。

叶启政教授选取哲学社会科学史作为外部视角，以及当前社会呈现的基本形态与其理论论述作为内部视角。结合这两重角度，本次演讲以“正负情愫交融”亦即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爱恨交加”现象为焦点，探究“理念型”方法策略的适用性及其深层内涵。就外部视角而言，叶启政教授表示，美国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间占据着主流位置，而美国学界对于



叶启政教授

韦伯“理念型”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这种理解以特殊的“实证主义”立场为基础，将关心的焦点放在了理念型的客观性或价值中立（自由）的层面上。或许其理解路数未必是错误的，却忽视了马克斯·韦伯“理念型”概念可能展现的更多社会科学内涵。

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其对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一般来说，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是美国社会学界引入韦伯思想的开山之作。20世纪40年代，以帕森斯、爱德华·舒尔茨（Edward Shils）、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美国

社会学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韦伯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作品，而这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英语世界对于马克斯·韦伯引介吸收的基本文献。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对于韦伯的讨论逐步升温、步步深入。社会学家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将韦伯称为“魔影变幻的方法论主义者”；而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与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两位社会学家则从结构与能动的二元论视角讨论韦伯；此后，多位美国社会学家就韦伯究竟是结构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展开论战。可以说，上述视角无不带有鲜明的实证主义立场，对韦伯造成了片面的理解。

而在晚近的讨论中，印裔美国学者巴谢特·科什尔（Basit Koshul）则已经意识到韦伯社会学思想中隐含的三组核心议题（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科学与宗教）以及这三组二元关系背后包含的现代意义，并以关系性的概念理解上述议题。叶启政教授认为，科什尔基本上掌握了韦伯思想的核心，且揭示出韦伯已经注意到的、在主观与客观二元之间蕴藏的复杂纠合关系，但还没有深入其对人类学心智状态“模糊性”（ambiguity）与矛盾性（ambivalence）的理解之中。这种模糊性的探讨，可从韦伯思想与其受尼采的影响角度加以分析。社会学家沃伦已经注意到，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受尼采的影响很大。更进一步说，韦伯在谈论理性问题时，已经采取了贴近于尼采的思维模式，亦即在《查拉莱斯特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书中描述的有关矛盾关系的论述。

具体举例来说，善恶二元永远无法独立存在，光明与阴暗无法截然分开，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源自笛卡尔的二元对立之“断而再断”的思维，而是一种连续的思维模式。在叶启政教授看来，这种思维模式贴近于东方传统与后现代社会的状况。从韦伯自尼采处继承的模糊矛盾观念出发，我们可重新构建一个面向后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论基础，并进一步讨论模糊矛盾性与秩序规则之间的关系。回到美国社会学对韦伯正面与反面的理解，他们除了具有实证主义的视角之外，还含有一种来自于自然科学的“体系整体观”。这种“体系整体观”将自然与社会均看成是有次序的，且这种次序观念所隐含的秩序是可以寻觅的。但韦伯对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混沌性”之上。这种混沌性式的理解可将社会的固定意涵消解，创造一种社会万花筒式的探寻研究模式，从而创造不同的社会理解。由此，我们便可转入从内部视角对“理念型”



听众勤做笔记

作进一步考察。

在这里，叶启政教授引入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两种不同的关照。第一种关照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在有机体的思维模式之上衍生出的体系整体观，塞尔托将之称为“窥淫癖式的全景敞视”，亦即在社会进行考察之前已经先验地存在一个全景式的关照。这种全景式的关照实际和柏拉图以来含有内在秩序的“乌托邦”观念相符合。而另外一种关照则是都市里漫步者的局面交相置换。这种关照可以用博尔赫斯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所描绘的路径之间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理解，亦即有关研究路径的选择并非建立在一种先验真理观的基础之上，而是由“漫步者”所具体持有的选择性感知态度为主轴。不同于全景式的敞视，这种关照没有先验的目的性而是以经验为取向的。由此，路径的不同可造成不同的社会图像。

在叶启政教授看来，博尔赫斯正是受到尼采模糊性的影响才会创造出这样的小

说，而由其小说出发，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尼采与韦伯的矛盾模糊性概念。根据这种想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韦伯的矛盾模糊性是一种超越于设想的理念“乌托邦”观念。社会并非由先验的次序所决定，而是由时下的经验和情境所展现的。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言，主客双方存在一种相互交融的情境。就行动者的行动内涵的终极意义而言，叶启政教授认为，韦伯追求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理念之追求。因而，他的研究会深入到对中国、印度等各文明传统的研究中去。

讲座结束后，张静教授就理念和黑格尔与韦伯思想的关联等问题同叶启政教授展开讨论。讲座最后，叶启政教授就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过程和人生经历发表感悟，鼓励同学大胆质疑已有的研究思路，反思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社会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撰稿：玉书涵）

84

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2018年5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主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并作评议。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理论著作。该



茅海建教授

著作体现了康有为思考“大同”的过程，而本场讲座所讲述的“大同三世说”与其后来的《大同书》有较大的区别。以茅海建教授的话来说，是用二十年时间来研究100天的“戊戌变法”，并由此来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轨迹。

一、思考的起点——“伪说”与“中体西用”

较早时期，茅海建教授曾进行过有关“戊戌变法”的多项研究，并在思考其性质为何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难题。其一，康有为曾在1898年之前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提出了“新学伪经说”和“孔子改制说”，以一种极端、激进的方式对中国传统经典和早期历史进行否定；其二，1891年，康有为在一场论证中提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这是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然而，康有为所理解的西学并非西方思想与制度，而仅为数学中的

“几何公理”。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浮出水面：康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改革的呢？作为一名晚近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一次偶然的机，茅海建教授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并在著述中看到了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二、时间的错位——《大同书》应该如何解释？

茅海建教授提到，之前，有学者已论证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书》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康有为自称“吾年二十七，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松园澹如楼……著《大同书》”，而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表明该书其实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写成的。由此，学界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戊戌时的政治思想。

较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说法。梁启超分别在1901年《南海康先生传》、1911年《大同书成题词·注》与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三著作中论述了三种关于《大同书》写作时间的说法，分别为：“传授门生”时、1901-1902年与“秘不示人”著书时。此三种说法均有相互抵牾的一面，但根据具体的文献资料，茅海建教授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且前者在戊戌时已有著书（《春秋三世义》与《大同学说》），但绝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大同书》。

三、“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汤志钧教授经研究发现，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而茅海建教授则认为，当再次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内容十分简略。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谈及“大同”的内容仅仅有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相关“大同之世”的内容仅有五条。上述十一条文字难窥全豹，更无法全面说明“大同三世说”。

茅海建教授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即：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要待后人来实现。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可以将戊戌前后时期“大同三世说”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会有致命的缺陷——以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的著述来说

明其在戊戌时的思想，是不精确、不具有说服力的。茅海建教授表示，他当时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而“由梁渡康”则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方式。

四、“由梁渡康”——贴近“大同”核心的方式

茅海建教授认为，虽然梁启超在谈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时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向梁启超传授过“大同学”。那么在梁启超入学的1891-1896年，康有为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梁启超呢？茅海建教授发现，1896年11月，梁启超在与严复进行“议院”论战时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做自我辩护，并于1897年10月在《时务报》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

这是“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被完整表述出来。写完这篇文章后，梁启超启程去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

习。其时，梁启超大力宣传康有为思想——1989年与学生合刊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便涉及有多处“大同三世说”。其中，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则从“仁、义”出发，谈大同、小康。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对其条理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然而，世人没有完全听闻康有为的学说不是因为“秘不示人”，而是要“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于是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大同”一段，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这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于此，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五、“多言大同”——康门与梁鼎芬的评论

茅海建教授提出，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门下其他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其一为康有大弟子徐勤。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地球大势公论》，言“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异而终于同。”其二为弟子刘桢麟。他在《知新报》发表《地运趋于亚东说》，多处涉及“大同三世说”，呼唤“大同世界”的到来，并表示“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茅海建教授认为，

这两个人之外，其它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然而若从总体来看，深度远远比不上梁启超。同时，与之决裂的昔日好友梁鼎芬，在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其中第三条便称“康有为之教……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创为化三界之说”。文中虽有政敌的诬词，却也间接印证了康有为的“大同”之说。

以上，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简说，到梁启超的多种著述，再到门下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政敌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氏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六、“创制立教”——康有为的“大同”之志

在完成了对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论述后，茅海建教授表示，对于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

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而从“大同三世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康有为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之中。

只是，在清朝，康有为的理论不可能被应用政治上，他的目的是“创制立教”，他认为“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而“今日学者”即为康有为本人。他也曾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到“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

“黑帝乃降精”其实是称孔子母亲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有为否认孔子的人

间生父，有意模仿了基督教“圣诞说”，办《强学报》时使用孔子纪年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由此，茅海建教授认为，康有为此时有意于“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若有可能的话也想做帝师。因此，当康有为谈及戊戌政变前自己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

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对此，茅海建教授感触颇深，康有为的“大同”之志并非“造作”，或许真的是有“天降大任，使命在身”的力量。

（撰稿：孙雅馨）

85

约翰·基恩：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27)

2018年5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27)”。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本场讲座中，约翰·基恩教授主要介绍卡尔·施密特对自由主义议会的看法和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缺陷和议会未来改革的方向。讲座伊始，他首先介绍了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背景以及施密特的个人经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逐渐兴起，自由主义议会很难再吸引人们的兴趣，许多



约翰·基恩教授

曾经坚定支持议会精神的人也开始质疑代议制民主的效率。而卡尔·施密特则是欧

洲这一时期最精明、最具争议的议会评论家。施密特曾任职于纳粹政府，在此期间，他担任过“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的主席和“德国法学家日报”主编，参与了焚烧犹太书籍等活动，并为希特勒的政治屠杀进行辩护。但同时，他对议会制度的研究直指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质疑议会是否有协调二者的能力——研究涵盖了道德、政治、人性、国家主权、独裁制度以及民主的未来发展等多个方面。因此，施密特的作品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次讲座中，约翰·基恩教授从多个方面对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思想进行论述。

一、自由主义

施密特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其反政治特质，即对国家权力的反感。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仅仅是为了提高公民社会内部的个人自由。因此，政治家们的任何特权都是邪恶和不公正的，都会被自由主义指责为暴政。与边沁、基佐、霍布斯等人所主张的内部统治、殖民扩张、军事发展等方面强有力的国家不同，施密特强调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和言论自由。公民社会中言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存在不仅能够中和国家过于庞大的权力，有时甚至会使用后者变得多余——社会力量的均衡也因政治监管的缺失而得以存在。

二、议会

在此基础上，施密特指出，议会是保障国家与公民社会平衡的关键机制。议会应当公开、公正、平和地解决公民间的分

歧，并且使国家机构和行政部门按照法律规范履行职责。施密特认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谈判和妥协不是议会的专有特征，这些过程也存在于其他地方，例如公司或者政党的会议上。因此，议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公开和讨论。它假定人们都愿意被其他观点说服，同时保证自己的观点不受效忠对象或私利左右。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议会程序不应被限制；议员们应当享有言论自由和豁免权，同时不受党派或选民的控制，而是服从自己的良知。在这个意义上，议会可被视为公开的政府，议员们要接受新闻的公开报道，并被置身于公民的注视下；而公民则可通过自由媒体了解真相，并向议会传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

三、议会的精神危机

施密特关于议会时代自由主义的论述是简短的，但他依然指出了其在二十世纪面对的深刻危机。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议会及其理想正在逐渐消亡，它或许会存活下来，但如同君主制一样变得残缺不全。施密特认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导致议会产生危机的根源。随着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政府不得不扩大其权力范围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例如工作权和生活权。然而，这种“行动的民主”模糊了国家和社会的界限，从而改变了十九世纪非干涉主义宪政国家的趋势，使公开的议会过程被大众民主（特别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破坏。自此，议会变得混乱而平庸，并成为党派实现特定政治或经济目的的工具。据施密特解释，因

为议会和民主的基本原则相互矛盾，“议会民主”这个混合词是不可能存在的。民主决定公民享有决定和修改法律的最终权力，国家可以并且应当与民众的意愿保持一致。因此，议会乃至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

四、政治

简而言之，施密特的政治观点就是反对他所谓的“人类学乐观主义”。政治世界是多元化的，伴有自私、背叛、公开分歧、暴力冲突等行为。施密特认为，政治的精髓就在于“朋友”和“敌人”间的紧张关系。真正的政治家可以分辨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而那些无法做出区分的人会被敌人玩弄于掌中。在此基础上，他引申出五点启示：首先，所有的政治概念、图像和术语都具有争论的意义，诸如国家、共和国、社会、阶级等等。同样的单词在敌对情况下可以同时作为信号、密码甚至武器。其次，领土国家是政治的表现，而非来源。战争同样也是政治的表现，而非其“其它方式的延续”。第三，国家定义了“朋友”和“敌人”，并保护它的公民不受后者侵害。第四，道德是由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定义的，而政治则描述了不同领域中敌友的竞争强度。最后，暴力或战争会一直存在，即使是公开的议会讨论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有政治智慧的人必须牢记，他们的对手总有实施暴力的可能性，议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五、独裁统治

施密特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谁在危

急时刻享有决定权，而只有精明、意志坚定和武装良好的政治领导层才能决定这类危机问题。因此，最终决定权既不在议会，也不在宪法及法律中，而是在压力下行使决策权的个人或小组。施密特以此为基准划分了两种不同的主权领导形式：其一是“主权专政”，它力图推翻旧政，并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政治法律秩序。主权专政是短暂的，它只有在民众能够自由地表达其意志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才能持久下去。其二是“委员会专政”，它并不反对现有宪政秩序，只是希望克服危机并重建常态。虽然委员会是暂时的，但它依然要尽可能强大。它需要拥有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秩序的权力，甚至包括暂停宪法的部分内容。在施密特看来，专政独裁对于解决危机是必要的。在紧急情况下，公民必须敬畏国家，允许专政政权取代议会进行决定。施密特的这种观点虽然确保了国家权力和行政官僚机关的统治地位，但也会导致议会的影响力下降，同时放大反民主运动和专制政党的吸引力。另外，施密特没有意识到当独裁者面临着反对派的压力和各种诱惑时，临时独裁总是有成为永久制度的倾向。宪法，即使是由独裁政府制定的，也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宪法修正案（包括旨在恢复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的宪法改革）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六、自由主义时代前的议会

施密特忽视了议会在自由主义时代来临之前的历史。在议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贵族、神职人员、农民和市民为代表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议会协调其与世袭君主

间的关系，捍卫自己的权力。同时，君主也会为了寻求意见而召集议会。因此，早期的欧洲议会绝不是软弱或间歇性的，而是实际上的权力轴心，它参与到立法、行政和外交政策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忽视了自由主义议会在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施密特关于议会制兴起与衰落的理论很难有说服力。早期议会很少会通过明确的政治理论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而是将自己的要求建立在古老的习俗和特权之上。施密特关于议会是质疑政权的始作俑者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早期人们通过议会在环境破坏、强制征兵、农民过度劳动等一系列问题上争取自己的权力，甚至抵制君主的决定。因此，议会不仅是服务了特殊利益阶层（比如自由资产阶级），更是平衡了公民社会与独裁政府的关系，从而捍卫自由和宪政精神。

七、议会改革

施密特没有考虑到二十世纪议会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因此，他得出了议会必然衰落的结论。但是，议会现在面临的危机仍然值得我们进行分析。首先，议会通常由组织良好的政党控制（特别是议会高层），这不仅体现在对议会程序的直接控制上，还存在于非正式关系的影响中，比如行政人员与议会议员的私人交往。由于这种做法，下议院几乎沦为了咨询机构。其次，传统的议会程序或正式的宪法设计正在逐步加强纪律和行政权力对议会的控制。比如，政府通过确定优先级间接确定议会议程，并防止议会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组织辩论或通过法案。第三，大众传媒对

政党领导和公民社会的报道降低了议会的权威，加强了政治领袖领导权，同时将政治的重点从议会转移到议会外领域。此外，政府不受限地扩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许多秘密机构的出现让议会无法就关键问题作出决定。最后，二十世纪下半叶，北约、联合国等跨国或超国家组织开始迅速发展。这些组织的存在将决策权转移出了议会，并且改变了政府原本应当坚定的谈判立场，从而阻碍议会“干涉”超国家的谈判。

面对这些危机，约翰·基恩教授对未来的议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如果人们能够承认政党作用的局限性，政党对议会的过度控制也会随之减弱。其次，由议会多数党或者联盟定期选举部长，可以削弱总理及其他行政权力对议会的干预。灵活的议会召集时间、地点，舒适的办公环境，加之议员们的平等发言权（特别是在紧急事务上的话语权）都有助于议会克服当前面临的危机。这些变化反过来也会改变议会的媒体形象，加深民众对议会的了解。更进一步的，民众甚至可以通过常设委员会参与并监督议会和国家机器。最后，议会应当设立更强大的常务委员会对国家在超国家机构中的行为进行协调和监督，这不仅有利于恢复议会权威，更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复兴。

（撰稿：柴照琪）

约翰·基恩：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



2018年5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207宁肯教室举行，主题为“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一主持。

讲座伊始，基恩教授首先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做简要介绍。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所享有的盛誉甚至使得学界以其名字命名了一个小行星。1906年，她出生在一个接近汉诺威的日耳曼—犹太家庭里；1933年，她被迫离开了德国，并且在巴黎度过了接下来的八年时间，在此期间，她一直为旨在保护犹太难民的公益组织四处奔波；1941年，阿伦特移民到美国，很快融入了纽约当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并在纽约的大学里担任诸多重要的学术岗位，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离开这个世界。

谈到阿伦特，就不能不提及她最享有盛名且对学术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项学术工作。其一为《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该书出版于1951年，是一项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杰出研究。阿伦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其二为《人的境况》

（*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出版于1958年的专著是一项探寻“vita active”（劳动、工作与行动）根本范畴的原创性哲学研究。此外，本书也为一种关于政治作为公共生活的崭新理解提供了依据与论证。

基恩教授表示，在其政治学著作（尤其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持以下观点：极权主义已然在根本上打断了西方历史的进程，西方传统的道德与政治范畴不再适用于分析现实政治，而这一打断随着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兴盛变得不可逆转，纳粹与斯大林主义对西方政治传统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在《人的境况》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中所收录的一些论文中，阿伦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有关现代性的寂寥情景。阿伦特对于现代性的说明围绕着世界的异化、社会力量的崛起与物化劳动的胜利展开。基恩教授认为，对阿伦特而言，真正的现代性意味着政治行动与公共事务之范围的受限与削减，以及对于私人生活与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不受公权力侵犯这一要求的声张。现代性意味着不能被先前公私区分所言说清楚的、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也意味着官僚制的公共管理和劳工自治，而不再是政治精英的全面支配与操纵。因此，诸如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政府的出现实际上是恐怖与暴力制度化的结果，个人失去

了他们原先所具有的传统价值体系，霸权与社会的同质化（conformity）取代了社会的多样化趋势与个人的自由，动物化劳动与世界的异化困扰着人类——以上种种是对西方本来应走向现代性之历史进程的打断，也是对西方历史传统的抛弃。

基恩教授继而指出，针对西方现代性所面临的严峻处境，阿伦特提出了致力于恢复西方文化传统的方案。她确信，有必要从西方过去的文化传统中找寻并恢复值得恢复的“已然忘却的宝藏”。只有如此，才能解决极权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并为西方世界走向未来提供灵感与动力。具体而言，阿伦特试图回溯古代希腊城邦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与政治传统。围绕着她对于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的理解，阿伦特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现实政治的思考——这便是她关于政治行动的理论。

受古代希腊与罗马传统“实践”（Praxis）学说的复兴之启发，阿伦特有关政治行动的理论得以展开。通过区分实践与制作（Poiesis）的概念，她将其与自由和多数决的政治原则联系起来，政治行动与公共演讲的紧密联系得以呈现出来。阿伦特有力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于问询与透明政治的强烈倾向，以及对于政治行动在根本上意味着政治行为主体之集合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便是阿伦特认为的古典政治传统与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即便阿伦特认为，劳动、工作与政治行动在促进人之健全发展的作用是等同的，政治行动仍然是使人之为而非动物的十分关键的因素。政治是关乎

良善生活的目的本身而非为了维护社会手段；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做出政治选择的能力，而是在政治行动的开端享有平等的政治行动的能力；勇气指的是政治行动与表达自身政治观点的意愿；权力意味着政治行动与自身政治观点之间的关联，即将自身政治观点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将权力与力量（strength）、强力（force）、暴力（violence）等其他容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权力更倾向于言说人们为着一些共同的政治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过程而非单个个体的倾向，它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而非自然原初就存在的现象，它仰仗的并非是暴力的压迫，而是经过理性的讨论而达成的一致。一言以蔽之，对阿伦特来说，“权力”最核心的意涵就在于，人们为着政治目的聚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基恩教授认为，阿伦特对于“权力”概念的界定是独特的。在她眼中，权力就是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合法性（legitimacy）的最终来源，政府机构必然要用尽浑身解数去适应各种情况，体贴公民群体的需要，并对公民群体的问询给出良好的回应，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制度便是良善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而言，人们的支持塑造着政治制度与政府组织体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便来自于人们的这种“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多数（plurality）成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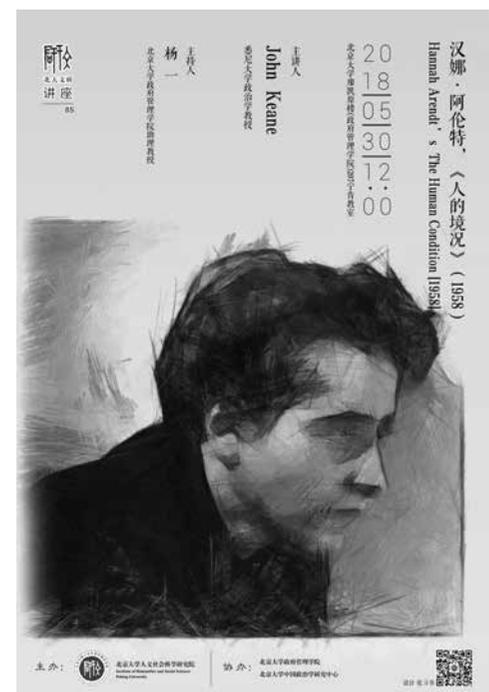
基于以上对政治本质的思考与对古典政治的考察，阿伦特提出了她所设想的理想政治之原则。其一是自我省察（disclosure），即在政治行动与政治立

场的表达中，个人能够真正地发现自我乃是世上一独一无二之自由个体，能够真正地发现其独特天性之所在。其三是回忆（memory），即通过政治行动，人们不断创造出系列政治传统与政治惯例，而这能够为西方世界走向未来提供灵感。在阿伦特看来，对于历史传统的珍视是古代希腊人的重要思维方式，政治建构了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回忆，这些回忆也将成为共同体走向未来的重要条件。阿伦特认为，对不朽的不懈追求是古典时代人们的重要志趣。其四是脆弱性。所谓城邦，在根本的意义上并非指那个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城邦国家”（city-state），而是由共同行动与共同主张的人所组成的“政治的”共同体——这些“政治的”人们之间的真正关联（link）才是“城邦”一词之真正政治意涵。相比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城邦，这种建立在人心上的城邦也更加脆弱。其五为不可预测性，即政治行动是不可预测的。政治行动是人们自由意志的呈现，是人们试图革新与创设制度的能力的呈现，也正因为此，政治行动也是无边界的（boundless）。其六为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即任何一个政治行动都开启了一段无法被阻挡的政治进程，且政治行动一定会产生不可消除的影响。

以上便是她对具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设计的思考，但到此还并不够。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阿伦特对决断（judgement）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她对政治对人的根本要求与何者为政治之根本美德的思考，而这也是其政治思想能对今人产生持久深远影响的关键所在。

在基恩教授看来，阿伦特对于决断的思考集中呈现在《文化大危机》（*The Crisis in Culture*）与《真理与政治》（*Truth and Politics*）这两篇论文中。她认为，决断主要言说的是一种在公共场域中决定采取何种政治行动为宜的能力。这是一种的政治的能力，它不仅要求政治行动者应当从个人的立场与视角出发采取行动，还要求对于所有在当下可能与该行动有关的政治行为主体之立场与视角的充分把握。这些被阿伦特称之为“决断”的能力，古希腊人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或说“洞察力”（insight）。与哲学家所具有的真理性认识有所不同，“实践智慧”更加依赖于政治家的常识与意见性认识。

作为一种政治的美德，决断并不意味着强制与专断，它只能去吸引而不能迫使



他人对你所主张的想法表示同意。决断在本质上与真理无涉，它所要求的是“代表地思考”(think representatively)的能力，并要求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从诸多的视角对世界产生整全而严谨的认识。阿伦特认为，不断地辩驳讨论和开阔视野对于政治家的决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意见性认识同真理性认识不同，它从来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这也对政治行动的原则与政治的美德有着根本的影响。

讲座最后，基恩教授谈到了真理性认识与意见性认识。阿伦特认为，真理性认识应当属于“逻各斯的王国”(the realm of logic)，属于严格的科学世界，而不属

于公共场域与政治的世界。这是因为它反对争论，反对人们表达自身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对于真理性认识的狂热追求一旦侵入政治的世界，便意味着严格的强制与专断。正如极权主义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反对多样性与争论将在根本上扼杀政治。因此，真理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事实上，阿伦特对于意见表达的捍卫不仅仅出于她对真理之反政治性的考量，还在于她所主张的这一观点，即真理性认识只能丰富政治讨论的背景(dialogic context)。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撰稿：李健)

约翰·基恩：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



2018年6月6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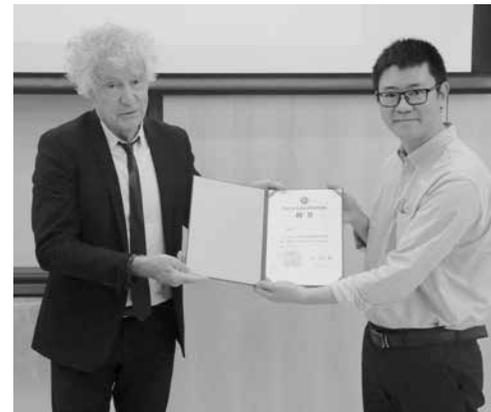
讲座伊始，基恩教授回顾了前两讲的核心要点。他表示存在两种颇为不同的政治观：第一种以施密特为代表，认为政治是一个追求权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

定义盟友和敌人，并牵涉抗争、暴力、军队和警察，最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谁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是一种新霍布斯主义式的理解；第二种是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式政治观，认为政治并非暴力、敌人、战争这些对立性因素，而是关乎如何处理由个体以非暴力形成的公共群体所产生的权力问题，并涉及权力的分配问题，最终需要回答的是如何追求好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基恩教授认为，福柯的政治观与上

述两种均不同。本场讲座中，基恩教授希望通过《性史》来引出第三种政治观以澄清西方语境中的“政治”(politics)概念，并启发对自身所处语境的思考。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福柯生于1926年，于1984年患艾滋病去世。1969年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除《性史》外，他还著有多部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等等。福柯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从1970年代开始为边缘群体的权利发声，并出现在妇女运动、人权运动等各类社会运动中。他本人是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性史》自我思考的产物。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在该书中的观点也被时人简化为“人本身就是政治的”这一广泛流传的口号。

基恩教授表示，福柯在《性史》中的研究方法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萨特作为理解其思想的背景不可或缺。不只是在研究兴趣上类似，福柯对自己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强的批判，但他对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思考持怀疑态度，从而拒绝了萨特式的主体特权——他称之为“先验自我”。其二，从《词与物》中就体现出的“回归语言”(the return of language)在《性史》中延续了下来，语言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对象。受索绪尔启发，福柯认为，人讲话的过程就是展现主体性的过程，而语言本身又与知识关系密切。其三，他对于历史学的批判性思考。在其早期作品中，福柯提出了考古学(archaeology)方法，主张回到过去，通过深挖过去的结构来理解古代



院长助理韩笑为基恩教授(左)颁发聘书

语境中的人的塑造方式。之后，他认为这一方法存在缺陷，不能很好地解释一种话语如何向另一种话语转换的问题。于是，福柯又提出了谱系学(genealogy)方法，目的在于检视语言的结构，进一步考察权力、知识以何种方式塑造了人类过去的生

活。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批判了“性压抑假说”(repressive hypothesis)。当时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过去的人们羞于谈论性和身体，性行为也不能作为餐桌上的主题，即使一位年轻女性怀孕也不能谈论。简而言之，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性一直是被压抑的，即身体和人们对于身体的欲望受到权力的压制。但福柯认为，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

从18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西欧社会并非如此。在福柯看来，“性”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不断出现在各种话语中，如基督教忏悔仪式中对性细节的大量描述以及心理学对年轻男孩或女性的诊断。这些都是知识不断介入的过程，人们试图探

寻性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关于性的新术语不断被发明，例如对同性恋的分类、恋兽癖等等，直到最近发明的 LGBTI（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人士）。现代西方社会并非在压抑性，而是对性始终抱有热情和幻想，关注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分类，最终发现了关于性的“真理”。

基恩教授继而谈到，为了进一步挑战“性压抑假说”，福柯认为有必要构思一种新的“权力本质”（the nature of power）来澄清性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形式的权力不必然在本质上压抑性，而是主体生产性的，所以才声称“在政治思想和分析中，我们依然没有砍掉过国王的头”。当谈及政治和权力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国王、王后、有权力的人和权力国家。正如施密特所认为的那样，政治和暴力、夺取生命有关，政治强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然后人们使用暴力反抗。

但从性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关于政治和权力的观点并不成立。福柯列举了四种性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女性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化、生育行为的社会化、性倒错的精神病学化。这些对权力提供了全新诠释：其一，每个人的全部生活，从卧室到战场，都充斥着权力关系，没有人能够逃脱；其二，权力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一种垂直关系，也是一种水平关系；其三，权力会侵袭所有人并限制人们的活动，没有什么在权力之外。

总之，“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它拥抱一切，而是它来自一切”。无论我们在讲话、投票还是工作，权力都在每个人的一切关

系中起作用。这意味着当我们谈及身体和性时，同样也无法脱离权力。我们的身体、我们表现出的性态、我们从接吻中获得的快感都在权力之中。权力可以塑造人的认同、塑造人的身体。施密特认为权力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为有权力的人可以夺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阿伦特则认为当人们成为公共的一分子时才会产生权力，而谈及身体也只是强调劳动属性。与二者不同的是，福柯认为人类的身体才是我们理解权力和政治的核心。

主体权力的观念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人们会说“一个人很有权势”、“我没有权力”或者“川普拥有权力”等等，但这些是对权力的误解。权力往往将自己隐藏起来，制造出伪装、沉默和神秘的假象。作为一种关系，权力无处不在，它没有内部也没有外部，存在于所有组织中。即使是最小的权力，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资本国家中，权力限制身体，但也可以因此被改变。而就性来说，各种性态并非给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追溯的自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身体的就是政治的”。在后来的系列演讲“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生物政治的诞生”（1978-1979）中，福柯用“治理”（government）代替“权力”（power），以“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作为分析权力的合理性、技巧和支配（governing）的手段。

基恩教授强调，若以这种政治观重新看待性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性政治”。《性史》是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

解放”运动的批判。人们当时认为，性是自然和健康的，只要摆脱来自于文化道德、社会经济的束缚，就可以获得性解放。但福柯认为，这些人误把性当做对抗权力支配的方式，而忽视了权力的无所不在——即使那些带有抵抗意味的性活动也仍有权力因素在运作。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还区分了东西方对于性的不同理解方式。与西方对性进行分类、限制和分析不同的是，在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中，性被视作一种艺术。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允许或禁止某种行为，性快感也不是服务于真理和科学的。

但基恩教授还指出，福柯在第一卷中并没有谈及理想中的“性政治”，而这也是读者特别希望了解的问题。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自我的呵护”中，福柯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像阿伦特一样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却发现古希腊人一方面通过道德规则对性进行自我限制，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外部约束而实际上相当宽松。。希腊人的性活动很开放，《会饮篇》里提及有年轻男孩参加的酒会、同性恋、同性恋、婚内婚外恋；但同时又强调恰当克制的必要性。希腊人的性活动不受政府的约束，可以说是自由的。但福柯认为，比道德规则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呵护。在希腊罗马人看来，性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要以身体的美和通过别人获得的快感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可以说，这对希腊人来说已上升到“生存美学”的层面。

这一点对福柯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福柯肯定了这种关系，并通过《性史》为一种新的政治观奠定了基础，即身体的政治学与个人的政治学。他既没有写人们吃的食物，也没有写人们穿的衣服，更没有写人们因环境破坏所遭受的个人危机，但他提醒每一个人都可以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不应存在一种单一的性规则，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还是跨性别者，每个人都可通过对自身身体和他人的练习达到对自我呵护。在尊重他人时，政治变成了对身体的关注已经对自我的呵护。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意义上的自我呵护，从而有益于让每个人获得幸福生活。

讲座最后，基恩教授强调了福柯对“革命”的批判。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一起追求新秩序固然是好的，但福柯批判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那种以军队、警察为对象来反抗统治权力的做法。往往，这种反抗所面对的是一种易变的、暂时性的力量，且最终只会在商业贸易、大学和其他组织中制造社会裂痕。基恩教授表示，按照福柯的权力观，真正的反抗应是网状的：人们紧紧围聚在一起，且每个人都在其中抵抗“生物-权力”（bio-power）——人们正是在这些权力组织中求生存的。理解政治意味着身体、自我关系以及在和他人关系中的自我呵护。这也是福柯对于政治的第三种理解至今依然如此重要的原因。

（撰稿：徐军）



约翰·基恩： 娜迪亚·乌碧娜蒂《代议制民主：原则与谱系》(2006)



2018年6月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四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娜迪亚·乌碧娜蒂《代议制民主：原则与谱系》(2006)”。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马啸主持。

讲座伊始，基恩教授简要回顾了前三次讲座的主要内容。通过强调施密特、阿伦特和福柯对于政治和政治生活内涵的不同理解，基恩教授引出了娜迪亚·乌碧娜蒂对于政治的理解。基恩教授认为，乌碧娜蒂从密尔的思想和古希腊的民主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回溯其演变和重新阐述特点，乌碧娜蒂向人们呈现出了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巨大差异，拓展了现代人对于民主理解，深化了人们对政治的认识。乌碧娜蒂反对那种把政治视为国家权力的说法，强调了代议制民主之于21世纪的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并认为现代政治生活和民主息息相关。

基恩教授围绕乌碧娜蒂在《代议制民主：原则与谱系》中的论述，一步步为听众剖析了她有关代议制民主的核心观点。乌碧娜蒂认为，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与现代人对民主的理解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断裂。在古希腊的公民大会时代，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公民以定期集会的方

式，在广场上平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面地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以达成共识或者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做出最终的政治决定，并以此来践行共和并保障公民的自治。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是一种强调身份平等的、世俗意义上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建立在等级社会的结构上，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人权，把他们排除在了政治参与之外。另外，在当时的民主政治参与者看来，上帝和神明在时刻监督他们，并对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失范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民主观念与现代人的世俗民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基恩教授表示，在乌碧娜蒂看来，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和实践没有明确涉及代表制问题。代议制民主是一种现代政治生活的产物，是人民通过选举政治代表来代替他们做出决策的政治形式，而选举产生的政治代表同时需要保持对人民的回应性。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普及的基础之上的。政治代表有明确的任期限制，任期结束后，人民通过周期性投票重新选举产生新的政治代表，或对出色的代表予以肯定使其连任，或对不合格的代表进行惩罚并取消其代表的资格，然后选出新的代表。乌碧娜蒂认为，这种新老代表的交替是可以循环往复的，而这种循环也是代议制民主回应



基恩教授在讲座现场

性和问责性的主要表现。

乌碧娜蒂眼中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种精英统治，也并非直接民主的对立面——将代表制视为一种贵族统治是对代表制的误解。包括卢梭在内的很多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者认为，代议制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得公民沦为了政治代表的附庸，“只有在投票时才是自由的”。乌碧娜蒂直接从挑战人们关于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刻板成见入手，来为代议制民主正名。在她看来，代表制和民主相辅相成，两者相互依存。代表制是直接民主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补充形式，代议制民主不是因为直接民主受内外部条件限制无法开展而被迫实行的次优选择，它本身就是比直接民主更优的民主形式。

乌碧娜蒂认为，代议制民主至少存在着如下几个非常重要的优点。首先，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实际上保障了政治审议的展开和公民参与的可能，维护了公

民在私域的自由，是防止专断权力滥用和国家权力过于集中的必要措施。正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完全否定导致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两种极权政体的出现，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了巨大的侵害。其次，古希腊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参加公民大会时将自己视为全职公民，而这在当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做完全的政治动物，成为一个全职公民。这是现代代议制民主之于古希腊公民大会式民主的一个显著区别。当下民主政治运行中面临的诸多实际困难和现代公民多元的政治诉求使得民主再无可能以古希腊时期的形式来展开。

在乌碧娜蒂看来，全职公民是非常枯燥而耗费时间的角色，代议制民主的一大亮点便在于它能同时容许人民在公域和私域这两重领域承担不同的角色。人民不需要成为全职公民，而可以在享受为人母亲、朋友、爱人等私人领域角色带来的乐趣之

后，再以“兼职的”形式在公共领域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这样一来，代议制民主便节省了人们大量的宝贵时间。但乌碧娜蒂同时强调，代议制民主的运行还需要一个良好、健康的公民社会作为保障。代议制民主的第三个优点在于，它能够激发了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理想政治生活的思考。公民在投票时把不同政治代表的行为、绩效和品质放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加以比较和权衡有利于选出那些真正具有良善政治品质和出众能力的代表。

基恩教授指出，乌碧娜蒂针对卢梭等人对代表制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是很有洞见的。乌碧娜蒂认为，代议制民主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强调与塑造决定了它不是批判者眼中的“选主政治”。在两次选举的空窗期之间，公民可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了解政治代表的表现，帮助自己做出政治判断，以实现了对政治代表的监督和问责。而正是通过这一机制，政治代表在两次选举之间的回应性和责任性得到了保障。代议制民主的第四个优点在于其可以训练人民做出复杂的政治判断。这能深化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使得人民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更贴近政治的复杂本质。代议制民主环境下的政治决策机制不再是一种“是与否”的简单二元判断，而是一种审慎的权衡取舍。代议制民主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学习机制，学习如何思考，如何做出合理的政治判断。人们可以就不同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相互学习和说服。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动态的机制中持续进行自我改善与巩固的。

此外，代议制民主还提供了一种可以

使人免于恐惧的政治生活组织方式。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代议制民主中，人民形成了对于政治代表的暂时性信任。这种信任使得官员和国家机器不再作为一种专断性强权，而是以一种可信赖的代理人形象出现在公共生活当中，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来对那些不合格或滥用权力的代表进行问责和惩罚。而从政治代表的角度来看，由于获得了“代表”这样一种合法身份的授权，他们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自信大胆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用整天战战兢兢地担心自己因为行使权力而遭到弹劾、威胁、被非正常程序免职甚至枪击。基恩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制民主是一种在技术层面减少政治参与者对政治生活所持恐惧的机制。

最后，基恩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供听众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他首先指出了乌碧娜蒂论述中一个未被讨论的情境，即代议制民主是否会崩溃？在什么情况下会崩溃？他引导听众从卡尔施密特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代议制民主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或内外部威胁时，它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另外，基恩教授还指出当代民主国家在选举层面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虽然国会、立法院等机构的周期性选举依然是代表制的基石和主导性规则，但在很多国家，针对代表的选举已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很多工厂和企业内部也出现了选举代表的现象。这种情况是否会对代议制民主未来的运行产生影响？

问答环节，基恩教授同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围绕公共空间的产生和包容性问题，基恩教授简单梳理了代议制民

主扩张和巩固的过程。他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存续和扩张同社会平等的发展、人权状况的改善和包容性的政治参与机制的发明有关。但是，这样一种从隔离到包容的政治环境变化是有可能逆转的，而当今很多民粹主义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包容性机制的逆转。在澄清“代表”的概念和类型时，基恩教授提到了不同语境下“代表”一词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他指出，乌碧娜蒂语境中的“代表”与该词刚出现时的含义完全不同。我们现在使用的代表，

是一种民主化的、与选举捆绑在一起的概念。而遵循不同机制的代表制，是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在乌碧娜蒂看来，没有选举不可能存在代表性；但在现实政治中，没有竞争性选举的政府也可能呈现出对于人民和特定群体的代表性。但是，我们需要对这种代表机制的存续机制进行澄清和界定。

（撰稿：张禹）

86

郑振满：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碑铭解析



2018年5月3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碑铭解析”。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参与讨论。

讲座正式开始之前，赵世瑜教授对郑振满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郑振满教授从地区基本情况出发，简要说明了闽南语使用人口在中国本土与海外的分布格局，并指出：虽然闽南地区的划

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其文化保持一体；闽南语在海内外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当地突出的移民传统（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均有分布）。接下来，郑振满教授以直观体现闽南文化系统的碑刻为主要资料来源，结合诸多实地考察的文字与图像，从独特的视角为听众带来了关于侨乡跨国文化网络的历史学解读。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了闽南的祠堂与庙宇系统。他表示，研究所用的大量碑铭均来源于此，祠堂庙宇及相关仪式也是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对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闽南地区仍保持着原生态的传统图景。接下

来，郑振满教授具体区分了家族祠堂与庙宇系统的不同概念，详细说明家族祠堂、村社庙宇、中心庙宇及佛教寺院的区别，以及这一系统在地域上的差异，如厦门等地的寺庙就有着广及东南亚的庞大网络与可观的香火收入。他重点展示了这些祠堂庙宇中的碑刻片段，并由此理出闽南与海外建立联系的历史脉络。

郑振满教授认为，闽南与海外建立联系的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根据目前找到的资料，这一过程最早可追溯至明清之际；清代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的碑刻则较少；现代则可分为一九五零到八零年代及八零年代以后，与海外的联系在各时期都体现了不同的形态。明清之际的闽南移民在海外没有建庙，但存在依附于老家庙宇的仪式组织，实际是老家仪式系统的分枝形态。而到清代中叶，闽南移民开始在海外建庙，与老家形成对等关系。这种海外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以龙海县岱州慈济宫碑刻为例，郑振满教授讲述了顺治、乾隆年间，“旅居吕宋”的海澄县人为维持原乡祭祀活动，在海外建立基金会、共同捐资确保家乡寺庙运转的过程。另一些碑刻也对海外侨民如何运用资金支持家族祠堂庙宇进行了说明。康熙三十五年的《重兴龙池岩碑记》则记录了住持僧人为重建庙宇赴海外“募诸外国大檀越”的事件。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的《吧国缘主碑记》同样叙述了当时华人领

袖与信徒在海外募集资金建庙的经历，并在后来衍生出了诸多学术解释。

郑振满教授指出，由于厦门等地港口的开放，明清之际闽南的海外贸易曾较为开放，海外移民众多；而自康熙五十五年乾隆十九年，海外贸易政策屡次变更，限制日益严格，对逾期不归者甚至有抄家、充军等惩罚措施。自乾隆以降，大量来自闽南的海外移民（尤其是行商者）滞留海外。东南亚地区由此普遍形成土生闽南人的社会群体，并开始建祠、修庙，形成独立的社会组织。郑振满教授指出，由于过去资料较少，人们一度以为这些移民无法回乡、脱离母体，但现在看来，这段时期的海外移民仍会采用隐姓埋名的方式保持与老家的密切往来。

以谢仓蔡氏为例，道光、嘉庆年间的碑刻记述了马六甲华人领袖蔡士章在海外建祠、处理祖先问题的过程。郑振满教授介绍，海外华侨有着拜祭祖先的必然需求。他们参与祠堂建设及其他公共事务，包括移民客死他乡时的招魂仪式，且这些问题会向子孙后



郑振满教授

代延续。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即马来西亚檳城五大家族。明清至今，来自同一地区的五大家族在东南亚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仍屡次返乡并举办各种仪式，并围绕祭祀资源投入展开了“家族竞赛”。当时的碑铭很好地记录了这些内容。

1860年规定出入境自由之后，移民可以改变在“弃民”身份威胁下隐姓埋名返乡的方式，合法公开地回国，并广泛参与慈善公益、海外董事会等地方事业。同时，当地衍生出专门为华侨办事的行业，整个海外网络开始打通，一些不相关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城隍庙等庙宇也开始起到与海外的连接中心作用，并接受大量捐款，展开持续性的扩建甚至重建。郑振满教授提到，目前正有一项有关于碑铭等文本材料的数据库工作，尝试围绕人名和地名信息的联系，追溯海外跨国文化网络的形成和运作。

讨论跨国网络的运作机制时，郑振满教授着重说明了在清朝海禁的背景下，海外移民如何完成文化网络的联系与维持。他提到，华人在海外的首要工作是处理公墓问题，而这其中又包括了招魂、超度等仪式，体现了华侨面对灵魂问题的紧张感。其二则是解决祖先祭祀的问题，帮助老家建立祠堂、保证祭品。此外还有对保护神的需求，在离乡时把地方神“带出去”。整体而言，闽南侨民在逐渐改变传统的同时保持了与本土的联系。

至于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郑振满教授援引《一海一庙》书中的表述，指出其商业网络是通过在每个港口建庙而建立，庙起到了“商业据点”的作用。海外移民每形成一个新的聚居点，首先完成的就是建庙工作，

且主要为“土地庙”，庙中同样包括了记叙性的碑刻。追溯这些庙的历史，实际也是在追溯当地海外移民史与商业的发展史。清代中叶开始形成了一批服务于跨国网络的“专业人士”。这一职业最早为季节性来往、捎送物资与信息的水客，以帮助维持海外移民与本土的联系；而到清代后期，佛教僧人也承担起了远赴东南亚募捐、操办仪式的工作。现在的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仍有佛教寺院的系统，但郑振满教授提到，这方面目前仍缺少深入的研究。

接下来，郑振满教授进一步分析了跨国网络的理论意义。如王赓武先生所说，东南亚华人是“没有帝国的商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策略，并在军队与政府支持的西方殖民者都无法真正立足的地区扎根，且现代东南亚的命脉仍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郑振满教授指出，这些华人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甚至承接了收税等来自国家的管理工作，也因此与当地产生了一些冲突。在这背后是东南亚华人“同乡同族同业”的传统与组织，家族与家族之间又以庙的形式连接起来。甲必丹与亭主制度是这种格局的具体表现。晚清之后，闽南诸多地方公共事务与社会变革都与华侨密切相关，海外的董事会、基金会广泛地参与其中。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民主国也受到了菲律宾华侨的支持。

最后，郑振满教授讨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相关议题。他提出问题：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是否有足够大的力量，真正起到对人的管束作用？从碑刻内容看来，这套政策与制度当中仍存在许多空间。如果只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理解中国的海洋史，许多历史的事

实将被遮蔽。明代至今持续不断的海外移民的过程，也是建立跨国网络的过程。

王铭铭教授与赵世瑜教授对郑振满教授的讲座作出了回应，并展开丰富深入的交流。王铭铭教授认为，闽南与海外联系的分支模式、双边模式与多元模式在现代共存，其地区间的差异仍待人类学、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王铭铭教授还对华南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发展前景进行了介绍。同时，他对闽南侨乡文化的现有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目前关注的时间跨度仍以明清为主，而没有反映更漫长的历史。华侨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商业贸易与宗教现象融合一体，学者在研究时应避免物质与精神的两分。赵世瑜教授则认为，如果暂时搁置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跨国概念，闽南海外移民的过程实际与国内的跨地域流动没有太大的差异。郑振满教授肯

定了这一点，并联系离散社群的概念进行阐释。华人对国家制度与资源的利用，也指向了这一群体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讲座中的交流环节，郑振满教授对听众的提问一一进行解答。在回答海外移民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时，郑振满教授认为，虽然活跃于东南亚各行业的华人有一定的组织，但他们缺少成文商法和统一章程，并非完全独自解决在当地卷入的纠纷。当时的西方殖民政府也保留了一些华人诉讼档案与合同文件。而在谈到闽南地区基督教传播的问题时，郑振满教授认同了华侨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简要分析了基督教进入闽南时发生的异化现象，并认为不同教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宗族仪式的参与。

(撰稿：陈洁樱)

87

杨建华：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2018年6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持。

杨建华教授的学术领域横跨外国考古

与中国考古，且一直从事两河流域史前考古的研究。在这次讲座中，她主要介绍了如何以考古学角度研究两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本次讲座分为五个部分：两河流域的地理和文明特点、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论、以考古学的发现阐释不同阶段的时空特征、以考古学的发现重构当时的

社会结构以及文明发展的过程。

讲座伊始，杨建华教授首先指出，两河流域文明深刻地受到这一地区地理特点的影响。西亚的陶鲁斯山、卡麦尔山、扎格罗斯山构成了新月形地带，农业就起源于这些山脉的山麓地带，也称新月形沃土。两河流域位于西亚正中，处于高山的包围之间，南低北高，向波斯湾倾斜。作为五海之地，西亚历来是欧亚的交界之处——由此暗藏了后来被反复争夺的伏笔，但也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族群的来往密切率先迈过了文明的门槛。两河流域是冲击平原，除泥土外没有其他资源。所以，两河流域早期王朝的文明特点深受泥土的影响，而文字书写的泥板、建筑所用的模制干砖也都来源于泥土。正因如此，后来的建筑往往建于原有的建筑之上。泥土建筑的反复坍塌和建筑的反复重建形成了两河文明遗址以土墩为特点的形态。

对于如何从考古发现研究文明起源，杨建华教授认为可分三步进行。首先，需要确认发现遗存的年代与地域特征，建立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时空框架；其次，通过考古遗存所隐藏的历史信息重构当时的社会，比如可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要素看待考古遗存背后的历史意义；再次，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探讨社会变化的动因，即发展的过程。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杨建华教授指出，基于考古学发现可将西亚和两河流域的史前时空框架分为三个阶段，即西亚农业起源阶段（公元前7000年）、两河流域农业村落发展阶段（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城邦形成阶段



杨建华教授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西亚最早的农业起源于公元前9000年前的新月形沃土地带，然后逐次向外扩展，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到英格兰半岛。所以，很多欧洲文明最早都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由此可见，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所说的农业革命其实是一个长达千年的漫长过程。

西亚农业起源分为三个阶段，即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以及有陶新石器阶段。后旧石器时代以纳吐夫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定居，并出现了成熟的细石器和骨制艺术品。随着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却，人们进入了最早的农业阶段（即前陶新石器早期）。这时，只有部分食物来自农业，耶利哥遗址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发现有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也发现了城市和泥砖。随着气候变干，前陶新石器晚期的人们大多向北迁移，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并开始向有陶新石器时期过渡——恰赫尔遗址是这一

过渡期的代表。而自公元前 7000 年开始的有陶新石器时期，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向周围地区传播。

在两河流域农业村落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夫拉文化三支彩陶文化。哈孙纳文化从公元前 7100 年到公元前 6600 年，包括原始哈孙纳文化及哈孙纳文化早晚两大阶段。萨马拉文化从公元前 7000 年延续至公元前 6300 年。这里发现有天然的灌溉渠道，并出现了原始灌溉农业；在建筑形态上，出现了内部功能齐全、联系密切的建筑单位；在建筑方法上，以模制泥砖代替泥块，还有量多质精的石容器；在陶器中出现了可能用于祭祀的礼器和文化陶塑。哈夫拉文化位于两河流域最北端，根据彩陶的纹饰和精美复杂程度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彩陶绘有大量写实的植物和动物，中期彩陶以细小和繁缛的几何纹为主，晚期彩陶由单一的红褐色变成红、褐、白三彩纹饰。

两河流域在城邦形成阶段先后经历了欧贝德文化时期和乌鲁克文化时期。欧贝德文化分为四期。第一、二期（公元前 6500 年 - 公元前 5500 年）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南部，其遗存分别见于埃利都遗址于哈吉·默哈穆德遗址。可以说，这两个时期既是该文化的定居与开发时代，也是文化主体的形成时期。第三、第四期（公元前 5500 年 - 公元前 4000 年）则统一了两河领域的南北方面。从欧贝德文化第三期开始，两河南部进入了文化繁荣和发达时期，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宗教建筑、陶器及其他用品的制造和墓葬方面。

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 4000 年 -

公元前 3100 年）是最早的国家 - 城邦的形成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该时期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即城市革命。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同一地方，由此，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此外，人们之间出现了专业的分工和社会等级，宗教性的神庙在继承了欧贝德文化特点基础上愈加复杂起来。神像的位置更加隐蔽，装饰更加奢华，外观也更壮观、雄伟。不仅如此，乌鲁克文化末期出现了象形文字，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原始文字阶段。紧随其后的早王朝时期则正式迈进了城邦 - 帝国阶段。

讲座的第四部分，杨建华教授从农业工具变化、农业储藏空间发展、制陶业生产复杂化、聚落形态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宗教建筑的扩大及新形建筑的出现、墓葬器物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化等方面重构了当时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发展和演进路径。

第五部分，杨建华教授概括了两河流域文明兴起的过程。从生产力的角度而言，两河流域冲击了平原的沃土和灌溉系统，保障了农业的大发展，由此提供了可以支配的资源。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关系的复杂化，即支配资源的人群的出现——富人墓葬便是一证。而上层建筑的发展则进一步巩固了支配资源的人的地位，比如宗教和神庙巩固了僧侣的资源支配地位。至此，杨建华教授表示，两河流域的农业、制陶业、冶金业、聚落形态、文化传播和宗教建筑在大多数时期都以各自的节奏渐进发展，直到乌鲁克文化时期才出现有整体化的一致变化。由此可见，两河流域走向文明的道路有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特点。

讲座之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发言。他认为，虽然我们已错过西亚考古发掘的年代，但杨建华教授向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即在已有考古学发现的基础上做解释和阐释性研究。最后，杨建华教授也同在场同学探讨了欧贝德文

化向西北传播过程及其与哈拉夫文化融合的现象。她表示，文化传播并非是完全取代的过程，而是在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选择性吸收若干要素的过程。

（撰稿：包培含）

88

赵刚：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 从陈映真 1960 年的一篇小说谈起



2018 年 6 月 12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真 1960 年的一篇小说谈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刚主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张慧瑜主持。

讲座开始前，张慧瑜教授简要介绍了赵刚教授的个人履历与时代背景，由此引出他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赵刚教授首先点出了讲座的中心内容：怎样才能让台湾的社会学，乃至人文学科和整个台湾社会走出殖民困境。随后，赵刚教授从陈映真写于 1960 年的短篇小说《家》出发，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悟与深入思考。

赵刚教授表示，最初阅读这篇小说时，自己的感悟集中在主人公对父亲的批判以

及对残存的父权、自己一度反感的竞争世界的屈服。但再次阅读之后，赵刚教授又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主人公在父亲的庇荫之下还有着中产知识青年的批判理想，而父亲的死使他失去了批判的余裕，只得选择与过去的自我切割；他颇有戏剧感地彩排并主持了自己与过去的告别仪式，并由此产生了内心的不安，以及针对不安自我生成的牺牲感和历史感。赵刚教授认为，陈映真对主体的虚无状态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在解释两种不同体悟的产生时，赵刚教授归纳了陈映真独特的写作方式：他没有细致地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而是严格限制自己的观察角度，只对人物行动与细节进行刻画。因此，读者必须对小说主动进行挖掘。赵刚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民主



赵刚教授

的小说写作方式。关于自己对《家》的第一种理解，赵刚教授将此归于典型的西方悲剧模式，其中包含了压迫、反抗与失败，主角的命运是被父权和冷战体制等巨大结构决定的。后一种解读则是陈映真尝试点出主体的“狡诈”——主体透过家这一仪式与平台，使自己重新参与到竞争体制之中，并将受害者的身份意识作为某种进入体制的终南捷径。

在赵刚教授看来，两种不同解读的关键在于主人公究竟是被压迫的客体，还是狡狴的主体。他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后者：陈映真利用小说说明了“主体参与压迫自己的体制的构筑”的过程。这属于社会认识论的方式——陈映真的书写从典型的西方模式中抽离开来，揭示了主体的脆弱、狡狴和自欺。赵刚教授认为，这样的小说能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主体的鲜明脉动，是文学给予社会科学最宝贵的礼物。

接下来，赵刚教授进一步对台湾社会学的困境问题进行阐述。他指出，社会学

在台湾是一门高度政治性的学科，一度为显学的社会学曾对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台湾的社会学往往在反旧政权的社会运动热潮中成为显学，却在新政权当权，或面对质疑新政权的社会运动（如“红衫军”运动）中保持了沉默。赵刚教授认为，高度体制政治化与政治正确化会造成社会学门的“弱智化”，一些潜在规则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障碍。战后台湾社会学的显学顶峰在2008到2016年间，尤其是在“太阳花”运动当中，参与者的自满和傲慢逐渐滑向虚无主义。赵刚教授指出，“太阳花”运动与社会学的内在亲近性在于对“压迫提纲”的共同遵守（“压迫提纲”包含压迫与反抗、加害与受害、结构与能动三组二元对立）。以这样的道德姿态对结构进行反抗，成了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学重要的精神内核。

对此，陈映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认识论与道德想象。他给予主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核心位置，认为应当拒绝“主体处于弱

势并被压迫”的简单前提，反对简单的悲剧英雄叙事，强调主体的反省与承担问题。作为左派，陈映真不否认社会中压迫与加害的存在，但他对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持否定态度。赵刚教授指出，压迫与反抗、加害与被害的善恶二元对立恰是社会学与社会运动建立的前提。社会学需要明确主体在何时与何种情境下与体制形成共构。陈映真曾在小说中提出加害者与被害者锁链关系的“共犯结构”；赵刚教授认为，这个视野的缺乏是台湾社会学（尤其是显学时期）的“先天不足”。

而在讨论陈映真的主体哲学时，赵刚教授体会到了其与鲁迅的亲近性。赵刚教授具体介绍了陈映真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并揭示了陈映真面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在后文革的绝望感中，陈映真反而找到了新的道路，使他心目中的祖国摆脱了狭隘的政党与政治定义，而指向广大的民族，避免了分离主义与虚无主义。就集体而言，赵刚教授指出，台湾的社会科学应当直面历史和文明。陈映真根本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跟随西方的批判理论，讨论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消失，而是具体关注了第三世界如何反抗新殖民的问题。

面对社会学中的传统议题，赵刚教授提出看待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在新旧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之下理解传统。放到台湾问题上，旧殖民主义恰体现为日本侵略者对家、国、天下的否定；在今天，被多元文化、同志运动、女性主义等制约的台湾社会学同样对传统持简单否定态度。赵刚教授认为，对传统的单向恶评也属于台湾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之一。对此，赵刚教

授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根据鲁迅的定义，受到西方左翼社会学影响的“太阳花小将”们究竟算是“伪士”还是“人民”；如果当今台湾社会学的显学是社会运动，而学者与“太阳花”分子在事实上认同左翼社会学，左翼在台湾又意味着什么？

随后，赵刚教授针对台湾社会学的左翼问题进行具体讨论。他区分了台湾的两种左翼传统：“老左/土左”和“洋左”。二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对去殖民和统一问题的关注，但最核心的还是主体哲学问题。陈映真尝试通过“社会性质论”对台湾社会进行分析。在他的文学书写中，新旧殖民主义一直是更重要的主题。对陈映真而言，台湾社会学的左翼立场是先将自己从各种新旧殖民主义统治的他律状态之下解放，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文化主体，如此才有第二序列政治议程的可能。而学院左翼和“太阳花小将”们显然没有这样的主体哲学立场，构成他们精神内核的实际是“反中”和再殖民。

对比大陆同样存在的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和自我殖民现象，赵刚教授提出两岸之间“双关怀”的期望。正如陈映真在以台湾为主体进行讨论时，同样关注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赵刚教授希望大陆能够在较大的文明体基础上，关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一体性的原则与逻辑问题。他认为，台湾的社会学（包括“太阳花”运动中的左翼社会学）体现了着社会学的另外两个“先天不足”：对殖民体制的沉默，以及对人民这一范畴的无视。前者间接说明了台湾社会学缺少历史的维度，后者指代了对人民概念“有多无一”的拆解。赵

刚教授又回到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当中，讨论他如何理解“家国天下”中人民的“一”。陈映真的社会认知论反对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其核心则是重新认识家、国、天下，但社会学对这三种构造流于无感和淡漠，转而关注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学科意识形态的图像基础。

赵刚教授联系鲁迅和陈映真各自的文学作品，讨论了社会学中的宗教问题。现代性自由、平等、博爱等多种意向之下，许多社会学的议题反而被忽略和漠视。如法国社会学知识分子在讨论公民宗教议题时，并没有将同期的殖民现实包纳进对社会学的想象。社会学史的缺少也是台湾社会学的另一先天不足。赵刚教授又从陈映真父亲给儿子的留言进行阐发，说明陈映真对宗教在第三世界观中的具体理解，并细述了鲁迅有关信仰的相近论点。赵刚教授认为，对宗教、信仰尤其是非基督教的无知和鄙夷，对台湾社会学而言也是一种“先天不足”。他同样强调社会学重视“家”与“国”在社会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理解“国”作为历史地理共同体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而家、国与天下的关系不能断裂。

简而言之，在陈映真的认识论中，非家国无以立，二者又恰是可能被殖民体制所破坏的；而在新殖民体制大美国秩序的软实力输出下（如同性恋崇拜、多元主义等概念），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实际受到了制约。赵刚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对此有所思考。同时，他也希望学界能向常被不公正对待、事关人们安身立命的民间传统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台湾社会学如何走出殖民困境”的问题上，赵刚教授作出回应：台湾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学亦步亦趋的现象十分严重，仅从西方或第三世界寻找反西方的要素无法真正达到反殖民的目的。他认为，反殖民的关键正是寻找被否定、被鄙夷的家国和故乡。因此，重新让主体在自己的家国站起来是反殖民的第一要义。赵刚教授将此关键归纳为“忠孝”，因为忠孝恰好是殖民者想要否定的。赵刚教授再度表达了重新构建两岸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希冀，并希望中国能够树立起自己的人文科学的范式。

张慧瑜教授对赵刚教授讲座的核心内容进行归纳，并联系大陆社会学界近年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讲座交流环节中，在回应基督教在台独运动中的角色问题时，赵刚教授介绍了台湾基督教的发展史，具体解释了基于历史形成的独特中国观对台湾政治局面的影响。最后，赵刚教授再次强调，陈映真主体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者必备的道德性：思想者本身要勇于面对知识的各种作为与历史问题。由这种主体哲学立场延伸的社会认识论所要求的并非中国本位，而是回到自身真实的历史、限制与需求之中进行选择 and 扬弃。

（撰稿：陈洁樱）

89

王庆节：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康德哲学的批判之批判

2018年6月1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康德哲学的批判之批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庆节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南星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王庆节教授首先指出，1929年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瑞士山城达沃斯关于康德的辩论是当代历史中最著名的“思想事件”之一，它影响了之后的整个现代哲学。以往的研究已对这场辩论有了诸多解读，但在王庆节教授看来，这场辩论的实质既不在于强调“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也不在于康德究竟诉诸“自发性”还是“被抛性”，甚至不在于坚持了“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其实，理解这一思想事件的关键在于：康德为哲学形而上学奠基所作的努力，究竟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的“问题”，还是一个存在论上的“疑难”？从《存在与时间》到《人道主义通信》，这个问题在纠缠困扰着海德格尔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本次讲座，王庆节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他对这场辩论的最新研究。本次报告分为两个部分：“导言”和“辩论”。由于时间原因，王庆节教授只呈现了“辩论”的前半部分。

一、导言

导言部分，王庆节教授解释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即疑难、对话和戏剧。

首先，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疑难”与“问题”是不同的。比如对于“哲学人类学”这个概念，“哲学人类学”不是“人类学”，它追问的是人的本质。在康德看来，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但在马克斯·舍勒看来，人不仅具有理性，还要加入情感和爱——但这些所谓的“人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不过都是用一种本质的概念代替另一种本质的概念，未能进入到存在论的层面。而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之上，它要追问的是“存在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先前的哲学家都在问“存在者”，而哲学真正要问的是“存在”。但是，有关“存在”的问题其实已经并不是“问题”，而是“疑难”。“问题”往往在提出时就已经预设了回答，只待才智相当的人来把这个答案找出。但如果一个东西连“问题”都不知如何提出，那就是“存在难题”或者说“形而上学难题”了——它们不是“问题”，而是“疑难”。这也是为什么王庆节教授会把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辩论之后撰写的著作译为《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在这个意义上，达沃斯辩论正是卡西尔所坚持的传统哲学人类学和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存在



王庆节教授主讲

论之间的辩论。

其二是对话。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论辩性的对话一直是哲学历时悠久的传统。王庆节教授按照辩论目的的不同把哲学对话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传信息”，这种对话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求实”，要求信息的准确性，目的是让对话者能够准确理解词句内容；第二种是“辩真假”，目的在于证明对方的错误或者说作为第三方的听众，这种对话要揭示的不仅仅是词句的字面意思，更要揭示它赖以真的基础；第三种是“启发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辩论的内容和真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听众可以从“得悟”，可以“豁然开朗”——卡西尔和海德格斯的对话就属于这一类。对于后世的学者来说，去判定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谁真正准确地解释了康德哲学已经毫无意义了，而他们二人的辩论对下面听众的影响以及由这场辩论开

启的划时代的哲学分野，才是这场辩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成果。

其三是戏剧。对此，王庆节教授指出，哲学对话往往具有戏剧性。卡西尔与海德格斯的这次论辩作为思想史中的一个事件，也可以当作一个戏剧来读。在这个戏剧中，台上有表演者，台下有观众；过程中也有序幕，有主场。序幕发生在达沃斯辩论之前，早在1923年汉堡的康德分会上，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已经有所接触，这时的卡西尔在哲学界如日中天，是当时康德哲学领域的代表，而海德格尔才刚刚获得教职。主场则是1929年两人在达沃斯的论辩，这场论辩可以按照问答次序分为四个回合，这四个回合也是王庆节教授研究的重点。第三幕是笔端交锋，在达沃斯论辩之后，海德格尔撰写并出版了《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而卡西尔作为回应也在《康德研究》上发表了有关《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的书评，延续了这场辩论。海德格尔在之后，也针对卡西尔的书评写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在当时未能出版，后来被收录到《海德格尔全集》的附录中，成为了我们当下研究的重要文本依据——这便是第四幕。

二、辩论

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辩论分为四个回合，前两个回合由卡西尔发问，海德格尔防守；后两个回合则是海德格尔进攻发问，卡西尔招教、回应。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的关键问题是怎样看待康德哲学的实质。在海德格尔之前，德国哲学界一直认为，康德哲学是一门知识哲学。

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康德哲学是在为他所期盼的新形而上学奠基。海德格尔的批判对象是“新康德主义”，且在其眼中，卡西尔正是“新康德主义”的最后旗手。但是，“新康德主义”究竟是什么其实一直都没有定论。卡西尔也是正抓住这一点发出自己的攻势，他质问海德格尔：“你为什么认为我是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指出，新康德主义兴起于现代的哲学困境，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文科学倍感“无家可归”，哲学沦为了自然科学的“仆人”。就连康德本人也只能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而无法去质疑已成现实的自然科学“是否是真理”。在这种解释环境下，新康德主义只能把康德哲学看作一门探究人类认识能力的知识论，“你能够知道什么”就成了新康德主义眼中康德哲学的关键。但其实，康德在晚年有、对自己的三大批判进行总结：“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被允许期望什么”。这些问题最后其实都导向了同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是”也即存在。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核心正是“人的存在论”或者说“人的形而上学”。且只有这样，理解康德和康德哲学才能被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是整个论辩的核心部分。在这一回合，卡西尔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即想象力、图式化问题以及关于普遍性真理的问题。

首先是想象力的问题。卡西尔认为，

只有承认想象力作为思维中创造性的“基本力量”，才能把握图像和符号的形式，也才能从经验世界进入伦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想象力扮演了自由、突破、超越的角色——这也是德国哲学界一直以来对康德“想象力”的解释。海德格尔则认为，从想象力出发走向图示化歪曲了康德的本义，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想象力的“范型（Typen）”和绝对的规则没有关系，绝对命令和经验的、感性的图像也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自由疑难的发问，才能让我们从有限的人的本质问题进入到绝对物的问题，从而跨越到了形而上学的世界。卡西尔认同海德格尔把传统的知识论解读和想象力的路径区别开来的做法，但他认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太过极端，甚至已经否定了康德本身。

由此也就引出了两人更深入的有关“图示（Schema）”地位的讨论。海德格尔指



赵敦华教授评议

出,强调想象力必然要强调图示化,康德自己也将图示化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但在第二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又确实把想象力在本质上归属到了理性能力之下——这就等于把想象力仅仅局限在了中介作用上。这种矛盾使得“图示化”在康德哲学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而在卡西尔等正统康德学者看来,“图示”不过是彼岸世界在此岸世界的一个“见证”罢了。因此,图示化只是康德哲学的起点,而非终点。

第三个“普遍性真理”的问题也是“Dasein”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人有限的理性怎么能够保证数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呢?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就已经陷入了知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道德哲学中的相对主义——证明数学、自然科学的真理性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任务,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需要研究的只是存在论的问题,即说明它们“是什么”,而不是去论证它们“是不是真的”。有关这一点,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已经做出了说明。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把康德哲学解释为“知识哲学”恰恰是弄错了方向,实践理性的本质是一个“之间(da zwischen)”的关系。这个“之间”蕴含着想象力中介的作用,卡西尔强调的只是超越的两个端项,却不强调超越的“之间”。两人在这里的分歧可在卡西尔发表在《康德研究》的书评中更明显地看到。卡西尔在书评中提到,在传统的解释中,康德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它包含现象和绝对本

体,现象与本体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认识论鸿沟。而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与本体(物自身)是一元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由不断跃出,与存在本身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即Dasein所在的这个由图示联结起来的“之间”。在海德格尔哲学中,Dasein是不断“去存在(zu sein)”的人,这是人本质的“原初展现”,也是自由和真理。在这个论辩中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和卡西尔都强调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强调从想象力导向自由。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像卡西尔那样在强调想象力的同时否定图示化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这恰恰证实了图示化的重要性。另外,海德格尔也在论辩中指出,康德的真理观其实更接近自己的存在论真理观,康德在文本中多次提到知识论的真理有很多偶然性。对此,海德格尔表示,这种偶然性正是因为作为Dasein展开方式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去蔽”。因此,存在论的“真”才可能偶然地在这一处或者在那一处,也才可能产生出知识论上的“真”和“假”。

由于时间限制,接下来的两个回合遗憾地未能在本次讲座中呈现。

王庆节教授的报告结束后,赵敦华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虽然王庆节教授只展示了一个开始,但已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达沃斯论辩的精彩。正如王庆节教授在导言中谈到的,这场论辩不是真假意义上的对话,只用“真”“假”二字也不足以概括这场辩论对二十世纪哲学的深刻影响。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涉及到了康德最基本的问题:知识论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想象力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康

德的普遍真理观等。海德格尔把康德的思想纳入到了自己的存在论框架中,去重新解释康德哲学。这种解释在卡西尔等正统康德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歪曲”和“篡窃”;但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新的解释对后世的启迪是十分深远的。

互动环节,南星老师参与讨论。他谈到,海德格尔其实承认自己对康德的解释是“强暴性”的。但对于哲学史来说,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是否还原了其本义已经是不重要的了——他想做的不过是借康德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南星老师作为研究康德的学者,也试图从康德的角度来对这个“疑难”做出一些回应。他

认为,康德哲学中确实存在很多矛盾,且康德本人在文本中都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点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讨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正是康德哲学的一处关键矛盾——人到底是强调无限性的一面?还是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人的自由是一种无限的自由,一种属于本体界的自由。但图示化理论又表现了人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文本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对这两方面的调和,而这也为后来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争论留下了话题。

(撰稿:孔博琳)

90

涂逸珊: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



2018年6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袁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研究中心博士后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涂逸珊教授指出,“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来的。地处丝绸之路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幸运的是,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Roads of Dialogue),并强调



涂逸珊教授

早在中国秦王朝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部落群体之间的交往就非常频繁。且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频繁互动依然持续着。

涂逸珊教授随后提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将自己沿途搜集到的有关西域国家的情况呈奏给朝廷。学者林志纯在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林志纯教授把着力点放在张骞西域之行的书面记载上，并提出，因为张骞的这次出行有着官方记载，所以应该被视为“开拓之旅”。约翰·诺布·威尔福德（John Noble Wilford）则在20年前于《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该文章进一步佐证了林志纯的观点。他提到，在一具公元前1000年埃及木乃伊的头发中发现有丝绸。

涂逸珊教授认为，综合各方面考虑，丝绸之路是学习文化互动的理想场所，而中国文化则是理解这些互动的关键。譬如，许多画作都可以用中国神话或语言来理解。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丝绸之路的中、西部地区。在那里，突厥、蒙古的神话和语言与波斯文化交织在一起。涂老师特别强调，“文化不可能孤立存在，只有在与不同文明相互交融中才能获得进步”。涂逸珊教授继而指出，在丝绸之路沿线文物的界定方面存在诸多难题，比如，这些文物在谁的领土范围之上？是在谁的统治时期制作完成？这些创作者是谁？谁是其背后的支持者？创作方面受到谁的影响？这些问题大都涉及到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身份等相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之间是相互割裂的。

涂逸珊教授特别强调，在这一框架内做出的假设承认较高级的文明会对那些文化特征较弱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一种文明或文化优于另一种的观点在学者们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学者们所关心的是历史问题，倒不如说是与当前政治有关的问题。在这种方法中，有些人强调外部因素（权力中心），

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通常代表“更高级”的文明，而内亚地区的内部因素则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接着，涂逸珊教授提出另外一种研究视角——代温·德韦思方法（Devin DeWeese），它承认载体之上“文明层”（layers of civilizations）的存在，就好比人身上穿的衣服。

随后，涂逸珊教授补充了一些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她指出，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在向西迁移到小亚细亚地区的过程中，把自身传统带到他们的新的家园，并与当地的文明产生交融。只要快速浏览一下内亚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流动性、部落主义和游牧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后期，游牧民族逐渐不满足于只统治草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定居生活——即使是伟大的蒙古帝国最后也被这两种倾向所分裂。但是，所有这些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控制贸易路线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控制是通过他们强大的骑兵来得以实现的。他们会在制造威胁后站出来提供保护，这样就可以控制这些商业活动。有时，他们也会成立自己的贸易团队。涂逸珊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的东部地区也呈现出类似的共生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的“游牧循环”（nomadic-cycle），即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依靠武力掌握政权之后，会增设许多固定机构，并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然后逐渐抛弃其祖先赖以发家的传统。

涂逸珊教授接着讲到，1990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首次将“丝绸之路”探险之旅起点选在中国古都长安，这里有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大贤清真寺等历史名胜。法门寺是玄奘印度取经之行的起点，莫高窟壁画中的历史场景、精美的雕像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密博物馆中展出有3000年的历史的裤子、羊毛袜等纺织品。在哈密之后，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吐鲁番。在那里，高昌的废墟脱颖而出。柏孜克里克洞穴的地理非常独特，受到一座山和一条河流的保护，而这条河流又提供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在中国人看来，如果一个地方前有水后有山，则可被称为风水宝地。千佛洞的壁画中讲述了一个被蛇咬伤的隐居公主的故事，这不禁会让人想起伊斯坦布尔“少女塔”（kzkulesi）中的类似情节。

涂逸珊教授表示，在土耳其及中国文化和语言中，有许多引发人们思考的地方。譬如，“摸着石头过河”在土耳其语中就有对应的说法——“迁移是沿着道路进行的”（göç yolda düzülür）。在土耳其和中国，“灶火”（fire of hearth）有着特殊含义。汉语中有“延续香火”和“断了香火”的说法，土耳其语中也有类似说法。涂逸珊教授特别强调，在游牧社会中，灶台还被用来确定地位的尊卑。灶台是代表祖先精神的圣神之处，一般来说，贵宾坐在灶台的后面。在一些地区，新娘是不允许越过灶台的，因为她还没有融入到家族体系当中，只有在她们为家族生儿育女之后才可以这样做。此外，汉语和土语都用“肝”来表达喜爱之意；两国民间都认为艾蒿有辟邪的作用；大喜之日新娘都会佩戴红色

的头饰等等。

随后，涂逸珊教授指出，部分共享文化特征也反映在建筑风格上。当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时，他们渐渐远离亚洲——更确切地说是和东亚的联系。此举反而增添了大量拜占庭和近东的特征。在15世纪之后，这些遗留下来的传统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功能，也失去象征意义，变成了纯粹的装饰品。在丝绸之路沿线可以观察到建筑中使用木材的现象，而这种特点可以追溯到中国。由于木材容易腐烂，中亚国家许多木制建筑未能保存下来。幸运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保存了一些木制建筑。木制清真寺还是奥斯曼前期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们把这种状况归因于塞尔柱突厥帝国。直到现在，当地仍然有许多木制的清真寺，这些都象征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融。

接着，涂逸珊教授谈到，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座清真寺的米哈拉布（mihrab）上的龙的图案——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中国。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认为，这条龙是在抵御邪恶。在中国，龙被认为是警惕和保护的象征。而在土耳其，这一现象被人们所忽视，因为龙在伊斯兰教和之前的历史记忆中未曾出现过。在丝绸之路沿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共性特征：屋顶的装饰图案。在敦煌的洞穴、阿富汗巴米扬以及安纳托利亚哈哲·贝克塔石（Hacı Bektaş）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图案，而这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似乎是敦煌石窟的图案。这种屋顶装饰起源于北魏时期（350—532），呈现出八边形图案。在富尔迪（Fuladi）巴米扬，一个类似的屋顶图案被称为“灯

笼屋顶”（lantern-roof）。此外，类似“灯笼屋顶”图案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土耳其东部的某些壁炉和烟囱上都能找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安置在房子的中央作为通风工具使用。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灯笼屋顶”可被看作是一个微型世界。大家在帐篷中围坐在壁炉边，散发出一种团结的氛围，而后逐渐演变成国家统一的象征。

最后，涂逸珊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她指出，前面关于烟囱、灶台、屋顶灯笼式天窗以及天花板寓意的讨论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只是纯粹的装饰品，但也有人认为它们的深层次含义被转移到宗教和政治中去了。涂逸珊教授认为，这提醒我们：不同的人，感知也不同，因此，相似的物件可以被用作不同目的；另一方面，那些乍一看不太相似的物件却很可能会被联系在一起。正如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那些对宇宙感知的象征已变成纯粹的装饰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似乎是把着力点放在人的身上，这样能够使我们看到那些在国家和政府层面的研究中无法观察到的东西。

评议环节，罗新教授指出，涂逸珊教授从物质、艺术、形象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所见到的各种相似、相同和不同。通过本次讲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融。

（撰稿：吴奇俊）



涂逸珊：纪念死者的方式



2018年6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纪念死者的方式”。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咎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副教授党宝海，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涂逸珊教授即指出，为去世的亲人举行悼念活动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某些文明中，这一点可从墓葬建筑中表现出来；而在另外一些文明中则通过宗教建筑来表达。不管怎样，纪念性建筑物在许多文明中存在相似或者相异的地方。缅怀死者是普遍做法，但在东亚和内亚（西亚），敬奉死者有着特殊功能。

涂逸珊教授表示，我们通常把这些不同

特征归因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这些遗迹的研究是按照不同学科的专业化要求开展的，因此，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也仅限于学术方面。但是，在丝绸之路研究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可以在人类对于生者和死者认知的基础上，以人为关注点来考察这些不同。

涂逸珊教授认为，这种“概念化”方式冲破了种族、民族、国家、宗教和诸多学科的界限，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网络以及个人对情感的表达。在后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潜在的相互关系，也可以看到类似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所谓“不是梯子而是灌木”的现象。史蒂芬·古尔德的本意是强调“不同文化中出现相似的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借鉴，也可能是像灌木丛那样是自然生长的结果。因为人类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因为人类已经在相同



讲座现场

的环境中共存了上千年，但是却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这可以从土耳其、日本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印证。这种遗产同样可以给我们显现出他们在概念、实践，以及美学和民间文学表达方式方面的异同。

随后，涂逸珊教授重点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对于死者的纪念方式。许多文化对逝者的缅怀都被纳入了宗教活动范畴，但就算是在同一宗教内部，具体操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穆斯林世界，墓葬建筑非常多，但是伊斯兰教强调信徒平等，为逝者修建纪念性建筑是不被宽恕的。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在这一点上最为极端，他们甚至摧毁了境内存在的陵墓。在其他地区，则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阻碍人们修建陵墓。例如，在苏丹，环境不允许为逝者修建墓葬，因为尸体要被土狼吃掉。只有那些被认为圣洁或者圣神的人才能避免这种命运，他们的尸体会被一些小布块保护。在西藏，这些小布块被做成旗帜形状，会随风飘动并吓退土狼。因此，圣人的墓葬是可以参观的。对普通人的吊念活动会持续一年，最后，他的家人会去拜谒他的陵墓。通常，他们会带去食物和酒来表示吊念阶段的结束。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教世界为死者修建纪念性建筑是不被宽恕的，但仍然存在纪念仪式，且不同地区方式各异，为逝者修建纪念性建筑的做法也颇为流行。与其他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相比，在那些操突厥语民族居住的地区，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在那些发现墓葬建筑或者伊斯兰式纪念建筑的地区，有些墓地独自矗立着，有些则被清真寺包围。

接着，涂逸珊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义反对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专门建造一座清真寺和坟墓？这个问题在早先一项名为“安纳托利亚地区前伊斯兰象征性元素如何适应伊斯兰式建筑”的项目中被研究过。文中认为，之前以朝代、建筑风格为划分标准对土耳其和中亚地区伊斯兰式建筑进行的研究，“单一化”了建筑本身和建筑性因素。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中亚地区非常重视“北”这个概念；而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则主要强调与麦加的朝向，但这一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并未落实。土耳其的墓葬就表现出这两种倾向：有的墓葬仍然坐落在北方，有的则朝向麦加。那些修建在朝向麦加方向的墓主绝大多数是统治家族成员或地位显赫的人，这种位置被称为“天堂花园”（Garden of Paradise）。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人们相信墓主人会受到民众的祝福，因为他的陵墓指明了麦加的方向。事实上，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不宽恕修建坟墓的做法，同样，也没有为那些“少数人”（selected few）指出哪些地方是风水宝地。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挑选风水宝地的做法开始流行开来。18世纪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哈菲兹（Hafız Hüseyin al-Ayvansarayî）就有关一些人去世之后安葬在伊斯坦布尔清真寺院子中所谓“天堂花园”的记载，且这些墓葬在方位上大多朝向麦加。

涂逸珊教授指出，土耳其历史学家埃姆尔·埃辛（Emel Esin）利用西方的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发现可以帮助理解突厥语族（Turkic speaking peoples）伊斯兰化之前的文明。从这个方面来看，重视祖先崇拜的中华文化可作为理解这些问题的钥

匙。中国人非常敬奉祖先，清明就是专门用来祭奠祖先的日子，这一天，大家通常会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此外，寺庙（尤其孔庙）是生者举行祭奠祖先仪式的场所。他们专门用于祖先崇拜，并没有任何其他信仰体系的约束。因此，在中国，这种丧葬建筑不需要随建寺庙。根据德·格鲁特（De Groot）的研究，在20世纪初墓地里就有寺庙，但我们不认为这是古代墓葬建筑中的普遍现象。

寺庙在宫殿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家里则被称为祠堂。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他们并不是葬礼建筑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从周代到秦代的漫长岁月中，祭司阶级处于被忽略的位置。祭奠祖先的仪式通常由每个家庭的长者来主持，皇帝作为统治中国的天子则需要祭天。大约从公元前31年开始，皇帝和大臣祭天已成为一种惯例。从明代开始，天坛成为皇帝祭天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天坛和墓葬没有任何关系，皇室祭祀祖先的地方在皇宫中，现在是北京中山公园的一部分。

涂逸珊教授表示，上面的讨论表明，中国和中亚、中东地区在丧葬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丧葬建筑和相关组成部分只用于这一目的；而在土耳其和中亚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祖先崇拜已逐渐融入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结构中，清真寺便是一例。然而，当我们比较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日本时就会意识到，仅仅一种对于宗教的解释是不够的，日本的墓地也有佛教寺庙等建筑。但是在日本，这种做法不被认为是祖先崇拜，而是日本神道教元素的一些特征。

结论部分，涂逸珊教授指出，当我们从特定学科的角度研究上述问题时，只能看到

特定的文化。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相似性时，倾向于从传播者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同样也可以用约瑟夫·弗莱彻范式（Joseph Fletcher paradigm）强调横向的延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ies）。但是从一些案例，我们也可发现差异性，这一点可通过观察与数字“7”有关的仪式来看到。相关文献表明，土耳其的这一传统似乎更加接近东亚而非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并不把宗教仪式融入到宫殿或家庭中来，这也是为什么宫殿不能改造成清真寺——这一点和雍和宫形成鲜明对比。雍和宫曾是清朝皇子的居所，后被改造成藏传佛教圣地。雍和宫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功能上的转换，是否因为宫殿本来就是非常神圣的？或说是否出于寺院逐渐并入宫殿的原因？在通过从西亚到中亚实地考察后，涂逸珊教授认为，这种现象是迈向非精神政治统治（non-spiritual political）的第一步。总之，我们可以说，对死者的纪念在墓葬结构中的体现超越了艺术史的范畴，它不仅告诉我们有关感性的内容，还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宗教和政治的地位。

评议环节，咎涛副教授表示，涂逸珊教授以墓葬习俗作为切入点，考察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风俗习惯，并对各地的丧葬风俗做了许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随后，涂逸珊教授同与谈学者及听众就古代陵墓朝向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撰稿：吴奇俊）



涂逸珊： 性别与文化构建与蒙古历史：一项关于性别的研究



2018年6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性别与文化构建与蒙古历史：一项关于性别的历史性研究”。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袁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乌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1234年，窝阔台出台了一则惩罚善妒妇女的法令。法令规定，妒妇要在都城中心骑光背牛，夫家收回其财产，丈夫可以再娶。结合当时蒙古正从部落形态到国家形态转型的大背景，窝阔台出台的这则法令即为加强国家治理、建设国家机器的系列措施之一。因此，蒙古早期，国家对妒妇的惩治曾在过去被理解为其对世界实行“东方专制主义”的手段。涂逸珊教授则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入手，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惩罚妒妇是国家对女性的“规训”。但她也没有把性别社会学的理论生硬地嫁接到历史学中，而是认为惩罚妒忌是国家权威中父权在私人领域的延伸，且既已存在的父权为规训妇女、树立国家权威提供了可能性。

性别理论在蒙古案例中看似“失效”的原因在于理论与实际案例不同的社会背景。前者的一般假定是，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存在明显划分。但12-13世纪处于转型阶段的蒙古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国家组织建立之前的蒙古是分散的、以亲缘纽带联结起来的部落，没有中心权力，却有众多小头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较为扁平。后来，随着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从部落向国家形态过渡，而这个国家以征服战争和军队为基础，所以必然要求中心权力的出现及他人对中心权力的顺从。男人们通过军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完成了从部落成员到臣民的角色转化；女子则未参军，但她们会随军出征，为自家男人提供衣食。也就是说，女子没有像男子一样被国家改造过。因此，蒙古惩罚妒妇、规训“情绪”，体现的是新兴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非公私领域的分野。同时，蒙古惩罚嫉妒的道德因素也与汉地不同。汉地受儒家影响，正妻应更宽容，其地位意味着她的品德应与之相称。这样看来，蒙古对妒妇的惩罚是出于自身社会独特性的考虑。

在男人的世界，新秩序很好地嵌入了旧有的秩序当中。等级制和原来相对的平等都在新秩序中各得其所，因此，文化出身不同的男人们可以为相似的目标团结在

一起，得到封赏，从而建立纽带，反过来巩固团结。但旧元素在新时期的结合却没有反映到妇女身上。不同文化出身的女人只是被要求服从她们的男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嫉妒是不接受新秩序且离心的“非理性行为”，会妨害国家。而另一方面，蒙古女性素以个性刚烈著称，蒙古人也一直重视女性对政治的作用，并对女子才能表示赞赏。女子不仅对重大决策举足轻重，而且也带来高贵的血统，为丈夫及其家族提升地位。这样理想型的女性在蒙古历史或传说中比比皆是，如托雷的妻子、“四帝之母”克烈·唆鲁禾帖尼。她治家有方，足智多谋，善于处理和窝阔台的关系，帮助拖雷夺取汗位，又在他去世后联络蒙古各部，四子先后被推举为大汗。所以，如何把潜力巨大的女性群体纳入到国家体系中成为了统治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惩罚妒妇就是国家在最基层社会单位——家庭——将女性整合到新国家体系中的方式。

涂逸珊教授表示，在整合女性群体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女性利益的损害，如女性必须忍耐和接受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在12世纪之前的蒙古虽然存在，但并不常见；女性在亲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如从前。因此，会有一些女性拒绝“进入体制”，不乐意像男人一样变得忠诚顺从。可以说，女性世界对社群组织形式变化的反应比男性社会有意地迟滞，或是具有更强的抵抗性。这体现了蒙古内部的文化差异（且蒙古男子也会娶异邦女子），从而使女性道德模范形象的选择呈多样化发展。

随后，涂逸珊教授阐述了女性的分类及其评判标准。根据当时并立的蒙古各部

社群组织形态的不同，蒙古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等级社会中逐渐转变为主母的女性，平等与亲族色彩相结合的群体中的女性，以及正在转变为“国家”中的女性。前两种社群形态仍属于部落，依靠族人或其它亲属关系；在第三种秩序（后来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下，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野。通过考察这三种社群中女性不同的自我认知，可以理解新秩序将先前的部落传统融入其中的方式。在13世纪的蒙古转型期，等级社会中女性的新定位是母亲，史籍中可见其应丈夫的等级抚养子女。大蒙古国建国后，平等亲缘社会的元素则逐渐从史料叙述中消失。如《蒙古秘史》对大蒙古国建立前的记载中，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出身迭列斤蒙古，意



为“普通蒙古人”，与成吉思汗所在的尼伦蒙古相对）频频可见，但在建国后的叙事中却很少被提及。与此同时，等级制社会的克烈部、乃蛮部称赞女子的美德，而平等亲缘社群的女子则只有符合新社会要求时才会得到赞誉。所以，虽然不同文化背景的男性都统一于忠诚和服从的结合下，各个社群评价女性和女性自我评价的标准却有变体。《蒙古秘史》对孛儿帖的定位是“高贵风仪与生俱来”的哈屯，诃额仑（成吉思汗的生母）则是“能生养”“生来有勇气的母亲”。

孛儿只斤氏通过女性“加持”在蒙古草原站稳脚跟后，通过纯化父系血统进一步保证权威，部分体现为对童贞的要求。早先，蒙古人不关心新娘是否是初婚，已经嫁过人的女性会被认为更有价值。而成吉思汗娶忽兰时却怀疑她曾和纳牙阿有染，直到发现她确实还是处女之身时，才对忽兰宠爱非常。除了要求新娘童贞，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夫多妻制的扩散、惩罚通奸、限制收继等。

有趣的是，17世纪的史家填补了孛儿帖在《蒙古秘史》中的静默：此时的史家盛赞其对历史的洞见和博爱的胸怀。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相似的评价。这与16世纪蒙古人接受喇嘛教后生死观的变化相关。蒙古女性又回到了部落女性的状态，而不是活在征服军队的国家体制中。史料中到处回荡着追忆往昔的声音，思念部落生活、反对战争。这些主张通过旧人旧事说明，却赋予其不同的涵义，如成吉思汗的大将速不台歌颂亲族关系，而这在崇尚军中服从和勇武的成吉思汗时

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可否认的是，蒙古史也见证了国家形成与父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这一系列的政策更多依靠社群中性别关系的建构，它贯穿于蒙古历史始终。但蒙古人没有抛弃成吉思汗，他依然是英雄、伟大的祖先，并在性别建构的诗歌中以不断调整的面貌出现。

评议环节，各位与谈者对涂逸珊教授的详细考证和新颖解读十分感兴趣。党宝海教授问及史料处理。乌兰研究员提到史料叙事的多层多样和世事变迁产生的距离感，导致对古代蒙古史研究的困难，过去对于蒙古女性的认知也多限于具体事件的考量，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付马博士后提出的问题关注艺术史和突厥语头衔的演变。最后，涂逸珊教授同在场师生就本领域和语言学、社会学的交叉，蒙古风俗、历史延续性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撰稿：蔡雨玟）

91

孙歌：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



孙歌教授

2018年6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持。

孙歌教授首先在历史学意义上对明治维新的基本轮廓作一勾勒。通常，明治维新被认为是经由1867年12月宫廷政变，并在次年1月由江户德川幕府将权力交还给京都日本天皇的事件。然而在此之后，京都王宫官军与江户一部分幕府军队开始斗争，引发了为期一年多的内乱，后以幕

府军队的失败告终。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正式开始，随着殖产兴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武士特权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进行，近代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第一波完成，日本作为近代国家开启了其后的历史进程。

讲座伊始，孙歌教授在思想史意义上对明治维新进行线索梳理。自1853年贝利来航，尊王攘夷成为江户幕府与京都宫廷的共识。但由于在攘夷方式上有倒幕攘夷与公武合体两种路线，最终引发了1864年的禁门之变——主张倒幕攘夷的长州藩军队被由萨摩藩为主的幕府军队在皇宫禁门外全歼。然而，作为当时实力最强、装备

最现代化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却在 1866 年签订了联合密约，由土佐藩的两个下级脱藩武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作为调停人。孙歌教授介绍，实际上，在禁门之变时萨摩藩西乡隆盛已有联合的想法，他才是萨长联合的真正主导者。

随后，1867 年，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大范围地区开始出现民众非理性、大规模的“狂欢”：老百姓涌入大街小巷，编造猥琐淫秽的歌词，吟唱小曲“那也不错啊，无所谓呀”，并配以狂乱的肢体动作。孙歌教授将其描述为“失控的广场舞”。有日本史学家认为，这样的“失态”传递了老百姓的不满。孙歌教授则认为，民众的不满更多地体现在自黑船事件以来掀起的大小“一次性”暴动中，诉诸于武力，并带有明确诉求；而“狂乱”式的情绪爆发，更可能是那个时代找不到判断标准的情绪性反映。当时流传的俗语“胜了就是官军，败了就是贼军”，与翻译成中文后“王”与“贼”位置相对确定的含义不同。这句日文俗语展现的是一种谁胜谁败都无所谓的态度，进一步佐证了当时判断标准丧失的情况。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们目睹的正是打着不同旗号的两股官军厮杀又和好这样“官贼不分”的局面。孙歌教授认为，包括公武合体与倒幕运动在内，这一时期的种种主张和后续变化也都使得整个局势富有歧义，似乎每一种选择都有可能性，但哪种是正确的却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治维新开始了。孙歌教授补充，明治维新成功后，表面上是权力从幕府移交给天皇，事实上是将权力交给了几个强有力的藩组成的新政权。

接下来，孙歌教授重点介绍本次讲座所论及的福泽谕吉《丁丑公论》（丁丑公论）与《论人穷志不短》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三位重要人物——胜海舟、西乡隆盛与榎本武扬。作为江户幕府重臣的胜海舟（1823—1899）是极富远见的政治家，在幕府还未衰落之时便率先建立了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意义上的海军。榎本武扬（1836—1908）是海军的将军。西乡隆盛（1828—1877）是鹿儿岛下级武士出身，骁勇善战，率领的萨摩藩是江户幕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西乡隆盛带领军队围剿幕府，与胜海舟谈判最终使江户无血开城，榎本武扬在无血开城后顽强抵抗了近一年，后被明治政府招安。以上三位成为了明治时期的重要谋臣。

孙歌教授又介绍了几个与此相关的重大事件。第一件事是 1871 年完成的废藩置县：废除原有 261 个藩，建立 3 府 72 县。之前的日本是武士所代表的士族所统治的封建社会，废藩废除的就是武士的政权，从而完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建制。完成废藩置县后，同年 11 月，琉球有 66 名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 54 人被牡丹社原住民所杀。为争夺对琉球的控制权，当时实际掌权者西乡隆盛向美国和英国征求琉球是日本所辖之县的证明。可见，当时日本的国事多向其征询意见，其外交权的行使对象也只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第二件事是 1872 年征兵令的发布，武士特权被取消。第三件事是 1873 年明治政府内阁就西乡隆盛主张征韩发生分歧，导致内阁分裂，西乡隆盛率亲信下野。有趣的是，下野后，明治政府照常给西乡隆盛和其部下发放津

贴，对其所在的鹿儿岛县亦给予特殊政策扶持，使得西乡隆盛的政治角色变得十分暧昧。然而，1874 年明治政府便宣布出兵台湾，发动对外战争并向清朝政府索赔。孙歌教授就此评论道，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第四件事是 1876 年废刀令的颁布，激起武士强烈不满，加之农民负担过重，于是社会动荡，冲突不断。第五件事是 1877 年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惨败后自杀，明治维新就此落幕，日本变成中央集权的强政府。

福泽谕吉于 1877 年写作的《丁丑公论》与 1891 年写作的《论人穷志不短》直到 1901 年才得以面世。两篇文章在结构上采用独特的复合型，即开头先列出一个与自己主旨相反的说法，随后展开驳论。如福泽谕吉首先列出一种说法，“大凡为人，无不施行己所欲之事。此乃专制之精神也。故云专制为当今人类之性可也。为人如此，政府亦然。故政府之专制不可责问。”而后引出对文明的认识，强调抵抗专制的意义，从而认为西乡隆盛起兵乃其抵抗精神之彰显。孙歌教授指出，在这样的论述结构中，人们常常忽略福泽谕吉的论述前提，即抵抗是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之中，其强调的重点在于专制与抵抗两者是平衡和对抗的关系。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曾指出，文明是一种社会风气，核心在于有诸多相互对峙的平衡关系。同时，福泽谕吉指出社会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西乡隆盛的批评，而在于舆论的一边倒。对于品行问题，福泽谕吉先列“若破坏大义名分对抗政府，学者之议论对其姑息，则人民品行一落千丈，将阻塞廉耻节义之源”

之言，后展开驳论“然今之所谓大义名分，只在唯唯诺诺恭行政府之名。自身品行破廉耻之甚者，只须听从政府之命照章办事，即可成全大义名分。故大义名分不足以成衡量一身品行之准绳”。此外，福泽谕吉对西南战争爆发时武士阶层的反抗与自由民权运动合流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及武士阶层的一系列“不成熟”状态蕴含了“成熟”的可能性，需要在历史上准确地记录它们的状态，而非在价值观上进行简单判定。孙歌教授总结道，《丁丑公论》的基调是福泽谕吉的“抵抗”，抵抗的是严酷的言论管制；但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公开发表的文章均在强调以国家为中心，这也体现了福泽谕吉所言的对峙的平衡。立国先立人、欲使国家文明则使风气文明的逻辑也在其文中一以贯之。

接下来是对《论人穷志不短》的分析。以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福泽谕吉认为，立国本为私情，但爱国忠君却是现实之公道，这是理论上之私情变为现实上之公道的过程，并且忠君爱国只有在国事衰微之时才成其公道。福泽谕吉对胜海舟与榎本武扬多有批评，认为胜海舟丧失了日本“人穷志不短、抵抗到底”的美德。孙歌教授认为，福泽谕吉不是在对日本政治进行现实分析，其所言人穷志不短的负隅顽抗在事实上不一定能行得通——他只是在鼓吹一种民间的抵抗精神，而这也是他在进行道德启蒙和文明观启蒙时反复坚持的论点。

孙歌教授重点抽取了《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提出两个重要关键词，一为“积习难改”，一为“权力偏重”。权力偏重是日本老百姓最为严重和有害的积习，该

权力包括政治、社会舆论等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比如舆论的一边倒、舆论附和政权都是权力偏重的表现。要摆脱这个积习才有可能打破一元化的现实格局和思想格局，建立多元碰撞和交锋的局面，以促使社会活力涌流。福泽谕吉认为思想上的自由不会妨碍现实的秩序，只会让现实更为丰富。

孙歌教授认为，《丁丑公论》与《论人穷志不短》两篇文章表面上是对三个人物的评价，但事实上是文章写作策略使然。福泽谕吉用最彻底的方式，把在《文明论概略》中无法直接言明的内容道出——以否定的方式开始，再进行相对的肯定论述。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解释日本政权转移的利害和结果已然失效，只有以福泽谕吉这种复杂的方式才能切中让老百姓无所适从的社会局面。福泽谕吉认为，弱势人的声音总会被磨灭。因此，弱势人必须彻底抵抗，才能使不同声音进行交锋。当交锋变成风气，社会就变得文明了。孙歌教授介绍，福泽谕吉还有一个独特的判断，即不管在国内还是国与国之间，只要形成敌对就是敌我的关系，其前提就是上述所言的立国是私不是公。对于福泽谕吉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立国，而在于是否有人穷志不短而立国之本。孙歌教授认为，今日之日本，虽不能说是徒有其名，但却不是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独立国家。因此，福泽谕吉在当时给出的警告对当下日本仍有意义，对中国来说亦有启发。此外，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福泽谕吉对明治政府的批评，给战后日本学者提供了思想启发，重回明治维新有助于发掘更多抵抗单一化价值与绝对主义的思想资源。

孙歌教授总结道，福泽谕吉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抵抗精神本身比其词语表面意义更为丰富与复杂，是其反对一元化专制的社会理念的体现。尽管他本人没能最终坚持并完成，但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论述方式。我们从中导出了更多分析的视野与可能性，这对中国知识界恰恰是陌生而又必要的。刘志伟教授随后表示，中国没有出现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是否因为历史上没有人把他们变成“福泽谕吉”。孙歌教授回应道，福泽谕吉在两个意义上彰显出了其重要性，一是他对文明论的讨论，这是日本开国至今最基本的焦虑；二是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的解读。随着丸山真男的去世，福泽谕吉又一次淡出日本思想界。重新激活福泽谕吉的方式已经不再是如何转化来自欧洲文明的价值观，而更有可能如何转换今日所谈的福泽谕吉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微言大义。最后，孙歌教授与在场听众就中日私德与公德等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撰稿：陆敏秋）

（二）未名学者讲座

34

杜正贞：诉讼档案、民间文献与普通人的历史——龙泉档案研究的尝试

2018年5月1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杜正贞作题为“诉讼档案、民间文献与普通人的历史——龙泉档案研究的尝试”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刚评议。

讲座伊始，杜正贞教授对龙泉司法档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具体阐述。她提到，这些档案的时间跨度约为一百年（1851至1949年），包括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时期；卷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涵盖了诉状、供词、笔录、堂谕、判决书等诸多类型，能充分体现司法制度的历史变化。同时，她介绍了在进行龙泉档案研究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多次搬运及不恰当的整理归档使得卷宗内部一度呈现不成体系、案例混乱的状态。为此，研究团队对档案

进行了整理和编目，并按照案件进行分类、选编、出版。目前，龙泉档案中的一部分案件已被结集出版。

接下来，杜正贞副教授回顾了自己接触龙泉档案并以此为题进行学术钻研的历程。她表示，由于学术背景的关系，自己指向龙泉档案的关注重点在于诉讼作为社会事件的一面。杜正贞副教授认为，她更倾向于通过对诉讼档案进行分析，回到案件的现场，并把诉讼当作人群的活动，重建原被告、证人、法官等人在事件中的活动情景及人物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当时的



杜正贞副教授

普通人理解并利用法律的方式及采用的策略。除了文献层面的档案分析，杜正贞副教授还在具体案件的牵引下进入村庄实地查访。围绕几个代表性案例，杜正贞副教授以生动精彩的陈述呈现了历史研究的具体图景。

在第一个案例故事中，她首先展示了道光年间修订的《季氏宗谱》材料，并根据司法档案、民间文献内容与实地查访的收获进行对照，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村民社会生活记忆变得模糊。随后，杜正贞副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诉讼案件的细节。这起立嗣纠纷案件发生于民国九年，矛盾主要围绕季氏死者的遗产继承问题。原告（死者继子）和被告（死者妻子）对簿公堂，其中，被告的身份与合法继承权成为诉讼的焦点。一百年前的华东农村，在特定的制度、法律和传统下，一个缺少官方证明、不入族谱的普通农妇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证明过程恰好反映了民间文献与官方文件在法庭上的“相遇”。

通过对诉讼档案和民间文献进行剖析，杜正贞副教授认为，在非司法的场合中，生活于熟人社会的普通农民并未高度依赖证明文件。与此同时，宗族生活内部又隐藏着权力、权利和资源的丰富冲突，因此，原被告双方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词。以往的研究通常更关注权利和义务的应然关系，但作为一种权利的证明文书，民间文献的使用方式（包括佃权、债券、宗族成员身份等重要内容的条例如何在实然状态下运行）这一问题也应受到进一步关注。

这起诉讼案体现出了户籍登记与婚书等材料的缺失以及查编户口门牌等信息表

的错漏等问题，而这些制度性的问题也在其他涉及契约的案件中有所体现。杜正贞副教授对当时土地调查不严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试举一例，民国十九年龙泉乡绅张雨亭山产测丈一案中，测丈所依据的契约文书充斥着荣昌当地复杂的本土化表述。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省测丈队只选取了一部分关键字句作为测量坐标的依据。如此以来，其造成的出入给龙泉县法院的核对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杜正贞副教授还介绍了与之类似的“民国十一年周陈养等与张绍鹏等山场纠葛案”。在这起诉讼案中，牵涉的不同契约所包括的山图均没有标准规范的地图标注，原被告之间地图划界的矛盾也由此而生。杜正贞副教授援引当时承发吏的实地考察报告，揭示在当地同样存在有本土称谓的分歧。她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其一，龙泉县等地的官方缺少山林产权的档案，仅存的判断依据为民间的私契，山产权利秩序以契约为主要手段建立起来；其二，山产定界方式由土名和四至构成，诸多土名对官府等外界而言都是地方性的知识；其三，“地方知识”又不完全是地方的共识，在口传到契约文本的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误传和分歧。

除此之外，杜正贞副教授还讨论了这类诉讼中“国家在哪里”的问题。以这起山场纠葛案为例，国家概念隐藏在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但仍存于山民的观念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以法律和官方档案为依托的举证策略。杜正贞副教授引用了龙泉档案中的相关证词：“庚磨戍下之田，有粮有号，一查便知”。但她也指出，

存在于档案中的“粮”、“号”与实地未必完全对应。《大清律例》也有具体规定，表明“近年者以印契为凭”，相隔时间久远时则不然，要求与官方档案进行“丈勘查对”。

通过与严州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杜正贞副教授说明了不同地区山林契约形式的差异。与龙泉相比，严州地区的契约文书还包括字号、山税、过割等具体事项，且背靠国家主导编纂的鱼鳞山册等官方档案。杜正贞副教授介绍，早在南宋时期，严州等地就开始对山产进行官方登记，并以此作为传统。山产和面积与税收概念也在当地一同流传下来。由此，山林在两地赋税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山产买卖的交割程序在严州等地要求国家代理人参与，龙泉等地则不需要国家中介。此外，不同地区的契约格式、争讼策略、证据类型以及从中体现的官民关系也有所不同。

根据龙泉司法档案所表现的内容，杜正贞副教授作出以下结论：诉讼是一个非日常的观念展演的场合，诉讼过程是当事人和法律当事人交流成果的呈现。当事人为了非日常的权利，会在诉讼过程中将隐藏在思想深处的概念进行表述。他们同时重新认识并学习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并快速地进行“务实”的转变。杜正贞副教授指出，以往的研究更倾向于揭示制度在地方的实现情况，其实，我们也可更多地关注普通人对制度的理解与实践。

最后，杜正贞副教授简述了山村中方陈两家的宗族纠纷案例，并由此阐述“宗谱”与祖先权利的关联。她认为，方氏宗谱对家族落户历史的记述虽不涉及山产所属的

直接证据，却有着社会生活层面的重要意义。诉讼档案中官方与民间文献的碰撞背后，是人们借助并利用制度、历史和传统定义并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权利和权力的过程。

随后，赵刚教授对杜正贞副教授的讲座进行评议。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联，并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强调道，历史研究可以关注与主流书写相对应的民间普通人物对制度进行的观察和体验。赵刚教授简要论述了西方社会史的书写方式，并提及研究者进入田野、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和既有概念所制约的现象。此外，赵刚教授还陈述了社会史有关的“大历史”与“大结构”的学术想象。他期望通过研究揭示历史之间的关联，并理解特定秩序被镶嵌在更大的结构中的方式。杜正贞副教授回应了赵刚教授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发自己历史研究的体验和思考，并重申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重要性。

（撰稿：陈洁樱）



35

段德敏：托克维尔论自由与权威



工作委员刘云杉（左）为段德敏副教授（右）颁发聘书

2018年5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作题为“托克维尔论自由与权威”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评议。

讲座伊始，段德敏副教授指出，与其他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虽然被归入此行列，但他对于权威的认可和分析使得其自由主义显得颇为“奇怪”。托克维尔将权威的消失

视作问题，且这一问题贯穿了他关于民主、法国大革命和帝国问题的思考及写作的始终。通过考察托克维尔对于帝国的讨论，我们尤其可以感知到他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距离。他在其间所谈论的“自由”与以私人领域为对象的自由内涵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所涉及的是一个比个人更大的存在，即政治共同体。由此，托克维尔也可以被纳入到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之中。可以说，托克维尔是在用前现代的概念去解释他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变迁。而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这一特点，则是理解其对于权威与自由之

间关系论述的前提与基础。

尽管托克维尔有着浓重的共和主义色彩，但他并非一个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对法国君主制颇有好感，而对等级结构的消失也持一种忧虑的态度。由此一来，在典型的自由主义与古典的共和主义之外，我们该如何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要义呢？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可以将托克维尔对于权威的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下对于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当作考察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托克维尔看来，权威的消失不仅不会带来自由，反而会招致专制。而在段德敏副教授看来，当代的民粹主义便是对此的有力佐证：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批判和攻击地方性权威，而这经常会导致一种权威性政治结构或者权威性人格的出现。许多当代政治理论家对这种现象感到棘手，而托克维尔关于权威的思考或许能够提供启发。

当然，托克维尔之前的思想家影响了他对于权威问题的理解，较具代表性的包括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为代表的保王党人和以基佐（Guizot）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在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学说中，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因为有贵族的权威来限制君主，所以有法治；后者没有地方贵族，君主凭其性情肆意妄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夏多布里昂等保王党人意识到地方贵族的消失是问题所在，由此，他们要求恢复旧的贵族制度，甚至是恢复长子继承制。然而，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反动，而是要通过贵族限制国王

权力、防止专制、保障自由。与此同时，在基佐的书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脉络——他在梳理法国历史时，将地方贵族的消失看成一个问题，认为与贵族消失相伴随的是国王权力的急剧增长。在看待地方贵族权威的态度方面，托克维尔继承了其法国前辈的思想传统。但是，段德敏副教授指出，托克维尔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即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同时，他还将对两种社会的分析置于时间的维度之中来展开。在他看来，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民主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而民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非制度），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虽然在财富、权力方面不尽相同，但在身份方面却是趋于平等的。

接下来，段德敏副教授通过展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凸显了其对于民主、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托克维尔那里，法国大革命并不像保王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意外的暴动，它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趋势不可逆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和分析大革命之前（旧制度时期）的状况，指出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出现，即法国国王权力的急剧增长。而这一变化的前提是地方贵族权威的消失，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期，贵族丧失了地方自治权，沦为国王的附庸，失去了对地方人民进行统治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个一个单独的、无力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缺少中间力量的保障，个人的自由受到巨大的威胁。

在民主社会变得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强调，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因此，他开始分析美国社会，在那里看到了法国业已消失的地方自治传统。只不过，与法国的贵族自治不同的是，美国展现的是地方的乡镇精神和旺盛的结社热情——他们以这种方式结成了地方共同体。以至于在沃林（Sheldon Wolin）看来，托克维尔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与古代封建不同的是，人们已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社会的等级结构已经消失，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当中解放出来，不再对传统权威进行服从——个人变成第一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人为的创造变成第二位。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在《论美国民主》中，他区分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利己主义（egoism）：前者描述的是社会当中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私事，每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开来的状态；而后者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的自私。秉持个人主义的人，私德可能很好，但他并不关心公共事务，故而在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就非常容易出现权力的集中。在这种状况下，平等与自由就表现出了某种矛盾：新的身份平等的社会之中，人们更能够体认平等的好处，而对自由的好处少有欲求，因为自由意味着要为他人的利益奔走呼号；当他人遭遇不公时，要努力为他人去争取——这在平等的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显得颇为不易。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了纾解平等与自由之间紧张的可能性，地方自治、乡镇精神、自愿结社等都

使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在个人之上有着更高更大的东西，它们在现代社会之中使专制得以避免。

此外，托克维尔对美国律师制度的看重以及对宗教的体认，都能够凸显出他在自由与权威关系上的态度。特别是在讨论美国的宗教时，他将其视为首要的政治制度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保有自由的保障。托克维尔看重宗教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帕斯卡（Pascal）的影响。而他对宗教的政治作用的强调则与马基雅维利将宗教看作政治上的工具有着共通之处。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使人们的思想不再动荡不安，不至于怀疑一切，不至于在所有问题上都争论不休。而如果没有宗教的话，大多数人的观点可能就成为了是非的标准；或者当有一个集权人物存在的时候，他所灌输的理念便会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宗教使得是非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确定，而在这一确定的标准之下，个人的自由就有了空间。使托克维尔感到遗憾的是，法国人将宗教视为旧制度的一部分，故而在反对旧制度的同时把抛弃了宗教。

段德敏副教授进而指出，权威不是自由的反面，强制（coercion）才是。而强制与权威是两回事，因为权威体现一种合法性，而合法性需要人们的同意。随着民主社会的到来，人们反对权威，提升个人的意志，力求个人的解放，但不经意的结果却是自由不再。阿伦特在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时坦承自己受到托克维尔很大的影响。托克维尔未曾看到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当人们大都以一种乐观的进步态度来看待身份平等到来、贵族消失时，他

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民主的趋势并不会自动导向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式的专制。

评议环节，倪玉珍副教授表示，她非常认同演讲中关于托克维尔思想面向之丰富性的判断。托克维尔虽常被归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很少谈及自然权利；虽也被划入共和主义的传统，但他对古典时代并不留恋。在面对这一丰富性时，将传统权威的衰落视作托克维尔的思考起点是恰切的。回望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大革命中，旧的权威（包括王权、教会和贵族）被摧毁了，而新的合法的权威却并未确立起来。在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看来，这是民主的消极时刻：即人人身份平等了，但随之而来的却并非自由的政治。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一种把个人解放出来的社会状态，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上，则矗立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之下，原子化的个人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中的互助与协作来学习服从合法的权威的方式，并通过再造中间性的团体抵御强大的中央集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为成熟的、拥有公共美德的公民，这对于民主社会中自由制度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两位教授共同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关于以个人权利与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同强调个人要融入到自治性的团体之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段德敏副教授引用泽登托普（Siedentop）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

的区分，并指出法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警惕社会的原子化，对于社会的变迁有着充分的体认，并且关注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状态。他们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化甚为敏感，同时也保有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坚持。托克维尔所理解的个人自由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所描述的现代人的自由是很相近的，但是就如何理解“个人”来说，到底是从非常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个人当作社会的前提，还是将个人置于共同体之中来理解则是需要进行区分的。关于如何理解托克维尔所说的“一般观念”，倪玉珍副教授指出，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章中，托克维尔专门谈到一般观念的问题：当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太确切时，就倾向于用一般观念来表达；而与一般观念相对的是非常关注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学说，其中的典型代表即是社会科学。虽然人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是有限的，但还是要努力地一般观念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对一般观念的喜好与民主社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于古代社会中巨大的身份差异，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就为普遍和抽象的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撰稿：张旭）



36

王彦晶：知识的逻辑——从哲学到人工智能

2018年5月30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彦晶作题为“知识的逻辑——从哲学到人工智能”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林作铨评议。

王彦晶副教授首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什么是“逻辑学”。“泥孩谜题”是一道著名的逻辑趣味题，王彦晶副教授通过现场互动游戏的方式演示“泥孩谜题”，让在场听众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推理过程和复杂程度。而我们在做推理时需要的那

种“靠谱”的工具就是逻辑学。随后，王彦晶副教授解释了一些逻辑学中的概念，包括形式化的语言、真值条件语义以及证明系统。

王彦晶副教授还介绍了逻辑学的发展历程和现代逻辑学的主要分支。他认为，逻辑学起源于哲学，成熟于数学，繁荣于计算机科学，并为语言学、法学、博弈论等学科输出了理论工具。而现代逻辑主要分为数理逻辑（包括集合论、模型论、递归论、证明论等）、计算机逻辑（包括模型检测、自动机理论、计算复杂性、人工智能中的逻辑等）、哲学逻辑（模态逻辑、非经典逻辑、以及逻辑哲学中的技术问题



讲座现场

等）等领域，且有很多与其他学科交汇的交叉研究

讲座的第二部分，王彦晶副教授介绍了什么是“知识逻辑” (Epistemic Logic)。知识逻辑是一种模态逻辑，而“模态”可被理解为“真”的不同模式。模态逻辑的语言更加直观，模型应用更加广泛，也有很好的计算性质，而知识逻辑是一种研究知识推理的模态逻辑。

接下来，王彦晶副教授梳理了知识逻辑的发展历史。知识逻辑的想法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哲学家。有关知识逻辑的研究来自于逻辑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为知识逻辑做出了贡献。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起始于冯·赖特 (George Henrik von Wright) 和辛提卡 (Jaakko Hintikka)。他们提出了知识逻辑的公理，并对知识的语义也有开创性的研究，把知识和主体结合起来讨论。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罗伯特·约翰·奥曼 (Robert John Aumann) 从博弈论的角度独立地发现了知识模型，他提出并应用了公共知识的形式定义。在计算机领域，约翰·麦卡锡 (John McCarthy) 进行了人工智能的早期尝试，并推广了知识谜题和应用逻辑——他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奠基人。哈珀恩 (Halpern) 及其合作者着眼于从人到机器的知识，研究了知识逻辑在分布式系统中的应用。之后，很多学者又将知识逻辑转向了动态知识逻辑的研究。

知识逻辑以“知道” (K) 作为模态算子，它可以表达：“主体 i 知道 (knows that) ϕ ” ($K_i \phi$)，同时还可表达很多



更复杂的句子。知识逻辑的模型是由一些点和连结点的线组成的：点代表可能世界，线代表可能世界之间的可通达关系。在最强的知识逻辑模型上，这种关系是等价关系，可以理解为“不可区分关系”。因此，“知道”的语义定义是：i 在世界 w 上知道 ϕ 当且仅当在所有从 w 出发 i 不可区分的世界上 ϕ 都为真。王彦晶副教授还介绍了最强的知识推理系统 S5，着重讲解公理“4”和公理“5”的直观意义，并将这两个正负内省公理与《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联系起来。

随后，王彦晶副教授介绍了知识逻辑研究的一些比较晚近的方向。首先，知识不只是某个主体个人的知识。因此，除了研究个体知识的知识逻辑，对于群体知识

（比如分布式知识和公共知识）等都有相应的知识逻辑研究。此外，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泥孩谜题”就是动态知识的一个例子。有关知识改变的研究带来了知识逻辑的动态转向，产生了“公开宣告逻辑”等动态知识逻辑。知识逻辑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哲学中，知识逻辑的研究给知识论带来了新的启发，各种形式化的方法给知识论带来了新的问题。此外，知识逻辑与理论计算机、人工智能、认知博弈论等学科也呈现高度交叉的状态。即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知识逻辑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最后，王彦晶副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最近的研究方向。传统的知识逻辑主要集中在对“知道如是”（knowing that）的研究，但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知道是否”（knowing whether），“知道是谁”（knowing who），“知道如何”（knowing how），“知道是什么”（knowing what），“知道为什么”（knowing why）等。然而，这些超越“知道如是”的知识逻辑研究，往往不能局限在命题模态逻辑中，而需要谓词模态逻辑。相较于命题模态逻辑的成功，有关谓词模态逻辑的研究并不充分，同时也存在更多的理论问题。王彦晶副教授希望能够发现既有足够的表达力，兼具命题模态逻辑良好性质的谓词模态逻辑，用来作为知识逻辑的新框架。他认为将必然模态算子和存在量词“打包”并得到一个新的谓词模态逻辑片段，能够在表达力和复杂度上满足我们的需要，他展示了自己和其他学者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

评议阶段，林作铨教授表示，王彦晶副教授补充了数理逻辑和北京大学之间的渊源。北京大学是现代逻辑传入中国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很多知名的逻辑学家（如金岳霖、汪奠基、张申府、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吴允曾、马希文、康宏逵等）都曾在北京大学求学或任教，著名逻辑学家罗素也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北京大学讲学。之后，因为历史原因，北京大学的现代逻辑研究一度中断，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恢复。林作铨教授表示，自己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了二十年的数理逻辑课，而北大有着非常深厚的逻辑学传统。随后，两位老师和现场听众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撰稿：刘默）



（三）北大文研论坛

64

周锡瑞等：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陕甘宁边区的起源



2018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陕甘宁边区的起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讲座教授周锡瑞先生（Joseph W. Esherick）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杨奎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主任章百家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牛大勇、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黄道炫，及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出席并参与讨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出席并参与讨论。

周锡瑞教授在引言中指出，他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起源”时使用了研究义和团等问题时的方法，即把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口头历史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陕北地区进行了多方面考察。一直以来，中国倾向于从党史的角度



周锡瑞教授

去谈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但对于学界来说，社会史的视角是必需的。那么，党史和社会史研究有什么区别呢？党史研究有其特定的方法和目的，它关注历史人物的评价，关心领导人的岗位变迁和政策得失；相较之下，社会史研究则关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教育经历以及在革命前后和周围人群的关系。例如，党史资料提到陕北革命重要人物刘志丹时，只表明二十六军是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组建的，至于“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也只笼统谈到其与当地民团

有一定的关系。显然，这样简单地分析阶级成分并不能展现历史的原貌。而在社会史的范畴，我们则需要探究刘志丹究竟是如何动员、拉拢民团的？这些被他动员起来的所谓“土匪”、“流氓”又在当地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社会史关心的问题。

接下，周锡瑞教授简单概括了他自己的课题。在探究陕甘宁边区起源的问题上，他把自己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共产党革命早期，第三阶段是“土匪与布尔什维克”，即刘志丹和陕西省委之间矛盾冲突的时期。本次报告中，周锡瑞教授着重谈第三阶段，即主要谈论 1934 和 1935 年的历史，并探究陕甘宁地区是怎样在短短两年之间实现革命力量从无到有的过程的。周锡瑞教授谈到了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时代背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时的中共还没有把“抗日”

当作自己的主要口号，而是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显然，这个口号并不能在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深入人心。1934 年，中共的宣传重心始转移到“抗日”上。在“抗日义勇军”的旗帜下，很多百姓响应号召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

其次，地区气候也影响了革命局势。1926—1931 年间，关中和陕北地区发生了大面积干旱，中共很难动员饥民发动革命。直到 1934 年大丰收，部队有了足够的粮食，征兵工作才得以较好地展开。另一方面，大丰收之后，地方政府增加农民的税收，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的百姓选择参与革命。

此外，地理因素也构成了陕北革命的社会背景。刘志丹是陕甘地区的革命领导人，他的家乡是延安西边的保安县（现为志丹县）。保安县受“回乱”影响严重，人口稀少。之后，随外来人口迁入，土著和非土著之间产生矛盾，并在长时间的争斗中形成多方民团势力。刘志丹的父亲出

身民团，刘志丹在发动革命时，便是通过此方面的关系动员民团加入到革命队伍中。而另一位陕北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谢子长，则主要活动在榆林地区。这一地区相较陕甘地区耕地要多，文化水平要高。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两所学校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很多农民学生后来成为了党组织在地方上的重要干部来源。陕甘和陕北两地不同的社会地理，造就了两个地方不同的革命发展路线。

在革命过程中，谢子长带领的陕北派和刘志丹带领的陕甘派虽然一直矛盾不断，但在战斗中则多有合作。可以说，整个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是在谢、刘二人“一文一武”的合作中完成的。谢子长有较为完备的党组织，刘志丹则带领着集结了各方力量的革命军。陕北革命中，刘志丹率领军队南下，与谢子长领导的党组织结合，通过学校的人际网将当地的乡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动员了起来。在两人的带领下，到 1935 年下半年时，延安周边已经有多个县革命成功并脱离国民党的管辖。

但是，在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之前，陕北和陕甘两派正处于矛盾之中。陕北派为了压制陕甘派，通过“肃反”抓捕了二十多名陕甘派的干部，刘志丹也因此以“叛变革命”的罪名被捕。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纠正了“肃反”错误之后，刘志丹才获释回到军中。但在之后不到一年，刘志丹就在晋西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刘志丹究竟是如何牺牲的？是因为战争还是内斗的因素？周锡瑞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牵扯出另一段历史。对于革命史中的诸多细节，他能做到的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很多时候“石头还没有摸到”。

随后，与谈人发言。赵世瑜教授指出，周锡瑞教授在研究陕甘宁边区起源的问题上，采取了和研究义和团运动同样的方法，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和义和团确实有类似的地方。起初，它们都只是一个脱离了国家政权管辖的特殊行政区，只不过，陕北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共后来成为了合法的政权。所以，陕甘宁边区才有了和义和团截然不同的命运。若我们暂时抛开党史的视角，单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看革命地区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更多的矛盾和问题。试举一例，在“回乱”平息之后，清政府组织了大批移民，到十九世纪末期时，陕北地区就已经有了很多甘肃、宁夏迁移来的移民。此外，历史上，延安本身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性非常大的地方。它毗邻长城，常年有军队驻扎，连带着也有很多为军队服务的百姓在此定居。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人口构成复杂且流动性大的地方，却一直至明末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反而是到了后来，生活稳定，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的内乱才逐步开始出现（比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现在讨论的陕北革命）。随着生活逐步安定，政府开始对这些一直来自自由散漫的偏远地区“编户齐民”。于是，赋税问题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索。

宋怡明教授谈到，早期美国在研究中国革命史时非常重视阶级，认为阶级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重要的历史分析工具。但现在大家则逐渐认识到，阶级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一种政治语言，因此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此外，“革命潜力”也是美国学界常常谈到的概念——



现场气氛热烈

或是从抗日史的角度谈革命潜力，或是从党史的角度谈革命潜力；而周锡瑞教授并没有受到这种研究传统的限制，他直接从物质条件和社会构成的角度去探究三十年代的中国，这是非常难得且可贵的。当然，这可能和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学界对待革命史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接近研究政治动乱或起义运动的研究方法。

唐晓峰教授发言，他指出地理分析在周锡瑞教授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周锡瑞教授区分了陕北革命的两个不同地区：一是人口较少、矛盾冲突较多的陕甘地区；另一个是人口较多、较为安定且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的陕北地区。通过这种区分可以看出，共产党革命和其他“氓流起义”的不同点正在于革命者身份的不同——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若非如此，陕甘宁边区和义和团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说，谢子长与刘志丹的合作正体现了共产党革命的典型特征。此外，唐晓峰教授也谈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革命潜力，即中国农村中的“造反机制”。当农村社会遭遇重大危机（例如灾荒）而官府又不出面解决时，矛头就会转向官府，就会有一批聪明的“捣蛋分子”开始出头，带领大家起来反抗。共产党在革命时也在农村中利用了这种造反机制，并做了进一步引导。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革命以中国广大的传统农村为基础，而非新兴的工商业和口岸经济地带。

欧阳哲生教授指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相比，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确实其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

立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也主要归功于刘志丹和谢子长。这些领导者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带到了军队和农村中，使得共产党革命呈现出与义和团不一样的面貌。其次，无论是井冈山还是陕甘宁，领导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根据地的选址定在了十分偏僻的地方。在这种偏居一隅、没有革命倾向的地方，只有领导人积极动员，革命才有可能产生。因此，欧阳哲生教授向周锡瑞教授建议，在采用研究农民起义的方法考察陕北革命的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和传统农民起义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不同的地方恰恰是这场革命成功的关键。

作为一名榆林人，高波老师谈到了陕北特别是榆林地区在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保守。但是，保守的陕北为什么能够诞生出如此巨大的革命力量？对此，高波老师指出，陕西人在提到陕西时一般是从南北纵向来谈的（如“陕北”、“渭南”）。而周锡瑞教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东西跨向的视野：陕西的西边山地多、人口少、“土匪”多，而东边相对来说耕地多、人口多、文化程度高。那么不妨推测，对于内陆的革命来说，外部因素的介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陕西是一个地处西部的内陆省份，在这里“建国”的汉、唐其实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外来政治精英集团革命的成果，而非陕西人自己的功劳。因此，似乎必须要有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外因介入，内陆的革命才有可能。

罗梅君教授指出，在社会史中我们会考虑到不同阶层、不同种类的人群甚至是

不同性别之间的问题，只有把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阶级问题考虑在内，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革命，因此当下在研究革命史时我们应当把党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此外，作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罗梅君教授也提到了马克思一些基本原则对她的影响，比如在对历史原因的分析上，她会更加看重经济因素和社会分层（social division），并且，罗梅君教授认为，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才能在历史中取得诸多成功，比如本次论坛谈及的陕北革命，农民们更多地支持共产党而不是支持国民党，正是因为共产党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牛大勇教授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陕甘地区的党组织虽比陕北弱一些，但还是一直存在的；第二，陕北地区虽然人口较少，地理相对封闭，但在村社内部仍然有着严密的宗族组织，这些宗族组织有时会游离在宗族之外的流民发生矛盾，而这些小的矛盾在遇到外部力量冲击时（比如土地改革）就有可能转化为革命；第三，黄土高原的独特地形为革命军采取游击战术提供了条件，也让国民党后来的“围剿”变得较为困难；第四，如果有人通过宗教或党派把饥民组织起来，饥民就有可能造反；第五，作为一个曾经被判“反革命”的人，刘志丹很可能希望通过战死沙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章百家教授也提到，国内的党史研究一般呈现为两种倾向：“八股式”研究与“八卦式”研究。而周锡瑞教授的研究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社会史的视角，而这个

视角对于党史研究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章百家教授也提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传统的农民革命往往是农民起义成功后，知识分子再被招揽加入；而中共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新式知识分子发起的。作为社会精英，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又学到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人际关系网，而最初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只是在这样一个精英的小圈子中诞生。此外，章百家教授也强调，革命和造反是两个概念，革命是要“改朝换代”，虽然国民党也讲革命，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真正扭转乾坤的社会革命——这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黄道炫教授表示，我们在讨论历史原因时，总不免会陷入一些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只是一个伪议题的原因之中。所以，议题本身首先就要切中要害，只有这样，我们在探讨原因时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目前，国内的革命史研究也逐渐开始强调社会史的角度，这种新视角的引入确实大大丰富了革命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素材。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具有连续性和独特性，我们在谈论它时必须将政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若完全抛开政治因素，单纯考察社会关系、地理结构等次要条件，很多问题就会难以说明。虽说共产党的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但它将政治因素注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用政治的手段改变、控制社会。因此，政治因素在革命史中永远占有一个实质性的地位，这是我们无论从事革命史哪方面的研究都要保有的清醒判断。

杨奎松教授最后发言，他指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起源，就必须谈到宁夏和回民的问题。作为一个行政区划，“陕甘宁边区”其实和地理、经济，甚至同红军长征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至于哪些县属于边区，而哪些县不属于，这一划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共两党持续斗争的结果。共产党实际控制的“边区”范围一直在变动，从最初的15个增长到18个，1942年时又增长到23个。在这期间，若中共很好地控制了宁夏的两个县，那么中共后来的干部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从宁夏回族中培养出来的，但事实并未如此。因此，杨奎松教授也希望周锡瑞教授可进

行一些跨省研究，更多地探讨陕甘宁三个地区共性的问题。此外，杨奎松教授也谈到了陕北的党员成分。自苏维埃革命后直到中央红军到来前，陕甘宁地区的富农和富裕中农一直都是党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人正是前面几位老师谈到的新兴知识分子，他们作为革命的领导集团带动了当地其他农民参与革命。

最后，周锡瑞教授就与谈嘉宾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建议做了回应，并与莅场同学进行热切交流。

(撰稿：孔博琳)

65 郑振满、赵世瑜等： 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

2018年5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李新峰、博士后毛亦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邓庆平出席并参与讨论。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道，卫所是明代的特殊制度。许多人和地都被划归到军队，形成了卫所。作为明史中的重要议题，很多地方史的研究都离不开卫所的背景。从地方脉络来看，卫所在明、清两朝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切断隔离的。

宋怡明教授接着描述了自己所做的卫所“热图”——通过地理上一个个的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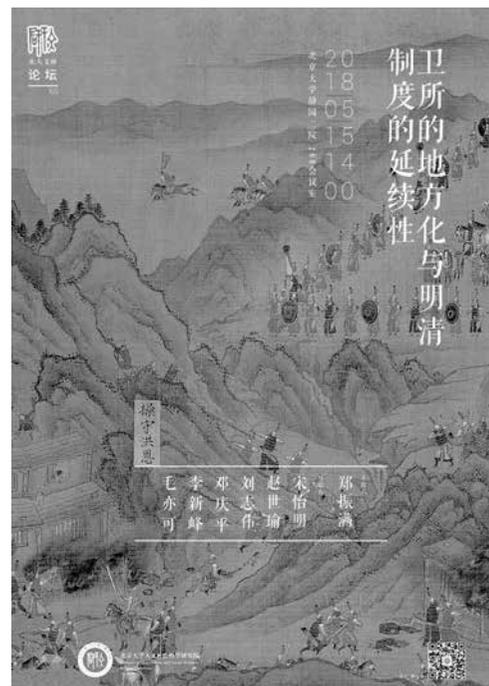
地点来解释明代的军事状况。宋怡明教授表示，在明代，有义务当兵的那些家族的族谱里往往详细地记载有处理自己与国家制度之间关系的方式。接着，以泉州地区的族谱为例，他讲述了严家六个儿子在卫所当兵的故事。宋怡明教授认为，作为军户被派到卫所的大都是外地人，且明代军队在正规打仗的操军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军（即屯军）。操军住在卫所里，屯军的主要任务则是种田，以供给操军。屯军若要进入地方的社会实现地方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跟其他的战友建立一个共同体；二是跟当地的老百姓产生关系，如婚姻网络、经济手段等。

接下来，宋怡明教授从三方面概述明清制度的延续性。其一为延续性，清朝建立以后并未马上将所有的明朝卫所取消，豫州卫所就被延续了下来。其二是明代卫所的制度遗产。当敦煌玉门关在清代面临军事威胁时，人们就联想到卫所，且知道它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另有福建东山岛也利用明代留下来的卫所文化资源来处理他们与清廷的关系。其三是明代卫所留下来的一些其他因素。如安溪虎头镇的侯山庙因在明代有大量的屯军入驻，故而留下了一些民间信仰的宗教因素，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李新峰教授表示，著名史学家顾诚先生经过艰苦阅读，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明代的卫所和州县之间是否呈现出分庭抗礼的关系？二者是否在空间分布、人口和土地管理上呈并列关系？顾诚先生的初步结论是肯定的。但李新峰教授认为，如果按照顾先生的思路进一步深化，就会

发现他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李新峰教授表示，从社会组织来说，明代的卫所系统并不仅仅是军队。由于军队都有随军家属，所以其实存在一个像军队大院这样的组织形态。在对沿海、西北和西南的卫所进行比较后，李新峰教授发现，尽管存在一定区别，但这三个地区的卫所和州县享有一个共性情况，即卫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政区色彩要弱于传统的司府州县系统。因此，李新峰教授认为，卫所是明帝国疆土管理系统的一个辅助系统。而且，也正是因为卫所在州县面前是辅助的角色，才使得清代的卫所归并州县后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

围绕明清两代之间制度转变的问题，毛亦可博士从卫所机构设计的变化和卫所下的军户变化两方面切入，介绍了自己关于清代卫所跟州县的研究成果。毛亦可博



士发现，过去，人们都把卫所当作是清朝从明朝完全沿袭下来的、需要改革和扬弃的制度，但其实清代有新建的卫所。清朝一方面在裁减，另外一方面也在新建。总体来看，这些新建卫所总数不大，且多在边疆。当边疆的一些地区无法直接建设州县却又需要管理组织时，清廷就会采用卫所制度，迁一部分汉族人做屯军，以卫所屯田的形式控制边疆地区。此外，毛亦可博士还发现，土地上，屯田的所有制并不是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立刻成为民间所有的土地，而是经历了一定的波折后慢慢变化的；人口上，军户改为州县管理以后，人户编制从原来卫所的编制里脱离出来的形式在南北方也存有一定的地理差异。总之，卫所从明朝到清朝的改良过程是复杂的。

邓庆平副教授讲述了自己关于蔚州卫的个案研究。他从顾诚先生关于卫所与州县的两套关系讨论出发，以河北张家口市蔚县为研究对象。从明清的地方志中可发现，清初蔚县卫所归并州县的过程非常复杂，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直到乾隆年间才完成。更重要的是，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三次蔚州卫的调整都由地方民众推动。从顺治年间，清廷就讨论要裁撤蔚州卫与蔚州合并，但地方上的军户当街抗议，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邓庆平副教授认为，是地方历史本身而非国家意志决定了清初卫所改制的走向。邓庆平副教授进一步推测，因涉及土地、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过程，清初北部很多地方出现家谱也与卫所有关。由于户籍、土地管理、科举制度等方面的不同，明代卫

所制度在地方推广以后塑造了卫所和地方两个体系的人，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到清代，一旦要调整卫所制度，原有的一套卫所制度可能就会发挥影响。对于未来北方地区卫所的研究方向，邓庆平副教授指出，需要在身份（包括卫所制度给予人的身份和族群的身份，如蒙古人和真人等）、生计、宗教生活或礼仪系统上做更多的挖掘。

赵世瑜教授表示，学者们应当根据老前辈们开辟的极具学术意义的话题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顾诚先生对卫所制度和州县管理体制的讨论为例，李新峰教授提出的问题，就是沿着顾诚先生的两套帝国疆土管理系统而深化出来的。而针对这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表示，可以从很多层次去分析。一是制度设计，从初衷来看，统治者是否将卫所和州府当作两套管理制度有待商榷。二是主辅关系，在州县系统为主的制度中，卫所制度可能是辅助性或从属性的地位——但这样的主辅关系，从逻辑上并没有完全改变或者否定这是两套管理系统。由此，赵世瑜教授认为，虽然李新峰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但顾诚先生也并未说过卫所的系统是主要的（或说与州府是等量齐观的），所以，其观点不足以动摇。三是具体的实践层面，官员们认为，士兵总逃跑是因为家属不在身边，所以从明代前中期开始，政府允许家属可跟随到服役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人们眼中的卫人，即随军家属。军队大院逐渐有了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学校，但卫人和当地人在口音、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非常不同。此时，就亟需打破区隔，与当地频繁互动，实现地方化。

针对卫所的地方化，赵世瑜教授进一步剖析道，卫所的人与地方的人被认为是两部分人。卫所人所用的语言就与当地人不同。现今湖南、江西许多地方保留下来方言，就被认为是卫所的语言，与周围地方的人说的方言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卫所军人的后代以及受到卫所影响的一些本地人，慢慢形成了文化、身份上的区隔。其次，卫所制度通过身份、信仰等因素代表国家制度，而在精神层面之外也形成了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卫所制度涉及到人们在当地社会的身份、位置、发言权等，而这些实际的利益甚至会改变族群的结构。第三，地方反过来也会给卫所制度带来新的变化。制度是实践的产物，一旦涉及到利益，就免不了在老百姓、地方士绅精英、军户和国家、制度、官府之间频繁互动。

卫所在明代采取世袭制度，就说明政府希望这套制度维系下去，且这套制度的维系对国家很重要。清代在边疆地区新建卫所，也是因为这套系统是人们熟悉的，而为了保留这套制度，就要去适应老百姓的需求而改变。因此，赵世瑜教授强调，人们不能够将制度看成僵化、缺乏弹性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看成是脱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自上而下的主观创造。此外，尽管州县在明朝占有较大的比例或说重要的位置，但并不能说，在社会生活层面，卫所的军官、军人、家属在地方上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都比州县的人民或者其他的士绅低。赵世瑜教授还表示，卫所系统的军人及其家属在贸易、商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被忽略。以前，人们比较关心十五、十六世纪中国腹地和中心的全

球性贸易，但其实，边缘地区或周边的边疆地区才是首先发生贸易接触的地带。在这些地方，势力最强大的恰恰不是州县，而可能是卫所。例如，西南边疆、沿海地区或沿边地区是卫所分布最密的地方，卫所的人在这些地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志伟教授则提出，卫所的地方化是假定的，甚至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当人们谈卫所地方化时，是假定卫所以外的行政建制或国家建制叫做地方建制。但是，卫所跟州县并不是国家构造里的不同部分。也就是说，并不能说卫所属于国家，而州县属于地方。我们需要从国家体制的原理出发来看卫所制度。以北朝到唐代的府兵制变化为例，一般通史认为，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制度。但其实在北周，府兵制并非如此。直至明代，卫所和州县也不像隋以前的府兵制那样呈现出那么明显的分离。刘志伟教授认为，从两套组织原理出发，卫所本身就带出很多问题。尽管卫所里大多是外地人，但在西南的卫所也有本地人。在南方，尤其是福建和广东，卫所则更加复杂。例如，卫所有自己的学校和科举，而福建和广东科举成功的人士大部分是军户，出自卫所，但这些军户又大都是原籍军户。此外，至于屯田问题中的公有、私有问题，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其转变中的复杂性。

总之，刘志伟教授认为，在讨论卫所地方化时，需要把问题想得更为复杂，尤其是落实到很具体的每一项措施、每一个现象分析时更要谨慎。只有这样，当人们分析明清制度延续性时才不会太过简单化。毕竟，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前后两个不

同的朝代),军事制度与别的制度不一样,它往往不直接将前朝的整个军事组织接受过来。卫所并非简单纯粹的军事组织和国家机器,所以,可在其基础上延续下去。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延续州县不一样的是,清代基本不再以卫所作为军事力量、武装力量的承载点。

最后,郑振满教授进行总结概括。他表示,卫所很重要。尽管有时并没有很大的管理权,但它确实带动了人口流动和跨区域发展,甚至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其次,卫所是多元的,其在很多地方同社会发生关系时呈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地

方管理人口,有的地方管理地产,有的地方不管理任何事务……不可以对其进行简单概括。最后,卫所制度具有延续性。制度包含有丰富的内涵,不只表现在屯田和劳役的问题上,也可表现在诸多不同的层面。直到今天,卫所制度塑造的帝国社会(包括文化)也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它。而此次论坛的重点则在于,从卫所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国家。

(撰稿:熊晓晓)

66

韩潮等: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

2018年5月2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治,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刘训练出席并参与讨论。

“西学如浮萍”,韩潮教授如此比喻西学的中国现状。当下的西学理论看似在中国占据强势地位,却没有扎下切实的根。这一困境在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期间西学刚引入之时也有所体现。梁启超将当时西洋思想的输入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即无组织、无选择、以多为贵。梁启超回顾道,“故运动垂二十年,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直至今日,梁启超的自我反思依旧很有意义。若进入学术内部来看,表面强势的西学在学术界依旧没有“主心骨”。韩潮教授希望在此

次讨论中回顾并检讨西学的学术进展。他指出,截至今日,西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在输入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真问题。

高波老师以春秋概念在晚清的出现作为研究起始点,他发现,西学从一开始就已经内在地进入到了整个中学的内部。此次报告中,高波老师以丁韪良为线索,试图解答1860年代万国公法模式转变为1880年代春秋公法模式的路径与方式。

首先,高波老师从国际法的译名问题切入。19世纪,国际法曾有译名的变化。类似于早期的“万民法”,丁韪良的翻译回到“万国公法”这一译名,不再指涉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概念,转而强调所有国家都要遵守的律法概念。“万国”即多,是很多国家共同的,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修辞问题。然而,在中国经史传统之中,“万国”并不是纯粹的修辞,而是有着对某种历史阶段的指涉含义。因此,万国公法所对应的即是五帝到三王的时期。然而这一解释遗留下的重大问题在于,万国公法被理解为以盟约为主,而这与中国三代之治不能匹配。在中学内部本身就存在两种说法:一种偏经文的说法认为,历史早期盟约较少,往后接近国际法时秩序才会出现——这是管理秩序衰落的表现;另一种偏古文学的说法则认为盟约体系与三代之治是一致的。

1880年代以后,“万国公法”的翻译将问题带人

中国学问内部。丁韪良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将公法和春秋时代相对应,形成了所谓的“春秋公法说”。1883年丁韪良以英文发表了《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并在1884年将其译成中文,而在中文语境中起作用的正是这一文本。春秋公法背后的历史论使用的即是前文提到的古文学模式,认为春秋和三代之间是连续的,中国公法早就寓于封建之初,而显著于春秋之世。随后,高波老师继续就国际法与封建之间的关系、国际法的历史阶段等问题深入展开。

最后,高波老师表示,《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这一文本与当时整体时代气氛之间存在微妙的对应关系。“万国公法”是在理学气氛非常浓郁的中国学问环境下翻译的,据考证,至少有九位中国人参与了翻译的整个过程。而在转变开始的1884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首先,中西关系再度恶化,中法战争打破了1860年以后二十年的和平。其次,理学代表人物曾国藩去世,中国思想内部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展了一场今古文之争的决定性争论。因



韩潮教授

此，在这一微妙的时间点上，《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出现，不能简单地用中学附会于西学来解释——附会是双向的，中西相互对应，两者之间产生共振。当时，以传教士为核心的西学输入者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妙。

随后，范广欣副教授发言。他主要讲述卢梭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在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潮中，梁启超、李大钊等诸多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从卢梭理论中吸取营养。范广欣副教授将中国人对卢梭的研究视为创造性工作，并将有关文献视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性作品。他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近现代研究，并通过这一个案出发，反省比较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

留日学生杨廷栋在1902年回国之后翻译出版《路索民约论》。杨廷栋个人的见解在他的译文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他希望通过介绍和诠释卢梭的理论为读书人和国家寻找到一条摆脱秩序危机的出路。在中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的关键时刻，杨氏的版本特意为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教育。范广欣副教授着重分析《路索民约论》第二卷。这一卷揭示了杨氏版本的社会契约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做出独特贡献的方式，以及一个强势的君主对于推进公民和国家的自由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杨廷栋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列强侵扰，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削弱或者推翻君主制，而是确保君主领导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列强、保护人民。人们接受启蒙获得自治能力以前，由君主自由统治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关键。

对比《路索名约论》我们可以发现，杨庭洞的翻译似乎与卢梭原理存有相当明显的偏移。相较于卢梭原文介绍的由命运而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社会条件本身，杨氏描述的强势君主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相类似。对此，范广欣教授指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读者似乎是君主，但实际上却教育人民识破专制君主的阴谋诡计。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一本倡导共和的书。

联系葛兰西所论述的现代君主与政党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杨廷栋提出的强势君主的本质。这里的“君主”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建构？或是一个能够履行现代君主角色的政党？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解答可以为杨廷栋的政治立场做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杨廷栋用强势君主象征革命政党，我们必须重新审慎对待他转向保守制的说法。他一直在引导现代知识分子辩论、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意图是倡导一个由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为中国社会建立全新的秩序，并为将来真正持久的民主转型做好准备。

纵观《路索民约论》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文本通过互相抵触的论点为读者提供各式各样的视角和多元的诠释，这有助于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认识并反思现代政治与公民角色。《路索民约论》提醒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简单快捷的方式理解革命民主与良好治理的关系。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面对相似的问题与困境，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寻找出路。同时，他们也可以从杨庭洞提供的正反论点中吸

取营养，更好地反思自身的历史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唐文明教授概要地梳理了西学引入的脉络。中国最早的几位西学家对佛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都是通过佛学讲儒学。后来的西学家则因为有过留学经历，故而在诠释的方法和资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9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做东西方哲学的演讲，用佛学唯识论来解释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对比的特点，后转而用西方的概念解释——见证了一个从以佛学为核心过渡到以西学为核心的过程。

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争论。在这一背景下，学界一直流行这样的推论：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则更为注重精神文明的体系。所以，辛亥运动以来，中国学界精神哲学的转向（包括对西方的认识论、佛教的唯识论的应用）与辛亥运动相互关联。

西学认识论的进入决定了现代儒学的基本方向。若回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转换的时刻，胡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重哲学史，而非哲学本身。胡适首次以哲学史大纲的形式撰写一部整体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书。尽管还显得十分粗糙，但该书在方法上的转变是非常清晰的。因此，范式转换背后更为深层的含义在于，从现代开始学界以史学为中心看待哲学。唐文明教授指出，当下，我们既要高度肯定西学的意义，也要极力批评西学带来的问题。认可西学并不意味着像过去那样缺乏主体性，而批评其问题也并不意味着拒斥西学。

作为人文学科，中国哲学的诞生有其历史意义：首先在于民族概念的引入，其次是西学承担的启蒙功能。西方文明包含了对世界的深入理解，这对儒学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西学的引入也存在问题。过去，无论以什么形态叙述儒学，理论上都有政治批判功能；但在现代政治哲学化之后，由于历史观的变化，这一功能在衰落。此外，在过去，儒学讲求的是真理；而当学科范式转变为以历史学为主导时，真理就不可能再确定下来。这显示出人文学科这一体系沉不下儒学，经学必须突破，但现在也尚未有进展。

刘训练教授所关注的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对西学的系列研究，对象包括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规划、翻译和出版。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之前三十年的翻译成果还在延续，但图书的发展不存在统一规划。翻译出版是自发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并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所以，刘训练教授的研究截止到1978年。

这三十年的图书包括三大板块，分别是汉译名著、外国文学名著以及“灰皮书和黄皮书”。汉译名著是最早期的汇编，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名著也叫“三套丛书”，俗称“网格本”，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三部分。“灰皮书和黄皮书”对文革后期那代人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然而，至今还未有人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翻译这些作品的人员也是值得研究的，其中包括监狱劳改系统翻译组、新闻出版翻译组以及自由译者。中国各类机构（如外交学会、法学会等）也

都有自己的翻译机构。刘训练教授希望能将翻译的这几个板块与西学联系在一起，继续深化讨论具体问题。

张治副教授的研究对象是钱钟书。他以此作为切入点，讲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西学引入。钱钟书吸纳西学的方式是个人化而自由丰富的。同时，在国家计划经济时期，他也对西学引入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钱钟书对西学的关注从晚明开始追溯，有着十分充分的历史准备。他在《管锥篇》的序中提到，“假吾岁月，尚欲赅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纓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如果还有时间，钱钟书可能会继续用英文写一部名为《感觉·思想·观念》的书。从已有的中文《管锥编》结构来看，西学《管锥编》可能也是以大经大法的著作作为枢纽的书。

钱钟书最早关注的是感受层面，而非思想或经典文学。哲学方面，钱钟书特别关注奥古斯丁，引用率很高，且喜欢从具体地方着手。另外，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短篇小说家也十分重视——阿里奥斯托、塔索等人都将钱钟书西学管锥篇中的枢纽。

西学《管锥编》的计划虽未能成熟，然而通过手稿、书信、借书记录以及杨绛的翻译，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和影子。钱钟书曾说，“对吃不到的葡萄有时候想象它很酸很苦，有时候我们会想它可能特别的甜。”没有写成的这本书叫作《感觉·思想·观念》，这是称得上是令人遐想的题目，好像要构成一个有机体，甚至一个人。过去对钱钟书的批评有说他著作没有系统，

但也许他的著作有一个很复杂的像有机体一样的系统。

最后，李猛教授对此次论坛作总结。中国的西学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与西方接触更加深入密切，使得很多人认为可以纳入西方的学术世界和学术传统就足够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国的西学自身还是相当薄弱的，困难在于基本的文本翻译以及更好地激活思想的方式。中国越来越频繁地接触西方。但其实，与梁启超那一代相比，在驾驭西方思想能力上反而出现更多困难。整体意义上的西学在今天已经很难成立了。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翻译和整合后，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这一张力对中国传统一直有着激发的作用。通过与古文化的嫁接，翻译在这过程中消除了西方思想中对中国受众相对陌生的效果。但反过来说，西学本身较之中国文明的距离感也由此消失。从学术思想双重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里，新的西学翻译能否继续在保留这种异质性效果的同时也成为思想的一部分？这是比较大的挑战。“西学如浮萍”，浮萍应与扎根相对比，而真正能够扎根的西学应当能激发新儒学本身的活力。

(撰稿：张欢)

67

陈平原等：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论坛现场

2018年5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王风教授、吴晓东教授、贺桂梅教授、张丽华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联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季剑青研究员出席并参与讨论。

一、对话“五四”：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迄今已近百年。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中，

“五四”不仅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始终与不同时期的“当下”相互纠缠，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尤其是知识人反复回想、致意、对话与反思的对象。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五四”既是进入与体察历史的门径，也是介入与关怀“当下”的依托。在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学界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是研究“五四”最勤与阐释“五四”最力的学者之一。关于“五四”，他先后出版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与《“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两部专著，并与夏晓虹教授合编有《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等著作。新近问世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是他的第三部“五四”专著。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与陈平

原此前的相关著作不同，“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论”。在他看来，“因五四而切入当下话题，乃责无旁贷”，因为“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该书既是陈平原研究“五四”的最新思考，同时也承继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人通过阐释“五四”参与“当下”思想论争与文化建设的传统，对于总结与开掘“五四”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为何必须不断地与“五四”对话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主持。陈平原教授应邀发表了题为《为何必须不断地与五四对话》的主题引言。在引言中，陈平原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五四”研究历程。早在1982年，尚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他便发表有《论白话文运动》一文，一改学界此前讨论“五四”时大都关注其“思想革命”面向的做法，倡导从（语言/文学）“形式研究”的角度重新勘定“五四”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在此后完成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陈平原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且提出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思想与社会转型乃是出自“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的著名观点。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一书中，他通过坚实的学术史研究再度凸显了“晚清”与“五四”的辩证关系。在此之后，陈平原的主要兴趣转向教育史研究，先后完成了“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

对于北京大学与“五四”关系的考察贯穿其间。具体到“五四”研究，陈平原共计出版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与《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三部专书。

在介绍完自己的研究历程之后，陈平原集中讨论了“为何必须不断地与五四对话”的议题。在他看来，“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四”对话的过程，正是陈平原参与当代中国历史的过程。1993年，他发表了《走出五四》一文，作为对于1980年代的精神遗产的自我清理。2009年，面对学界内外日益显著的否定“五四”的时代潮流，他又发表了《走不出的“五四”》一文，予以回应。2017年，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他发表了《“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一文，主张从兼及“思想”、“文采”与“行动”的角度全面理解“五四”与光大“五四精神”。从“走出”到“走不出”，陈平原表面上“改弦更张”，不变的却是以“五四”为“试金石”观察与检验时代变迁，进而做出自家选择，并且有所担当的精神追求。

不过，在陈平原看来，在当代中国试图激活“五四传统”却殊非易事，不仅因为在“关于‘五四’的言说中，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新儒家论述以及国学热的兴起，加上大

国崛起与民族主义思潮”对此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他认为，“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所以在其学术生涯伊始，他便致力与“五四”对话，非但至今不衰，反而“愈挫愈勇”。2019年是“五四”百年，在主题引言的最后，陈平原也就此做出展望。

三、“陈氏‘五四’故事”的特征与魅力

在陈平原的引言之后，吴晓东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五四”是一个被逐渐讲述出来的“故事”，而陈平原正是当代最主要的讲述者之一。“陈(平原)氏”的“五四故事”以其兼具历史感、现实性与远景意义的品格，在中国学界独树一帜。他具体概括了“陈氏”的“五四故事”的三大特征。首先是“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所谓“长时段”，是指在陈平原的“五四”论述中包含三重大的历史视野：一是他将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既从“五四”中发现“晚清”，也在“晚清”中勾连“五四”；二是他把“五四”以来的“百年视野”同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于“五四”言说史与接受史的系统清理，彰显了“五四”的“世纪意义”；三是他以未来三五百年的视野，将“五四”定位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以及

知识人的对话原点，提出民族复兴应当从“五四”中汲取养分，而非将之排除在外。

吴晓东总结的“陈氏”的“五四故事”的第二大特征是其现实感与介入性。在他看来，在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有两位是典型的“五四式的学者”：一位是承传了鲁迅的精神遗产的钱理群教授，还有一位便是践行了章太炎与胡适的思想方案的陈平原教授，他们分别彰显了“五四”的不同面向。吴晓东认为，陈平原可谓“温和的激进派”（或者“激进的温和派”）。

“陈氏”的“五四故事”的第三大特征是其大局观念。在陈平原的“五四”阐释中，不再将“五四”与“传统”简单对立，而是借鉴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深化了对于“五四”的理解，同时把思想、学术、文化与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更为全面地把握了现代中国转型的丰富面向与内在机制。陈平原的“五四”论述既秉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立场与方法，同时又不为所限，别开新境。

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从《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的“思想操练”这一关键词入手，考察了陈平原的“五四”论述的核心关怀。她注意到，陈平原在1990年代从事学术史研究与创办《学人》集刊，旨在反对学界对于西方潮流的过度追随，希望通过接纳传统资源，为现代中国学术“正本清源”。如果说他彼时的努力目标主要在于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打破西方想象为“现代”的唯一远景的话，那么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他的追求则更为明确，即凸显“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性的正面价值，

以回应日益盛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论述。

在贺桂梅看来，陈平原的“论战”对象既包括并世的时代潮流（例如1980到1990年代的西方想象，以及2000年以来的“国学热”），更指向自己。她认为，陈平原不断调整谈论“五四”的方式，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寻求一种“知识主体”（或者“知识分子主体”）的自我定位。而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处理这一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思考“学术”与“政治”二者的复杂关系。贺桂梅指出，陈平原在1990年代强调“学术”的自律性，致力把“学术”从过度政治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却反复重提“学术”的政治性。这说明陈平原并非是在“学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谈论二者的关系问题，而是希望达成一种“学术内含政治”的积极状态。在她看来，陈平原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与鲁迅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界定十分接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怎样的自我定位，是陈平原思考的关键所在。陈平原所谓“学术”，其意涵既大于“纯学术”的意识形态，又不致于使之过度政治化。他最终找到的一种半自律性的文化政治空间，是知识分子在当下可能拥有的最理想的对于社会发挥作用的位置。而这一“知识主体”（或者“知识分子主体”）正是通过不断地谈论“五四”被建构出来的。这是陈平原的“五四”论述的最大价值。

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提出陈平原的“五四”研究因其文字明白晓畅，背后的痛苦感反而不易被人察觉。与钱理群

在著作中呈现了更多“可见”的痛苦不同，陈平原的“痛苦”通常是“不可见”的。但“中间物”的意识同样贯穿在他的思考中，其“五四”论述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联芬教授表示，反思“五四”不等于否定“五四”，陈平原19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但对于“五四”，他的情怀并无任何改变。陈平原的“五四”研究打开了“五四”的丰富意涵。杨联芬以他的《鸚鵡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一文为例，指出鲁迅与胡适都是“五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在承继与发扬时不必人为制造对立，顾此失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季剑青研究员总结陈平原的“五四”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感与现实性之间始终保持了某种张力。在陈平原的论述中，“五四”并非完全作为一个历史化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与当下构成了紧张关系。他的研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使得两者可以在“思想操练”中相互支援。

四、“五四”百年，应当如何谈论百年“五四”？

同为长期关注“五四”的北大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介绍了自己的“五四”研究的三个分支领域：一是“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尤其是儒学）的关系问题，二是“五四”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蔡元培、胡适与傅斯年），三是现代中国的“五四”话语系统。他继而梳理了“新

时期”以降大陆历次“五四”纪念的基调：1979年的纪念强调“五四”是一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思想解放运动；1989年的纪念在延续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更为凸显“五四”具有的建设性一面；1999年的纪念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为主调，侧重讨论“五四”的历史影响，而对于“五四”的多元化认识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2009年，学界已经无法就“五四”的评价问题达成一致，“五四”纪念也转而进入各个具体的专业领域中进行，例如该年陈平原教授在北大中文系主持召开了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型学术会议，而北大历史系则举行了题为“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的学术会议；2015年，学界纪念了《新青年》百年，2017年，学界又纪念了“新文化运动”百年，但与此前的“五四”纪念相比，如是纪念并未提出太多新的议题。欧阳哲生在发言的最后表示，期待年轻一代学人可以在“五四”百年纪念时做出与前人不同的论述，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考方向。

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指出，“五四”是一个层累造成的“历史神话”，当对其做出评价时，有必要首先反思“五四”是否真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在他看来，“五四”固然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但更是知识分子群体最辉煌的历史时刻，所以知识分子讨论“五四”难免会不自觉地夸大其意义或者进行过度的自我投射，这是值得警惕的。

关于“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提出，在通常的认识以

外，应当特别关注两点：一是理解“五四”的关键是理解其中的“危机意识”。“五四文学”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文学”。“新文学”在与其时的通俗文学的竞争中得以胜出，原因即是其更能击中危机环境中的现实感觉。而当下理解“新文学”的困难便在于“危机意识”的消退。危机感不仅是“五四文学”的核心所在，而且也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学界以往多以“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文学”相比附，但如果从“危机意识”的贯穿与展开的角度来看，1950到1970年代的文学反而与“五四文学”具有更深层次的关联。同时，从危机感出发，也可以更好地考察“五四”式的启蒙方案的复杂意涵，即不是一个从启蒙者到被启蒙者的简单过程，而是一种涟漪式的运动。正是这一运动方式，使得“危机意识”转化成为了“社会改造”的有效力量。

此外，在程凯看来，“五四”的本质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大“母体”。他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是一个以“文化革命”为根基追求“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过程，其中“政治革命”的深度通常与“文化革命”的实现程度相呼应。几乎所有在现代中国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力量都遵循这一逻辑。程凯认为，只有充分理解“危机意识”与“文化革命”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五四”。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提出，在讨论“五四”时，学界的职责应当是对于“五四”究竟是什么做出尽可能充分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论述，“五四”在当下已经

高度经典化，而经典化的另外一面就是符号化。在他看来，已经高度符号化的“五四”其实在很多方面距离“五四”本身相去甚远，有的“五四”论述甚至与“五四”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丽华副教授将“五四”比喻为一个尚未闭合的“文本”，提出在研究“五四”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五四”的历史定位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迅速自我经典化相关，二是考察“五四”必须考虑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她认为，“五四新文化人”的自我经典化并非研究的前提，而恰是应当反思的对象。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文中对于胡适《尝试集》的经典化过程的讨论，便是此类研究的典范同时，张丽华表示研究“五四”不仅是为了“触摸历史”，还需要有一种与历史“搏斗”的精神，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然。

五、在与“五四”对话中确立一代学者工作的意义

论坛最后，陈平原教授做出回应与总结。他表示，“五四”是一个既比较空洞，又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话题。一代又一代学人之所以不断谈论“五四”，乃是因为有“压在纸背的心情”存焉。他认为，人文学者在从事专业研究之外，一定要具备介入更大议题讨论的能力，如果一个学科长期不与外部世界对话，其萎缩便不可避免。“学术”的意义应当是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而一代学者必须在与历史和当下的对话过程中才能最终确立自己工作的意

义。作为人文学者，其价值不应当完全系于发现了新材料，或者填补了某项研究史上的空白，而应当在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的方面认真做出贡献。

在陈平原看来，“学以救弊”是学者的使命所在。无论是在1990年代倡导“学术规范”，还是在2000年以后主张“思想操练”，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言都有其现实针对性。他回忆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出版以后，有台湾学者批评此书的专业性不够，但多位大陆学人读后却十分感动。陈平原认为，这一接受的差异源自该书触及了当时大陆一代学人共同的困惑、挣扎与追求，而由于语境不同，台湾学者对此是比较隔膜的。

陈平原表示，现在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1980年代的选择，还是学界1990年代的努力，其间都不乏偏颇，甚至“误判”。因为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很多时候都是“饥不择食”的。年轻一代应当以“后见之明”为标准，反思当初走过的道路存在何种局限，但也应当理解当初选择与追求的针对性何在。他期待年轻一代可以做出与前人不同的“五四”论述，并在与“五四”对话的“思想操练”中实现自我成长。

(撰稿：李浴洋)

68

叶启政等：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2018年5月26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作引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副教授王楠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渠敬东教授归纳了叶启政教授最近出版的《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本书反映了叶启政教授对于社会学及相近学科当今形态及未来发展的责任感。渠敬东教授提到，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着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体制，且这一体制已经彻底进入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领域。这意味着，我们的思维、研究与方法同时代整体的体制密切相关，学术发展的完全技术化会对国家和文明自身的延续与未来产生重要的作用。

渠敬东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者的话题可以从单纯的研究思维、方法与策略向着它形成和发育的历史回归，并由此关照整个世界的生产体系。在重新回到西方锻



叶启政教授

造现代世界图景的同时，探究当时对社会构成的理解及其内在思维和图景结构与今天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次论坛所探讨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议题，还包括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景及其与学者之间的知识的关系。

随后，叶启政教授分享了自己有关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观点。他强调量化的意义，并认为关键点在于“诠释”意义的方式。同时，叶启政教授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态度，而非衍生出来的一种特定的技术。假如我们接受“知识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前提，那么，既然是社会的产物，知识就都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特质，并享有社会连接起来的对世界或对人的一种感知的特殊模式。换言之，任何的知识（包含科学知识）背后都有一定的所谓哲学人类学的预设，

也都会有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这些东西不是不可批驳的。我们可以对知识建构背后的基本预设进行追问，若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反思的能力。

以《实证的迷思》一书为例，叶启政教授表示，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回头检验美国社会学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成为今天这般模样的。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定量的研究。当理性化逐渐压缩纤细型思维的空间，几何型思维成为唯一的教条。自然科学同数学结合，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典范，并将计量应用到了对人的研究当中。叶启政教授也在书中阐释了十九世纪以后的统计学发展、“均值人”（average man）出现的历史背景。

在介绍书中有关统计学发展历程的内容时，叶启政教授再次强调，统计学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以参数统计中平均值的使用为例，这一概念在各时期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每个测量的单位也在人类世界中各自表示着特殊的意义与性质。他援引统计学家的观点，表示“统计是处理误差的艺术”。在对智力等与人相关的因素进行测量时，重点不在于人种的优越与否，而在于概念与测量的比例以及如何二者之间连接。研究者应当关注并思考基础测量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理解定量背后西方哲学人性与历史提供的预设。

叶启政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定量研究过程中的思考极为重要，也是构成所谓学术良知的最核心部分。人们应当理解其中的局限性，并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表达真理的唯一方法。学界应当警惕西方逻辑对现代知识的决定作用，在做学问时

保持谦虚的态度，明确自己的极限，否则将产生“暴君型的作为”。而在定性研究的领域，理论思考同样有其局限性。叶启政教授表示，世界是多元的，社会也存在不同角度的多种面向，没有一个侧面能代表“最后的真理”。他强调自己对定量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反对把特定的科学观当成准宗教的无上律令，替代上帝宣言真理。

接下来，周飞舟教授也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他引述了叶启政教授在书中表述的观点，认为统计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哲学，是在对人的假定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周飞舟教授以“法身”、“法相”举例，表示好的量化研究不是纯粹靠量化技术做出来的——量化研究不是一个自洽或自足的研究。如要很好地完成样本选取这一关键步骤，其先决条件就在于对样本总体有非常充分的了解。此外，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总体的方差也是决定抽样的关键因素，但做社会研究的主体还是人。好的量化研究首先需要作者洞察两个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再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证明，而非通过数据发现关系。

周飞舟教授进一步解释了量化研究与田野的关联。他认为，应当把量化研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技术；另一部分虽未在文章中呈现，却是关键且无法为人工智能所代替的。量化研究无法自足的原因就在于洞察力无法通过统计技术得到——洞察主要依靠理论和田野。周飞舟教授表示，尽管统计和数据收集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学很多的洞察力还是来自田野，而离开田野则会“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如叶启政教授所说，田野中面对的不是“一些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活生生具体的人”。数据或田野研究的目的都是增加自己对社会的洞察能力。社会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省的过程，一个反思的过程。

应星教授则从另一侧面回应了讨论的主旨。他首先分享了对《实证的迷思》一书的感受，归纳了叶启政教授所表述的关于知识社会学分析的观点。应星教授指出，现在的社会学教育缺少对理论训练与方法论的学习，对这些学术工具所具有的力量和局限性也缺乏充分的理解。叶启政教授的著作从技术视角追溯到哲学层面，讨论了统计学中的“偶然”放置在现代科学或现代社会位置中的方式问题。学者不应做西方的追随者，但也不能简单地抛开，而应更深地进入西方、挖掘其根本，才有能力回头面对本土文化与田野。

侯旭东教授从历史学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理解。联系自身教学指导经历并与叶启政教授的著作对照之后，侯旭东教授表示，在历史中运用统计学的研究具有一定困难性，一些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把握。叶启政教授曾在书中对“均值人”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侯旭东教授认为，以统计学的方式研究并理解古今中国，需要思考“均值人”假设是否适用，且应思考不同时期、体制与位置上的“人”应被如何度量。

李猛教授同样援引书中的论述，分析了不同倾向的统计方式背后的社会概念。他表示，叶启政教授二十多年前的授课改变了他对社会理论工作方式的理解决。整个大数法则和常态分布曲线以及对均值和方

差的理解，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大众社会的特点，而这样一个社会应该具有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部分人相当重视体现在离散度上的、个人偏离或者并不完全等同于常态的形式。这要求构成社会的基本不应是等级制，不应存在人和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与古代人伦社会的强烈差异性、偏私性，也不应被明确具体的社会集团所阻断。

李猛教授指出，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新生特征，而非长期的稳定状态——这将给长期统计分析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叶启政教授的分析很好地揭示了由“均值人”个体构成的社会，具体内容包括怎样理解现代社会中建立的个人以及社会形态背后的政治构成过程，而这些正是社会学形态上体现出来的面貌。李猛教授强调，叶启政教授不仅警示我们提防统计背后过于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的理解，更通过对统计进行反省，让我们认识到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何种样态。统计概念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理解的方式，统计学本身也是这个社会最应探究的真相。

刘云杉教授则从教育的角度进行探究。她认为，实证主义不仅是方法论，也是社会对知识范式的塑造和选择，同时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均值人”、常态分布等要素既左右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又设计着我们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在中国教育政策的情境中，除了培育功能，还有筛选功能。现代社会的教育已不再高居象牙塔，还担任着人才分类、教育筛选的作用，同时是欲望再生产的核心机制。刘云杉教

授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观点：二十世纪的
社会驯服的是生产者，二十一世纪培养的是
消费者。

刘云杉教授对当代中国的教育状况进
行具体分析。她认为，“教育已经不再是
教育”，而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
一方面追逐着稀缺昂贵的教育符号，另一
方面又在舆论上排斥着教育。教育公平由
此成为非常复杂的内涵的诉求：行政权力
在回应复杂诉求的过程中，以减负回避筛
选，又以均衡来延缓筛选。但她仍旧相信
现代教育“师道传承”的因素，并表示人
们依旧能在其中挖掘人性和理性的光芒。

接下来，王楠副教授围绕社会科学的
传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美国
社会科学呈现科学主义的趋势，其十九世
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变化也和我们今天的处
境有类似之处。社会学在美国社会科学当
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美国兴起时恰处在社

会大规模扩张和动态变迁的过程之中。社
会学家尝试着突破传统的宗教、政治以及
经济学的框架，去寻找一个理解社会发展
和再组织化的方式，以期对大规模社会的
组织秩序、个人道德和自律意识的实现提
供说明。王楠副教授表示，一个文明或社
会急于走向世界、进行扩张的行为可能源
于自我的迷失与遗忘。

论坛最后，叶启政教授再次归纳了《实
证的迷思》一书中的部分理论要点，阐述
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的定位，
并重新审视“机遇能不能驯化”的统计学
问题。叶启政教授认为，当代非西方社会（特
别是中国）应当承担起文明古国应有的使
命与责任，在学术乃至文化领域面向世界，
并对西方提出带有批判性的理解。

（撰稿：陈洁樱）

69

严志斌等：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

2018年5月27日上午，“北大
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
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
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文研院访
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严志斌主持。淮北师范大学教授雒
有仓、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研究员王长丰、南开大学教授陈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
源、吉林大学教授何景成、北京大

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曹大志、郑州大学副
教授部向平、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国辉
等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族徽”展开。严
志斌研究员在引言中提到，族徽又称族氏
铭文，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自宋代以降千余年来，对族徽的性质、构成、
类别及其相互关系、迁移流动、兴衰变化，
以及由此构建的商周家族、社会形态的研
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学者的
认识还有分别，甚至在族徽的性质问题上
还有严重的分歧。

论坛伊始，王长丰研究员首先以“殷
周金文族徽内涵的研究”为题进行发言，
主要内容包括：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概况、
殷周金文族徽的汉字表述原则、殷周金文
族徽的类型、基本族徽以及盟姻族徽。他
认为族徽铭文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本
族徽，二是盟姻族徽。基本族徽就是单
一方国（族、氏）使用的基本型的徽记形
式；盟姻族徽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
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本
质上是由基本族徽家族通过“同轨”、“
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
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血亲
组织。王长丰研究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
对族徽有一定的了解，但很多细节仍有
待发掘，我们将秉持开放的态度和心态，
接受不同的、合理的观点和看法。

随后，刘源研究员以
“从赐贝到册命”为题发

言。刘源研究员认为，西周早期受殷文化
影响较大。从殷王朝文化制度的特点来看，
在政治运作方面赐贝最为明显，金文里面
记录为赏贝，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机制，
是巩固上下级之间的政治纽带；职官特色
方面，作册、小臣较为典型，还有寢；社
会结构方面，子和小子的关系非常突出，
小子和王的关系比较疏远，子是王和小子
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群体；在家族定义方
面，族徽是重要代表。总体来说，西周早
期继承了殷代的赐贝政治机制，但发生了
些许变化。西周的赐贝（特别是从王的赐
贝来看），与内外服是相匹配的，西周赐
贝开始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贝以外的具体
东西，如车马、臣、田等——这点值得我
们重视。西周中期册命制度确立，册命取
代了赐贝。虽然西周王朝受到殷文化的影
响，但依然显示出了自身的特点。

曹大志研究员接下来发言。曹大志研
究员首先指出，在以往对族徽的认识上，
第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看法是郭沫若提出
的图腾说。在这之后，最有影响的观点是



严志斌教授

族氏铭文说。关于族氏铭文的解释体系，曹大志研究员提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复合族徽的问题。现在对复合族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族氏联合说，一般指族和族之间结盟或者通婚。但是很多学者指出两个家族无论是结盟还是通婚，结果都是两个家族，所以支持联合说的学者并不多。另一个解释是新族从旧族分出来的时候，会把其母族写新族名的前面。但在实际中，我们往往无法知道分化的过程。其次是作器者的问题。家族集体，家族共财，所以他们共同作器。西周时期文献记载是家族共财，但绝大部分是以贵族与个人名义做的。第三个问题是族徽只代表个人的身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所以墓葬不一定出现在一起。如果一个贵族家族中有多人担任不同的官，我们会在同一个墓地发现超过一种族徽。所以，曹大志研究员认为，所谓的族徽其实是亲称与职官名号。

针对曹大志的职官名号说，雒有仓教授以“金文族徽的内涵变化及时代性质”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族徽的内涵，雒有仓教授认为，“早期金文不等于族徽”。早期金文包括族徽、日名、亲属称谓等，其中，族徽是表示族氏名号的文字，它与日名、亲属称谓等非族徽文字的性质不同。其次，讨论金文族徽的内涵，应充分考虑族徽来源的复杂性，明确“族徽来源不等于族徽内涵”概念，不能用一种来源的族徽去解释另一种来源的族徽，更不能用部分族徽的来源去解释全体族徽的内涵。雒有仓教授表示，金文族徽的性质，更准确地说，应该为族氏名号。“号”有徽号、代号的意思，其实质体现的不仅是血缘关

系，同时体现着一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雒有仓教授指出，正确认识金文族徽的内涵、性质，需要深入研究金文族徽的功能、作用及其变化。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族徽与早期铭文的关系，二是族徽与非族徽文字的区别，三是如何正确对待部分族徽与全体族徽的关系，四是如何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认识金文族徽的有关问题。

之后，陈絜教授发言。他认为，对于复合族氏铭文的含义讨论应当使用减法，要明白族氏铭文中的每个字体现着怎样的含义，发挥着何种功能，尤其对其中的职官、职业与地名用字的功能要认真梳理。陈絜教授认为，在判断职衔称谓之前，首先要解决商朝的国家形态和家族形态，不然就无法解释清楚。另外，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到具体的墓地、铭文和材料背景里去理解，并且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等去理解。陈絜教授以商周鱼族等为例对复合族氏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此外，陈絜教授对于如何认识族氏铭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一，尽量利用出土地明确器物 and 同时代的甲骨资料；第二，对文字的释读和对短篇铭文的理解都需要加强；第三，合理利用商周地理研究成果；第四，还应继续聚落形态的研究。

下午的论坛会上，郜向平副教授首先根据自己的研究做有关“商文化墓地形态与族氏铭文问题”的陈述。他表示，对氏族铭文的研究应该经常与晚商墓地研究相互参证，但晚商墓地的形态仍存在问题。目前所能见到的先商文化时期的墓群地很少：鹤壁刘庄的墓地规模比较大，墓地整

体排列比较规律，且延续时间至少为150年。这表明此墓地有一个大型的亲缘组织关系存在，并实施了强有力的规划和控制。而在洹北商城时期，墓地呈现出规模有所增大和东西向墓葬增多的趋势。到晚商时期，殷墟墓地的布局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墓群的墓向和随葬品都比较一致，墓葬排列比较有规律，但整体布局杂乱，异于先商墓地。这些墓群内部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墓群之间很难确定是否有亲缘关系。另一种墓向比较杂乱。郜向平副教授表示，如果这是居葬合一的情况，则难以有整体的规划。他进而解释，这可能是“族邑布局”的发展模式所致。最后，郜向平副教授将商墓的发展过程做如下概括：在先商时期，可能存在着大型亲缘群体的凝聚力和控力，是当时主要的社会单位。到了早商时期，大的亲缘群体解散为小的亲缘群体，相对松散地聚集在同一个聚落内部。到了晚商时期，一方面小的亲缘群体给进一步整合；另一方面，等级较高的某些亲缘群体在新的基础上扩张了其规模。郜向平副教授最后谈到，就族氏铭文而言，虽然很多殷墟墓地的材料和族氏铭文相互印证，但彼此之间的契合度并不高。其中，有些墓地的排列过于杂乱，葬俗差异较大，可能存在非亲缘性墓地。他继而指出，当时的地缘组织和官僚系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

何景成教授以《关于“族徽”性质的一些看法》为题做报告。他认为，早期铜器铭文（主要分布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数量庞大、内涵丰富、性质复杂。目前有很多关于“族徽”性质的讨论，但各种意见

差异很大，任何只尝试用某一种理论或解释模式来说明铭文性质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何景成教授首先讨论了“族”和“徽”的概念。他指出，目前学界关于“徽”有了统一的认识，即这类铭文基本上都是文字。而“族”即家族，是一个血缘集团。血缘集团一般都有一个外在的标识符号，以此作为本组的标志，区别于其他血缘集团。之后，何景成教授讨论了在早期金文里“族徽”被用来标示血缘家族集团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族徽还是族氏铭文，首先强调的都是“族”这一概念。在周代，表示血缘集团的符号主要是姓和氏。但由于“族徽”铭文本身信息含量少，加之大部分非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丧失了其原生和共生背景信息。

因此，讨论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从一些信息较为丰富的典型材料入手，奠定问题讨论的支点。而在有关“族徽”的资料中，微氏家族铜器窖藏是一个很难得的典型资料群。何景成教授指出，早期金文中有一些文字，从其出土情况和器物年代跨度来看，可以认定其作为某一家族的代表符号的。这表明，这类铭文是作为家族的标识来用的。虽然其含义或商人何采用改文字作为自己家族标识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改变该类铭文作为家族标识的性质。标志家族区别符号的文字是可以称为族氏的。何景成表示，缀有所谓“族徽”符号的铜器，其器主往往是同一家族不同世系贵族，或是父子关系，或是兄弟关系，或属于同一氏称。这些情况表明，这类符号是作为家族标识使用的，可以视作氏族符号。在此

基础上，何景成教授继续讨论了这些铭文所反映的作器者的亲称或职称与族徽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在商代有铭铜器所反映的作器者亲称主要有“妇”“小子”“乃孙”三种称谓，但亲称和族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他认为作器者的官职和铭文后所缀的符号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黄国辉副教授就“试说族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一主题陈述了自己的研究。他首先界定了“族徽”的概念。他指出，学界对商周族徽有很多称谓，主要考虑的是族徽的文字特征和内涵特征。而族徽不完全等同于氏名，即有些族徽仅仅是家族的徽号，它们可以代表这个家族，却又不能等同于家族的氏名，族徽和氏名之间不必然是同一的。他赞成“族徽”和“复合族徽”这个概念，而不采用“族氏铭文”或者“复合氏名”的概念。他认为，“复合族徽”代表一个器物中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氏铭文，指称对象应该是同一宗族。在对关于复合族徽的研究的“族氏分化说”、“族氏联合说”、“族氏从属和联合说”、“族氏友好说”和“亲属职衔并用说”五种说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黄国辉副教授认为，复合族徽反映的是不同族徽氏族之间的同宗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可能是分化的，也有可能是联合的，但脱离血缘关系的复合族徽是不存在的。此外，他还指出，目前有两种标准来衡量复合族徽。第一种是以字数为标准，即复合族徽是超过两个字以上的；而第二种是以族徽的数量为标准，即代表一个氏族徽号的数量标准。黄国辉副教授表示，自己更倾向于第二种标准。对于商周族徽的判

定和研究，黄国徽副教授则强调，我们的研究必须慎之又慎。他借用林沅先生的话说道：“轻率地用族徽去解释一切早期铜器铭文是靠不住的，要确定早期铜器铭文中哪些是族徽，必须有全部金文、甲骨文资料的综合研究为基础，并注意研究器物本身的年代以及成组的铜器群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比较近实际的判断。”

在自由讨论环节，大家继续就族徽内涵、复合族徽的形成与性质进行讨论，并就族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最后，严志斌研究员做总结，他表示，这次会议是学术界第一次以族徽为主题召开的讨论会，具有重要意义。会上各位发言人都充分表述了自己的意见与学术思想，有关族徽的共识与分歧也得到清晰的呈现，这对以后的研究与探索是有益助的。他对各位发言人精彩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族徽的研究，他认为，不应奢望以一种模式解释所有问题，应当充分考虑族内、族外的各种关系，并将族徽放回到具体的铭文、具体的铜器、具体的墓葬与墓地及相关考古与历史情境中去研究，先夯实具体族氏研究的基础。

（撰稿：卢雨枫、唐国俊）

70

郭志刚等：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

2018年5月31日晚上，“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作引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李建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郭志刚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央关于人口工作的口径变化。“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曾长期为中央文件的标准口径，然而，这一政策自2000年以后逐渐转变。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于2000年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不再沿用“稳定低生育水平”；2013年《中共中央深化改革若干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全面二孩”调整，在实际上宣告了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的废止；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未再提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一曾经的标准口径。对此，郭志刚教授表示，中央人口工作口径发生变化是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已从人口控制转向应对人口老龄化。五中全会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说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过低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过快，需从长远战略解决人口发展均衡问题。

关于我国低生育率的成因，郭志刚教



郭志刚教授

授认为，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具有直接影响。他在2000年做研究时发现，若按照独生子女政策的要求，“一孩家庭”最终将占到63.1%，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核算就是一对夫妇只生1.5个孩子。此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当前，城镇化导致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城市，育龄妇女多数已居住在城镇，同时，她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转变。流动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低于非流动妇女，且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晚婚、晚育、少育在城乡新一代中蔚然成风。

接着，郭志刚教授谈起人口统计的“怪圈”：当人口调查发现生育率低时往往归因于漏报，便想尽办法调高估计，进而继续大力严格控制，但结果却是下一次人口

调查时低生育率现象仍然存在。在他看来，这是由于大家的惯性思维和政府主导总是将低生育率理解为计划生育的功劳，而完全忽视了人们主观的生育意愿变化。陷入这个怪圈会导致研究者忽略其他因素，误判生育率和未来人口趋势，甚至贻误决策。

从人口学角度来讲，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不受现有人口结构影响，不同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不同的发展前景。郭志刚教授向大家阐述和对比了2.1、1.8、1.5、1.0几个不同的总和生育率给中国未来的人口带来的变化。这几个数字分别对应人口不增不减、每117年人口减半、每54年人口减半、人口减半越快越好。选择过低的生育率可能会将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郭志刚老师非常拥护中央的深化改革，并认为人口领域的改革顺应了人口规律和民意。

郭志刚教授又通过人口金字塔图展现和说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比例变化情况：少儿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他按照实际人口做不同生育率的预测方案，而无论选择哪种方案，老龄化的高值都将出现在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在前期增速快但绝对水平不高，到2035年以后，其增速减缓但绝对水平很高——甚至达到30%以上。虽然高生育方案前期的抚养成本比较高，但在当前增加出生人数有利于缓解本世纪中叶的严重老龄化。推迟升高生育率并不能真正回避“两头沉”的问题，而只是推迟其到来。所以，郭志刚教授建议，需尽快调整出生率、带来更多劳动力，而推迟调整时间会使“两头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郭志刚教授认为，当前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生育率水平是1.8，但在做相关研究时常看到特别低的调查结果。其实，出生率下降并不完全是因为计划生育。现在全面放开“二孩”只是补偿性的调整政策，也施有一个短期影响。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还存在，并未完全消失——“三孩”和“四孩”仍会受到罚款乃至重罚。他认为，如果很多人不想生二孩，那么有一些人生三孩和四孩没有问题。最后，郭老师对以上谈及的老龄化人口学成因做了简单的总结概括。他强调，老龄社会是全国面临的新常态，如何应对它则是举国上下面对的重大课题。

接下来，李建新教授借助不同种类的人口学图表，以超大时空观聚焦人口发展。李建新教授表示，二十世纪是人口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从数量上看，世界人口分成了二元格局：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口则保持平稳；从结构上看，老年人口在迅速增长，少年人口在迅速减少——其中，发展中国家多为人口迁出国，发达国家多为人口迁入国。

接着，李建新教授详细介绍了三次大规模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亦即传统说法上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死亡率在这一过程中是先导因素；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走向并未按照预期那样达到稳定状态，生育率下降到更低水平，人口开始萎缩并出现过度老龄化；而第三次人口转变与迁移因素有关，出现人口替代的现象。

具体谈及中国的人口历史变迁，李建新教授以总和生育率代替出生率、平均寿

命代替死亡水平构建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图。我国的人口转变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然而，在当今，我国人口内部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状趋势：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年轻一代晚婚、不婚比例增多、婚姻稳定性变得更加脆弱……我们或许将面临一个人口结构完全失衡的局面。

人口结构失衡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还会威胁社会和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影响国力的走势。对照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历史和规律，可以说，我国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前期。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生育率将在今后主导人口变化。此外，第三次人口转变的端倪也已出现——当前二线城市争抢人才的现象就是一个证明。

放眼21世纪的大国竞争，李建新教授表示，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存在有人口革命的概念，即今天的世界版图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人口扩张的版图。作为竞争对手之一，印度GDP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我国。对此，李建新教授将两国背后的人口动态结构视作解释因素之一——人口结构失衡的变化不利于我国的复兴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以往观念总是将人口当作负担，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回人的价值上，做到还权于民、自主生育。国家政策的战略调整一定要遵循人口规律，这样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承载体。除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明发展、生态发展、政治发展，我们不能忽视人口发展的重要性。

随后，冯文猛研究员陈述了自己的看

法。2012年，政府在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生育政策三步走的建议，即第一步放开“二孩”、第二步全面放开、第三步鼓励生育。实际上，生育政策路径变化的背后体现了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近年来，老龄化热度不断攀升，无论研究界、政府还是企业界都在密切关注老龄化和整个社会变迁的潜在影响。

冯文猛研究员补充说明了我国老龄化的整体状况。去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4个亿，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超3亿，到2053年约达到5亿。整个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无法回避，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基数大。现在，我们正处于应对老龄化的窗口期。

关于养老服务和保障方面，冯文猛研究员表示，目前致力于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理论上讲，90%老人在家养老，6%-7%老人依托社区提供支持，3-4%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目前机构养老方式占比只有1-2%，养老院是老年人现在生活的最后一个依托。而居家养老离不开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当前，城市的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驿站组织有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相较之下，农村老人的生活略显传统、单调。

冯文猛研究员表示，老龄化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经济层面，劳动人口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在上升，相关生产方式和劳动技术需要变化，适老化的劳动条件会得到改观；同时，老龄产业于近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层面，家庭规模相对缩小，年轻一代供给降低，而这将给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带来挑战。医疗方

面，中国已从传染病为主转变为慢性病为主——后者主要群体是老年人。老龄化使得整个社会的慢性病个体在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将来的医疗服务模式需要改变，医疗体制应以现有的以大医院和治疗为核心调整为以预防和康复管理为核心。在比较我国近年政策和国际经验后，冯文猛研究员认为，我们在应对老龄化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构建为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要提供服务保障；第二个阶段需重新认识老年人的定义，努力将这一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开发并利用起来。

冯文猛研究员简单介绍了国内近年来为养老事业所做的诸多方面努力。第一，在经济方面推动养老金改革，初步建立起养老保障体系；但养老金标准仍有待提升，针对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在向全国统筹方向继续努力。第二，尝试进行老年照料护理的专业培训。第三，城市规划和适老化改造提上日程，同2012年相比，我国养老产业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未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第四，情感和社会融入也是未来讨论老年人群体的重要主题。第五，大多数老年人可基本自理，无法克服的问题主要在于医疗，而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助于实现医养结合，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结合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冯文猛研究员分享了几点自己的看法。日、韩两国的人口发展惯性教训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婚育观念和养老观念已经随着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转变，企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问题需要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国于今年年初公布的生育数据出现了出生数和出生率双降的现象，“二孩”的增加并没有抵过一孩比例的迅速下降效应；不可只着眼于生育率，还需兼顾开发老年资本和建设养老保障。其次，部分欧洲国家削减福利的现象警示着我们，设计养老金福利体制时必须考虑后续的可持续性。另外，英国于近期合并了医疗与养老照料这两个部门，或可为我国医养结合提供一种借鉴思路与范式。

陆杰华教授阐述了自己关于老龄化形势的判断。他表示，我们在如今面临的重大问题其实不是2.4亿老年人本身，而是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2000—2020年属于“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状态；2020—2035年面临“慢备快老”的问题；2035—2050年则变为“富而过老”。我国的老龄化状况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可逆转；我国的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和城乡倒置的特殊情况，不可复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回到“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的主题，陆杰华教授认为，老龄化成为一个新形态，这就需要有新的国策去应对。我们面临着六大矛盾。其一是老龄化加速的新格局。虽然中央形成了基本理念，但还未在宏观视野上解决未来的问题。其二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养老机构和养老驿站纷纷落成，却缺乏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北京市的养老院基本建设在六环以外，而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在核心区；实际上，老年人需要在“床边、身边、周边”这种熟

悉的环境下养老。其三是各个地区及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养老服务体系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不是上海、北京等发达大城市，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城市地区。其四，人口抚养结构转型的嬗变与其代际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对此，陆杰华教授并不认为“二孩”能够真正改变我国的抚养比问题。其五，在老龄化进程中，家庭养老的责任与家庭功能逐渐弱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家庭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是因为政府在当前难以兜底；独居空巢和老年人被边缘化则是一系列延伸的问题。最后就是老年群体管理的现实需求与其社会治理模型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随着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我国或需成立老龄工作部，以使得老龄工作开展得更有序。

陆杰华教授解释说，这二十年来，我们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未来十五年则是“慢备快老”的新时代，紧随其后还有“富而过老”的时代。谈及老龄化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应注意情感因素不能依靠智能解决。关于老龄事业的规划，陆杰华教授表示，我们既要有超前性和整体性视角，还要从被动性适应转变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并不是一件坏事，其背后意味着寿命延长和社会经济进步。我们要换一种思维看待老龄化问题，更多地关注地区和城乡的不平衡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处理好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并牢记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提问环节，郭志刚教授就生育激励政

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其在我国推行还有一段距离，目前，“三孩”属于超生范围。他还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需在理清人口数量和老龄化之间认清哪个是主要矛盾。当前，需尽快实现自主生育，要将生育权利还给老百姓。

关于国家对养老的责任问题，冯文猛研究员表示，不能简单地划分养老的第一责任，而需分清定位人群。国家的主要负责是兜底那些无法自理、无人照料的老年群体；较健康的老年人养老，应更倾向于发挥家庭的作用。在他看来，当前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教育功能，因而通过照顾孙子获取养老权并不可行。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养孙防老可同时实现照顾小孩和调节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双重作用。

关于农村未来和农村养老，冯文猛研究员表示，城镇化意味着在将来会有更多人从农村走向城镇，其中以青壮年为主。农村老龄化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且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也出现一些新现象，即部分老人出于照顾孙代的需要随子女定居城市。完全依靠机构养老无法解决农村老龄化加剧的问题，互助组织可能是农村老年群体内部实现互相支持的办法；对于政府来说，公共医疗护理机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提升农村养老金水平也有利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陆杰华教授则未能保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城镇化和迁移流动还在持续进行，虽然老年人可随子女落户，但医保和心理归属感仍得不到保障。未来，农村老年人的空巢化、独居、被边缘化等问题需要得到特殊关注。

李建新教授在回答“用好老年人”的问题时谈到，现在提倡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都是乐观态度的产物。关于引进国外劳动力的提问，郭志刚教授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潜在风险非常大。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真正需要的是引进高端人才。关于日企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护理人员培训主体这一现象，冯文猛研究员表示，日企向中国输出培训和中国的自主培训是并行存在的。相较而言，日本的培训体系更为完善，但有些内容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对于老年职工的退休是否会影响子代的生育意愿，郭志刚教授直言，任何一个政策都有两面性：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

至于此举对年轻一代的生育率是否会产生影响尚缺乏真实依据。

最后，陆杰华教授做出总结。他认为，从微观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人是第一位的。因此，“存人”比存钱更重要。今天，我们关注老年人不仅是关注现代的老年人，也是关注当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变老的时候，社会该怎样去应对。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个伟人，但时间一定会成就一个老人。每个人都会老去，这个话题需要更多人思考，也需要国家、社会、个体拿出具体对策去应对。

(撰稿：王馨雨)

71

叶炜、孙正军等：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

2018年6月2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担任召集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就实大学等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出席并

参与讨论。

叶炜教授首先感谢各位学者在繁忙的答辩季来参加本次论坛，并简要说明了论坛旨趣。他介绍说，“族群凝聚和国家秩序”其实是文研院成立时就已经准备在历史学领域进行讨论的一个题目，曾经也组织过相关的一些活动，本次论坛是以往讨论的延续。族群和国家这两个概念是这次讨论的核心概念，它们既是古代客观存在也是

今天观察古代的重要视角。关于历史上族群和国家的研究特别丰富，本次论坛的主题其实是希望能够把相关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要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加以讨论。除了二者关系之外，还可能存在一个文化的问题，也是这个课题的应有之意。希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从而能够获得一些互相的激发。

论坛根据议题分为三场进行讨论。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担任与谈人。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勇研究员以《“帝之十姓”与道武帝时期拓跋本部的形成》为题作报告。陈勇研究员介绍说，这一研究产生于读《魏书·序纪》产生的疑惑，史书中“帝之十姓”以献帝邻（与邻）为本源，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各类传世及出土文献，对于九姓的世系传承，却是语焉不详，与神元一系代代相袭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据此提出一个假说，《魏书·序纪》关于拓跋早期历史的叙述是一项构建。陈勇研究员认为，北魏道武帝建国过程中再造了拓跋与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该叙述框架的关键节点以及各个段落反映的是现实的政局变化和族群分合。随着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道武帝为加强该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主动扩大拓跋及鲜卑认同的范围，将众多族群的祖先纳入本部的帝王事迹，

同时为了协调各族群不同的历史记忆，避免各家发生冲突，又将拓跋部历史一再拉长，最终形成了北朝正史中的局面。这说明征服王朝历史延伸的长度有时是由其族群拓展的宽度所决定，拓跋鲜卑构建了其庞杂的历史脉络，对于王朝时代入主中原的北族人群具有某种示范的作用。

评议人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佐川英治教授指出，陈勇研究员讨论了族群凝聚怎样进行和国家秩序如何形成的问题，与论坛主题十分贴合。他认为，陈勇研究员的报告提示了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北魏皇室是什么时候开始独享拓跋姓氏，这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又比如，陈勇老师指出“帝之十姓”是为了特定政治目的的创造，很有启发性。不过，对于其他姓氏为何愿意进入这个共同体，陈勇老师的文章对长孙氏之外的姓氏探讨较少，如果再补充一些会使研究更为完整。陈勇研究员对此回应说，努力想找到“帝之十姓”的缘由的时候会发现材料少得几乎很难下笔，这是选择长孙氏切入和作为重点的原因。他还提



论坛现场

出，受佐川老师启发，没在“帝之十姓”之内而被《官氏志》列入其他类别的姓氏，很有可能是曾经进入四十九姓的姓氏，以此为线索扩大视野，或许可以有所发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在讨论中指出，陈勇研究员的研究有几点特别重要的提示：第一，认为早期拓跋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政治结构，虽然细部的讨论还可以继续进行，但这是一个新的理解，今后会成为北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第二，西郊与南郊的并存，这是此前研究者所没有重视的，陈老师提出并存的南郊是后来南郊的起点，由此发现了北魏历史的连续性，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断裂的意义。

最后，陈勇研究员补充了两点：第一，崔浩之狱主要罪名是在国史撰写中把北魏早期不堪的历史揭示出来，但是口口相传的历史并不能延伸几代，那么道武帝时期应该形成了一个文本，这可能是崔浩国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裔对不堪的历史不能接受，虽然可以不采纳，但也不好改动，因此只要道武帝在文本中编造了一个祖先世系，后来者就很难再做改动。第二，拓跋祖先历史延伸这么长是有问题的，其中最可疑的是《序记》帝王世系中硬生生加入的六十七世，他认为这与孝文帝时期百世观念的产生有关系。

第二位做报告的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佐川英治教授，他的题目是《北魏道武帝的“部族解散”与高车部族的羁縻政策》。佐川英治教授首先对《魏书·高车传》关于高车“得别为部落”的记载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主要是为了显示高车既接受支配，又在解散对象外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北

魏与高车的邂逅始于高车部族对北魏北边的侵犯，因而道武帝初期对高车的态度与其他部族并无二致，亦是试图征服之。但是，随着柔然的勃兴，道武帝在天兴五、六年左右或相近时期制定了对高车部族的怀柔政策，即“得别为部落”，借此拉拢高车部族协助北魏对抗柔然。其后，佐川教授又对“得别为部落”的具体实态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护高车中郎将是通过部落大人进行统帅，而非直接支配部众，而这也是“附国高车”的实际意义。佐川教授最后总结说，道武帝时期北魏部族政策开始分为三种：一是在中央集权支配下维持部落形态，二是解体部落，编入郡县，三是采用更加松散的部落联合方式，“附国高车”就是第三种。而在设置六镇的时候，大多数采纳第三种形式的高车部族与曾受柔然支配的东部高车一同被编入六镇，体现了太武帝对六镇的羁縻政策。

在评议环节，陈勇研究员认为佐川教授把六镇与北魏离散部落问题结合起来，这将以往关于六镇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他说，佐川教授提示以往日本学者对北魏离散部落之后长期维持部落与郡县并存共治局面讨论较多，这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很有启发意义。陈勇老师还提出，佐川教授论证的一个关键是六镇由大量高车人群充实，但是从材料来看，六镇之乱起兵以后呈现的却是更为复杂的人群，如果说高车是进入六镇的主体，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的经过改造的高车的六镇人群，是不是当时至少一定程度上有受鲜卑影响很大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这个人群是否一成不变也值得怀疑。

罗新教授表示佐川教授论及的许多问题他也在思考。他认为，解散部落是为了打散原有的政治构造，从而纳入新的政治构造。而高车“得别为部落”并不意味着保持原有的构造，只是让它区别于其他群体，但一定会将之打散。罗新教授还提出，高车虽然在历史上经常被提到，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政治架构。因此，北魏对高车的政策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笼统讨论可能存在危险。对于北魏来说，凡是放在六镇的人群其实都是征服的结果，因为不好管理，所以要别为部落，但是这并不是放任不管。最后，罗新教授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附国应该是被收买的漠北的高车，而非高车的全部，可能它本身就在北魏有效控制之外。

第一场讨论的最后，与谈人叶炜教授对整场报告和讨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北魏早期历史记载很少，两位报告人都从历史整体脉络出发来对北魏早期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力图获得“通解”，特别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第二场讨论的主持人和与谈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子凡副研究员首先发表了题为《“胡运将终”与“中国有圣”——唐玄宗初年的胡运观及边疆秩序重构》的报告。他从唐玄宗初年出现的胡运观入手，探索开元初年“胡运将终”与“中国有圣”理念产生的背景及其政治意义，并将这一理念与唐玄宗时期北部边疆秩序的重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刘子凡

副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唐玄宗初年的胡运观还是边疆秩序的重构，都是其积极边疆政策的投影。唐玄宗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雄心与突厥默啜败亡的时局相合，就产生了“胡运将终”和“中国有圣”的观念，配合其积极的政策，最终军事布局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内轻外重，军事和财富都向边疆聚集，导向了军镇体制下边疆秩序的建立。他进一步指出，经过持续的经营，唐玄宗在边疆几乎达到了全胜，不仅突厥再难对北方构成重大威胁，唐朝在西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导致唐朝国势转变的安史之乱，虽然有极为复杂的背景，但却也是直接产生于边疆。新的秩序也蕴含着新的危机。

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付马博士对报告中提到的胡运观的频繁出现是玄宗政治抱负的一个反映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认为作者的这一观察非常精彩。同时他还提示，敦煌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也提到胡运观，这种民间的观念是否与报告中提到的唐玄宗的胡运观有联系，可以进一步考察。付马博士认为唐玄宗的边疆政策是相对保守的实践，唐玄宗增设节度使（军镇化）是为了防御边疆依附民族，而非为了进攻突厥。对于军镇化影响了唐朝边疆秩序的观点，付马博士表示认同。但他也指出，文章中用西州文书来讨论营州存在一定危险，因为西州有稳定的汉人社会，而营州则主要是胡人。刘子凡副研究员对付马博士的评议表示感谢，指出付马博士的视野非常开阔，两人的观点虽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意识到唐玄宗时期强化了对边疆的控制。对于付马博士提出的问题，刘子凡副研究

员解释说，西州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也主要是因为只能看到西州的文书，营州在微观上的特殊性，暂时没有材料来确定。但是，营州是正州，并不是羁縻州，实行的是汉制，庭州也是一个例子。关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提出，从万岁通天元年到开元五年，唐朝完全失去了对营州的控制，而开元五年之后，唐朝对营州的控制也就十几年，此前营州的变化非常大。

在讨论中，孟宪实教授认为“胡运将终”这一观念在此前确实没有受到重视，把它提出来在思想史上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胡汉之间也有一个彼此兴亡的关系。他建议作者可以再关注一下魏晋南北朝的材料，看当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此外，孟宪实教授指出，文章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有一些脱节，思想和政策是不是一定有联动性需要再考虑。他还提示，胡汉二元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以及中国政权应对胡汉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是可以郑重其事地进行研究的。

陈勇研究员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唐玄宗三个诏书主要是为了招抚胡人，那么“胡运将终”这种说法为什么能够招抚胡人呢？哪一些时期哪一些人群认为自己是胡？哪一些人对胡人的说法很反感？是否可以说清楚？刘子凡副研究员回应说，唐朝“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是诏书中是泛称，主要指北方草原的政权，“胡运将终”并不完全就是指整个草原的部落全都要灭亡，因为天运观主要指的是政权，另外，材料中汉人书写的墓志也并不能反映北方

草原民族自己的想法。

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在发言中提示，《史记·天官书》中三、五的含义应该放到上下文中去理解，它实际讲的是天文星占的变化，而不是人事之变。另外，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内容，不仅仅有民间的，很多也是用于军国之事，与文章主题关系比较密切，可以参照相关的研究，补充作者的论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付马博士的报告题目是《回鹘是“突厥”吗？——以回鹘文献中所见的“突厥”为中心》。付马博士首先考察了回鹘人的自称和漠北时代回鹘与“突厥”的关系，指出九世纪中叶以前，回鹘虽然是突厥属部，但此时“突厥”专指蓝突厥人，回鹘的自我认同则属于九姓铁勒系统。十世纪中亚突厥部族伊斯兰化以后，中亚普遍形成了突厥认同。付马博士仔细研究了这一时期回鹘文献中的“突厥”一词，认为其中作为泛称的“突厥”是回鹘人对自己语言的称呼，而狭义的“突厥”则明确指历史上的突厥部，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同期中亚穆斯林相同的突厥文化认同。而且，回鹘文献中“突厥”含有指代北方荒蛮之地喻义，也存在中亚突厥穆斯林这一现实所指，可进一步证明这一判断。那么为什么回鹘人会排斥“突厥”这一认同呢？付马博士指出这一方面受回鹘与突厥对抗的历史记忆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九至十一世纪中亚突厥穆斯林与回鹘的对抗这一现实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当然，受粟特人的影响，回鹘人还是接受了“突厥”作为突厥语族共同特征的概括性词汇。

评议人刘子凡副研究员对付马博士使

用回鹘文献进行研究的能力表示钦佩，并指出付马博士的研究回答了他自己非常关注的两个问题，即回鹘与突厥的关系和泛突厥的形成过程。同时，他也对这一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回鹘人并不一定是排斥“突厥”认同，而是根本不需要产生这一认同。回鹘也存在一个以回鹘为中心的时代，有过把更多部落容纳到自身体系中去尝试。另外，刘子凡副研究员还提出：回鹘帮助唐朝打击安史叛军有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能与突厥关系不大；除了粟特，回鹘有可能还受到汉人等其他接触较多的他者的影响。在回应环节，付马博士指出回鹘作为第三方对于当时战局输赢影响很大，帮助任何一方都可以得到金钱，所以应该还是有其他考虑。关于他者的影响，付马博士认为还是要看谁是主流，回鹘的很多历史记忆都是由粟特人帮助的，回鹘文很多内容也借鉴了粟特文。

在讨论中，孟宪实教授指出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回鹘是战胜方，因而政治体的自我认同更为重要，不需要认同突厥。但是回鹘在语言上也部分认同突厥，那么它最后在什么时间不得不接受突厥认同是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罗新教授则对付马博士把回鹘文的材料作为坚实的史料表示了赞扬。

第三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首先发表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鹞副研究员，他的主题是《契丹世选小考》。林鹞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前人关于契丹世选的不同观点。接下来他

就相关材料进行辨析，指出除了极个别因人定制的特例外，契丹世选涉及的只是北面分掌部族的二府宰相及部族节度使，只是北面官中的一小部分。而即便是宰相及节度使之选任，世选也只是方式之一，并非唯一的方式。世选对象则仅限于狭义的部落民。他认为世选从传统北面系统扩展到南面系统只是一个推测，现象本身并不能提供解释，史籍中家族成员出任同一职务的个案有其他的解释可能性，笼统来讲，从熟悉事务的技术角度看某个家族长期出任一个职务是有可能的，所以不一定是由于世选。林鹞副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如何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故事与策略，恐怕是制度史家必须面对的挑战。

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指出，林鹞副研究员长期关注辽代官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体系，《契丹世选小考》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做的一种尝试，提示我们去反思一些天经地义的契丹本俗有多大的适用性。不过对于契丹历史来说，往往提出一个问题意识的时候，材料却不足以支撑。《辽史·刑法志》是金人用零散的材料拼成，能多大程度上反映世选的范围值得怀疑。而《兴宗纪》《道宗纪》等也集中于个案，由此分析世选范围可能并不可靠，但分析那些特例的特殊性，亦不能完全予以解释。他进一步提出，在材料本身很少的情况下，如果特例过多，那么通例的有效性亦值得怀疑。

在讨论中，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李开元教授提示，在做这一类选题时，除了对已经研究进行质疑之外，还是需要寻找自己可以立论的地方。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邓小南教授则指出,《辽史》关于世选有一些规定性的记载,但更多的是故事。制度本身一开始是应用性的策略,然后变成故事,进而演化成为制度。换一个角度来看,不要固定地讨论什么是世选,除了那个以外从很多证据里可以做不同的例证分析,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类故事。邓小南教授还提出,文章中提到历史现象本身并不能提供解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很多历史事实过于仓促的就归结到某一种制度里,但是没有看到制度其实是层层叠叠的,可能有大量的介于这个之间的应对某种情况的处理策略,而这个策略可能慢慢就形成一种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些,或者核心的部分,或者将来发展的过程没准就会成为一种制度,而这样的讨论基本上可以立得住。

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作了题为《从东夷到北狄:中古正史有关契丹的归类变化》的报告。苗润博博士关注到,历史上对契丹的定位是存在混乱的,他尝试对此提出一些解释。《魏书》把契丹列为东夷,其史源应该是太和十一年李彪国史,魏收只是进行增补。而李彪国史首先以中原王朝角度自居,要构建自身正统性,就必须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隋书》将契丹列入《北狄传》,分析其史源,基本可以确定是唐初史臣的更改。而中原王朝与契丹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改变观察者自身的视角。在东夷、北狄的定义方面,对《魏书》来说最重要的朝贡称藩,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分类标准,而《隋书》则更强调东夷天性柔顺的特性,这种叙述传

统在《汉书·地理志》开始出现。由此可以看出,魏书是对《汉书》《后汉书》叙述传统的背离与反动,而《隋书》则是回归。此外,苗润博博士还指出《隋书》的回归是有其现实指向,从“史臣曰”看主要是劝诫君王不要像隋代皇帝那样劳民伤财东征,那么,在选择《东夷传》叙述对象时就有所考量,而在唐初史臣眼中契丹与东夷并不符合,与北狄则更契合。在《隋书》时代,这种定位具有先导性,无疑,华夏秩序是中心考量,而其他则是围绕在同心圆周边的差序格局。这种书写在当时有其特定国际关系动因和政治诉求,而在此后,这种认知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固化。从两《唐书》史臣曰(开元年间韦述国史)就能够看出既强调不同,又希望产生某种调和的可能,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从东夷到北狄的书写传统对《辽史》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呢?苗润博博士认为《辽史》“辽本朝鲜故壤”的叙述应该是金朝的历史书写,主要是为了强调朝鲜文化的价值,而其根源则在于金朝对高丽的亲缘认同。

在评议环节,林鹄副研究员充分肯定了苗润博博士的研究,认为他读书得间,对材料细微处的问题很敏锐,也善于解决问题,论证逻辑很强,环环相扣。不过他也指出,“辽本朝鲜故壤”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文化认同上的,但文章最后提到的《萧袍鲁墓志》中的类似说法则应该是地理概念,放在一起讨论可能不是很合适。同时,他还建议作者可以将汉唐之间四夷分类做一个系统考察,可能会有更有意思的收获。至于所有的历史书写是不是都是

在政治等方面影响下建构的呢?林鹄副研究员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任何时代应该都有一些纯粹的书写,所以需要对有意识的建构与无意识书写进行区分,如李延寿因循《魏书》可能就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

刘子凡副研究员提示,《隋书》把契丹列入北狄,可能主要是因为突厥在北狄。《北狄传》主要是写突厥及其附庸的民族,而契丹与突厥的关系非常近。付马博士则指出,契丹文化上更像突厥,位置正好处于东、北之间,偏北,跟高丽风俗不像,这应该也是一个因素。

与谈人党宝海教授对第三场的报告和讨论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林鹄副研究员可以在结尾将文章主题提出来,契丹官僚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因此保留了一定的贵族制,那么世选除了形成制度外的几个官职外,也应该还有大量的非制度的故事性的官职向贵族开放,这其实也是一种制度。关于契丹归类问题,党宝海副教授指出,古人划分四夷并没有客观标准,为后世史官留下了极大的空间,那么中间的选择是如何运作的?苗润博博士的研究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论坛的最后,文研院特邀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分别作了发言。

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他的三点感想:第一,论坛很多论文都涉及北方族群,这从中国学术脉络上来讲,有其合理性,但是葛兆光教授提示在座研究者是不是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南方,南方可能是将来研究族群、国家和边疆,或者说另外一个意义中心的新重心。南方如何成为中国,有些地

方如何成为外国,是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二,葛兆光教授注意到现在学界很多重心都放在中古时期,他希望同样主题可以考虑是否能放在明清进行研究。第三,葛兆光教授指出,现在做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研究,二者中间还有一个汉化与统合的问题,或者说文化的问题,他建议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应该在文化史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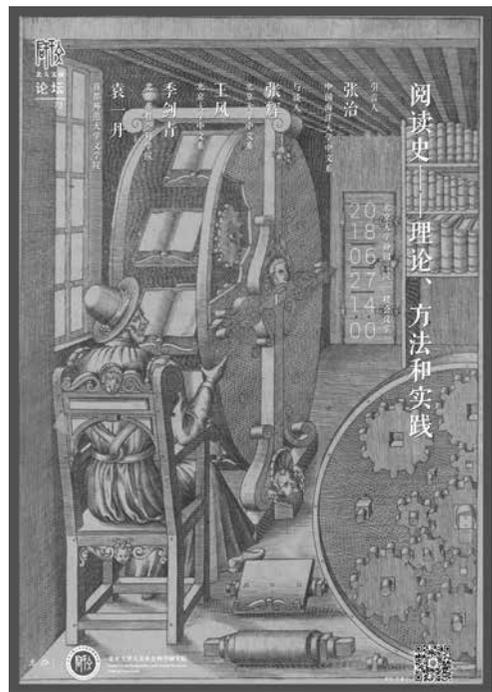
邓小南教授指出,文研院提出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各个时期不同的问题,“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之所以主要选择中古这一段进行讨论,是考虑到从汉代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到宋这一段时间,周边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另一方就不能了解我们习惯上讨论的中原。以前我们讨论什么是核心,什么是边缘,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看,可能看到的,呈现出来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文研院就希望能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更开阔的视野下重新去认识我们以前习惯了一些问题,争取有一些推进。

(撰稿:黄承炳)



72

张治等：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



这一选题起因于他正在撰写一部书稿——《钱钟书的阅读世界》。这本书原本侧重于空间上的考量，现预加入时间性维度以把握钱钟书书斋生涯的重要时刻。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存在诸如阅读方式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种视角。从文学的视角看待阅读史，主要是以重要作家为中心。这一视角不仅关注变迁的书籍史，还包括作家的精神活动。

随后，张辉教授以“过去的现在性：从一个T.S.艾略特的命题说起”为题发言。他认为，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我们如何面对传统，他将阅读这一概念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联系起来。这本书描述了三个命题：其一，过去具有现在性；其二，现在具有过去性，不仅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也在改变过去；其三，阅读的过程即放弃个性的自我，也是有意识地成为某种传统的根续。

关于过去的现在性，张辉教授以现代诗人冯至为例进行说明，冯至的精神史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阅读史的进程相互联系。冯至早期是浪漫派诗人，但随后，他的阅读对象从里尔克转向歌德，再从诺瓦利斯转向杜甫。这一阅读史的变化既反映了他精神选择的曲折性，也构成了他精神演进的内在动力。关于“现在”的过去性，

2018年6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主持并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王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剑青、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自由撰稿人宋希於、出版人周运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论坛伊始，张治副教授表示，“阅读史”

张辉教授以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为例进行说明。从今天的阅读规则、解释规则和写作规则来看，《摹仿论》文体内在的规定性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对于崇高文体、中等文体、低等文体等级性的规定已被颠覆，这体现出“现在”也在改变和修正过去的体系和统序。

随后，王风副教授以“学术界与读书界”为题发言。“学术共同体”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中情况各不相同，对人文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来说，其学术内部（学术界）与学术外部（读书界）没有明显的落差，属于“有边无界”。这种特点的弱势在于显得人文学科专业性较弱，而优势在于学术界和读书界之间存在较大的沟通空间和可能性。学术界的人在处理学术问题时会有专门的工具和训练，这也使得阅读易被异化。读书变成读材料，而读书界的人倾向于以兴趣出发读“闲”书。两者处理的问题和阅读的兴趣不太一样，因此，学术界与读书界之间的良性沟通可以形成互补。学术界读书，读书界做学问，两者之间边界模糊，才是人文学科健康的生存状态。

接下来，季剑青副研究员以“阅读史视野中的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为题发言。他认为，明清白话小说是一种文化消费品，阅读它是一种消费型阅读。这种属性同时与其作者属性相互关联。明清白话小说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写、加工，因此，作者在更大程度上可被称为素材加工者或整理者。意大利文学理论家艾柯区分了两种阅读方法：阐释文本与使用文本。明清小说阅读便属于后者。有的读者从出版市场购买产品，对文本进行再加工后，重新

投放到市场中；有的读者把阅读当作一次性消遣和休闲；还有的采用索引式阅读，例如，当时的文人圈子十分好奇《红楼梦》、《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便通过了解作者去索引小说的原始素材。

到了晚清，新小说提倡者有意为白话小说赋予新功能，如梁启超就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出用小说来传达心智、启蒙民众。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家也有意识地去掌控小说意义的生成，并引导读者接受，以服务于启蒙事业。到了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反对将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看待，他们致力于用新颖别致的白话语言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挑战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消费习惯。总结来说，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阅读模式经历了从消费型阅读向生产型阅读的转变。相应的，小说家不再是传统中作为公共性经验的提供者、加工者和整理者，而变成一个个有主体性经验的表达者。

论坛下半场，周运以“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藏书——严复1902-1904年的西文阅读”为题发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创办最早属于戊戌变法的一部分。梁启超提出，译书是改革的第一急务，他向海外购买了一些书籍、报纸，但不到两个月便随着戊戌政变化为泡影。因此，译书局真正创办于1902年，严复任译书局总办。严复所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主译西洋书籍，与专译日文的上海分局相区别。接下来，周运介绍了严复的私人藏书。1897年家中失火，《天地球》所幸保存下来，其他藏书几乎全部散佚；严复1900年在上海时着手翻译



张治副教授

《国富论》，原书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另外，严复收藏有莫利的《文学研究》、《柏克》、《卢梭》等书，很有可能是在上海黄浦别发洋行所购得的。译书局书目中有严复签名批注的书共有七种，分别是：《文学研究》、《卢梭》、《批评文集》、《柏克》、《歌德格言与沉思录》、《法国革命史》、《金姆》。严复可能读过的书还有《社会通论》《言语学》《群几权界论》等。梳理严复阅读过的书目可将其 1902-1904 年间的阅读活动串连起来。

随后，袁一丹副教授以“打开苦雨斋藏书：周作人阅读史初探”为题作发言。她首先以两张照片呈现了周作人苦雨斋的书房一角。袁一丹副教授对周作人阅读史的梳理，不完全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文献整理，而是通过阅读史探究个人思想史，着重考察周作人逆势而动的道德观念背后的知识谱系。袁一丹副教授介绍了研究周作人阅读史的两个材料：一是 1944 年他发

表在《古今》杂志上的长文《我的杂学》，二是 1925 年周作人应京报副刊所组织的青年必读书征集所列出的书单。关于阅读史研究的方法论，她在字面上借用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提法表示，阅读史研究也可采用类似方法，即文本内证与实物搜讨相结合。在实物搜讨方面，她分析了两种途径：其一是梳理周作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清晰的时间线索，可以分段甚至逐日地去考察周作人阅读趣味的演变；其二是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央美院图书馆“打捞”散佚的苦雨斋藏书。此外，她强调，书籍作为一种实物所保留的阅读痕迹（如题记、批注、印章、划痕、茶渍、指纹等）对于研究也十分重要。最后，她借用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来比喻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读与写、私下阅读与公开发言具有不对称性，我们需要从周作人“书房一角”出发，去探求其思想的全部。

最后，宋希於以“编辑家陶亢德的阅读和翻译史”为题发言。陶亢德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编辑家，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宋希於首先介绍了陶亢德的生平。他于 1908 年生于浙江绍兴，读过私塾之后以十多岁的年纪去苏州谋生，对新文学产生兴趣——阅读期刊，热衷文艺，文学梦萌动。随后，他辗转至沈阳，加入生活周刊社，成为特约通讯员，亲历并记录了“九·一八事件”。1933 年，陶亢德担任《论语》的主编工作，后又参与《人间世》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 年，与林语堂创办《宇宙风》杂志。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所办刊物和书房均停止活动，丧

失一切经济来源，被迫滞留上海。1943 年，陶亢德赴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后在日访问半年，其后与柳雨生共同主持有日方背景的出版机构太平书局。抗日战争胜利后，陶亢德以“文化汉奸”罪名被逮捕。新中国成立后，陶重拾编辑旧业，历任上海革新书店、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等出版社编辑。在“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到更严重的迫害，最后于 1983 年病逝于上海。

在陶亢德前半生的阅读经历中，他爱读郁达夫，更爱读鲁迅，为周作人、老舍两位作家出版书籍均获得成功，但为丰子恺出版的《艺术漫谈》却销量不好。而在其前半生的翻译经历中，他翻译了《滇缅公路》《怎样除烦恼：过美满生活》《苏联的领袖与人民》。后来，他的兴趣转向生物学，翻译了《配尼西林的故事》《生命的敌人：微子》《静静的顿河》《童年时代的高尔基》《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十字军东征》等书。直到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了《微生物猎人传》《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等书。总结来说，陶亢德的前半生将阅读兴趣贯穿于编辑事务之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推动；而在后半生，作为独立的阅读个体，在贫瘠年代坚持自己独有的阅读取向，体现了个人精神史的标本价值。

论坛最后，张治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关于阅读史这一话题还有很多再讨论的空间，呈现出了丰沛生气和古朴力量。对于学者们来说，更新知识视野、变化研究眼光，比固守在安全的、自我的专

业学科领域内重复学术生产更有希望。

（撰稿：王梦倩）

（四）文研汇讲

01

高波：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新运用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高波老师（右）颁发聘书

2018年5月2日下午，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新运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芑、徐建委、孙正军、刘亦师参与讨论。

高波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主题的学术

背景。他认为，近代中国处于巨大的词汇转型期。至少有三类词汇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类是新生成的词汇，如严复所译的“逻辑”一词以及从日式汉语输入的“干部”等词；第二类是在古典汉语中有使用但在近代发生了语义转换的词，此类词汇数量众多，如“封建、革命、文明、文化、经济”等；第三类则是在古典汉语中使用较多、地位也较为核心，但在近代地位逐渐下降甚至在日常使用时呈衰亡之势的词，如“夷

狄、春秋”等。目前，研究关注较多的是第二类词汇，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经由传教士系统或者明治日本时期所发生的语义转换。相较之下，高波老师则关注第三类词汇（即在近代时期走向衰落的传统核心词），并选择“春秋”及其相关词汇“二伯”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

高波老师强调，“春秋”这一传统词汇在晚清同光时期重新出现，与庚申之变后中国被强制嵌入西方的国际秩序有关。1860年前后，西方列强与清朝签订一系列条约，公使进驻北京，外交文书平行化。这严重动摇了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触发了一部分敏感于时运的士大夫产生了对世界秩序的新构想。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大量盟约且聘问频繁的“春秋”时代，因其出于中国历史且形似国际法秩序，开始被士大夫用来理解19世纪中晚期的世界秩序，冯桂芬、张斯桂、薛福成等人均认为此时的西方列强是“春秋列国”。

《万国公法》的输入者丁韪良也积极因应这一新的思想潮流。他在1880年代提出“春秋公法”说，主张中国春秋时代曾有雏形国际法。他将“春秋”分别类比为西方古典时期的泛希腊联盟以及中世纪的教皇封建制，并认为“春秋”体系以信义为基础，并可基本保持稳定，但最终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秦的武力兼并所破坏。

高波老师还指出，盟约体系在中国经史传统内是有争议的。古文经学认为盟约可见于太平世；理学与今文经学则对盟约评价消极，并认为这是王道衰落的表现。经史传统内对“春秋”的总体评价相较盟约而言更为负面，多视其为三代理想的衰

落与变异；且春秋本身衰变为战国，最后以秦汉一统之政作为结束，似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故而同光士大夫通过“春秋”这一核心词汇构想世界秩序，在有所保留的肯定之下，也有忧虑乃至批评的成分。

接下来，高波老师介绍了1880年代士大夫中出现的“二伯”说。此说有多个版本，较为流行的是“英、俄二伯”说——英国与俄国如同春秋的晋楚两国，主导当时的世界秩序。“二伯”说的提出，与19世纪中晚期西方列强竞争加剧以及国际和平运动的流行有关。而与对英俄霸权的直白陈说相对而言，当时士大夫对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多隐晦其辞。我们可初步挖掘出三种表述，分别认为中国为周、鲁与郑。高波老师认为，这三种表述不仅关乎对中国命运的判断，也伴随有对世界秩序演变方向的总体预测。

此外，高波老师尝试从主题与方法论层面对本研究的可能方向与限度进行反思。他表示，若要探讨光绪中期以后今古文之争的出现以及演变，最好削弱以康有为为中心的一元化叙述，给予廖平等更具调和色彩的思想者更多的位置。至于春秋公法之类的问题，不应停止于认定其为对西学的附会，而应以这一附会为起点，继续探索西学在地化的曲折脉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思想传统本身的重构。

最后，与会学者就“中兴”与“春秋”的关系、附会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撰稿：高波）



02

戴海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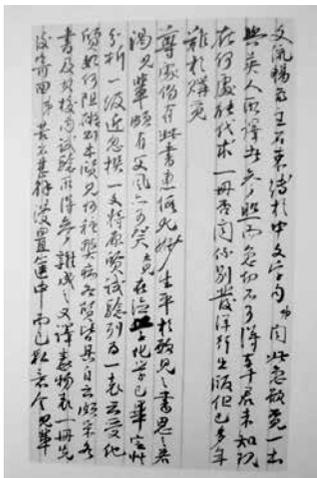
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

2018年5月8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郑振满，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张治、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

戴海斌副教授表示，孟森先生给予今人的印象（或说历史位置）主要是清史研究大家、重要的民国学人。不过，作为由

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政治关心。他直接从事过政治活动，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活跃于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用以前的标准衡量，相当于横跨了三个朝代，可见中国近代史变化的急速和剧烈。而孟森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介入、记录和观察，也有着特别的价值。

有学者辑录他的大量政法著、译作品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政论性文章，并质疑早前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孟森在进入民国后，便不再关注政治，而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明清史研究”。相反地，《申报》及《兴业杂志（附〈改正条约会刊〉）》



孟森信札第一通



戴海斌副教授

上的文字足以说明“民国初以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孟森对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内政外交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或者说是一以贯之，或者说是增无减。如果一定要说孟森先生何时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明清史学研究上面，大致应自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开始，距离孟森先生去世，前后不过七年左右时间”。（孙家红：《纪念孟森（心史）先生·〈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译辑刊〉代前言》）其实，不止民国前期，甚至直到北大时期、抗战爆发时期，孟森对于政治的关心和评论也没有停止过。相比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赵凤昌藏札》中保存的孟森函札更具私密性，议题也更加广泛、深刻，为我们理解孟森其人及与民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与视野。

《赵凤昌藏札》第1、2、4、9册存录孟森致赵凤昌函札，分属“藏札原第一函、总第二册”（3通）、“藏札原第四函、总第十二册”（29通）、“藏札原第十一函、总第三十一册”（14通）、“藏札原三十一函、总第九十三册”（26通），总计72通，原函均未署年份。又有第9册收录《（孟森）致张啬翁信稿》一通，原系孟森致赵凤昌函的附件。据戴海斌副教授考订，这批函件均作于民国时期，即1916年11月至1932年3月之间。

戴海斌副教授指出，孟森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是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初时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现存的孟森函札话题丰富，其政治评论对象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到曹锟、吴佩孚，再到蒋介石、汪精卫。评论对象虽

经历变化，但“宪政”这一主题始终相随。1923年，曹锟贿选之际，孟森对赵凤昌言：“曹三要做总统，不必多生支节，彼此老实说穿，‘曹锟’两字欲我写入选票中，其势不能为。……总之，直接买票之事前所未有，必欲行之，彼此终忌，断难得公道均沾之办法，其中不愿卖者亦必有人，能在其间将宪法交卷，总算有交代，即可一哄而散，愿卖者如果占多数，听其做此生意可矣。”出于对国会政治的失望，孟森使用了一种用传统术语所谓“剥极将复”的观念或说策略。他认为“欲以民选议员解决政局，昔人所谓人多食狼，狼多食人，真不可救药之病也”，政治罪恶到此已达极端，而后“军阀破、政客散”，卖身议员“名誉、资望概已破产”，“各该派自动自杀”。孟森反话正说，故谓“曹锟等皆民国之首功也”、“曹竟不成，机会正佳，曹竟有成，机会更佳”，寄望于“未染政治污点”的清白国民来收拾局面。但现实结果却是党军北伐，由新型党国体制收拾局面。

1924年前后，苏联政府对华废约的宣言和行动为孟森所瞩目，孟森一度拟参加东北议员牵头的苏联考察团。他表示：“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孟森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聘请赴南京任江苏民政厅秘书长，亲历“宁汉合流”的进程。这段从政经历虽然不长，孟森却有机会对国民党作近距离的观察。他对国民革命军的组织能

力、军事素养评价不俗，感觉南京当地“风气已有变迁，不一定沿京都及省会之旧习”，又以为“党军竟不肯宁汉相残，蒋欲宁伐汉，竟不可得，而不免一去谢罪，有主义者如此，无主义者如彼，吾终信事之必成，但未知果在何人之手耳”。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国民政府体制下，“党务与政务夹襖，终非久计”，“将来政府似又不能纯守俄国之衣钵，则组织未知用何方式？文武两途，军民两政何以使之就理，此皆在观变之中”。及至 1931 年，孟森北上至北京大

学任教，随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孟森对于抗战形势下国民政府的一党“训政”体制仍有相当多的观察和批评。

除民国政治外交等内容，《赵凤昌藏札》中的孟森函札在其经济生活、人际交游、家庭、子女教育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也都有着不少反映，可弥补之前的认识不足，颇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撰稿：戴海斌）

03

杨建华：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

2018 年 5 月 16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杨建华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参与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出席。

杨建华教授指出，秦汉帝国之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期，在中国北方和相邻的欧亚草原也发生了两件大

事：一是在东部形成了强大的匈奴联盟，二是在西边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两件大事的发生都与中国北方地区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也是中国北方与东部欧亚草原长期交往的结果。这种交往可分为中国北方北部的蒙古高原东部与外贝加尔地区的交往和与“亚洲内陆山麓地带”（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包括萨彦岭、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地带）的交往。东、西两个方向累积的上千年文化交往，构成了秦汉时期匈奴帝国的兴起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

接下来，杨建华教授分析了中国北方

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这一地区形成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在相当于中原的夏时期，我们便可以看到以翹尖刀和联珠饰为代表的冶金区雏形。早商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北方各地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尤其是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出土了目前中国北方最早的青铜短剑和环首刀。早商文化北方类型的台西遗址出土的羊首装饰很可能是商周北方青铜器兽首的创作源头。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国北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进入青铜器制作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种类和形制相似的青铜器或青铜器组合。太行山以西，在山西境内的三种遗存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西周初年分封晋国时所说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历史背景。自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在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各种铜器上的相似性凸显了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两地可能存在着贸易或迁徙等深层次的交流，甚至是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等地先后进入游牧时代，各地联系进一步加强，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中国北方文化带。这时期的冀北山地与蒙古高原等地仍然延续着上一阶段的联系。虎形装饰在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广泛流行，但是基本不见来自南西伯利亚的影响，如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以及动物形立兽等。

杨建华教授又分析了亚洲内陆山麓地带，主要包括西萨彦岭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阿尔泰山和中亚天山七河等地区。该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联系发生得非常



杨建华教授

早，并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夏至早商时期，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铜器大部分器形都能在境外的铜器中见到，出现稍晚的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和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文化的冶铜业则吸收了更多来自西北方草原的影响。公元前两千纪，森林草原地带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和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盟对中国北方产生过影响，例如叉鬃矛和喇叭形耳环。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欧亚草原进入铁器时代和畜牧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期，草原与中国北方的遗存发现都很少。黑海沿岸有前斯基泰文化，图瓦有阿尔然王家，中国有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蒙古高原与外贝加尔地区有石板墓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阿尔然王家在卷曲动物纹、装饰繁缛短剑、青铜马衔与马镫等器物体现了相同的时代风格，而阿

尔然王家又与黑海北岸的遗存有相似的器物。这反映了草原之间频繁的文化交往，且整个草原地区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

进入东周时期，亚洲山麓地带的游牧经济已经普及，各地区都流行武器、车马器与动物装饰这三要素。在公元前八至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北方主要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联系，其中最具有代表的就是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的传播。这两种器物往往共出，可互为佐证。从数量和形制上看，存在着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在公元前五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交往以立兽装饰的杆头饰为主，同时开启了与阿尔泰地区游牧部落文化交往的新阶段。中国北方地区有巴泽雷克文化流行的翻转动物纹、有角神兽和展翅造型的鸟饰件等，中国北方的虎形装饰也通过这

条路线影响到了阿尔泰地区，还有中原地区的丝绸和铜镜。

因此，这是一条双向交流的通道。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匈奴文化在蒙古高原兴起，并迅速向外扩张。中国北方人群被迫寻求新的交流通道，并与天山七河地区取得直接联系。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葬体现了与七河地区的伊塞克古冢的联系。中国北方在吸收欧亚草原的文化影响时是有选择的：先吸收功能性强的武器，后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吸收动物纹风格。

最后，杨建华教授总结到，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形成都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长期交往的结果。张骞通西域是农业与牧业国家层次交往的开始，在欧亚大陆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撰稿：杨建华）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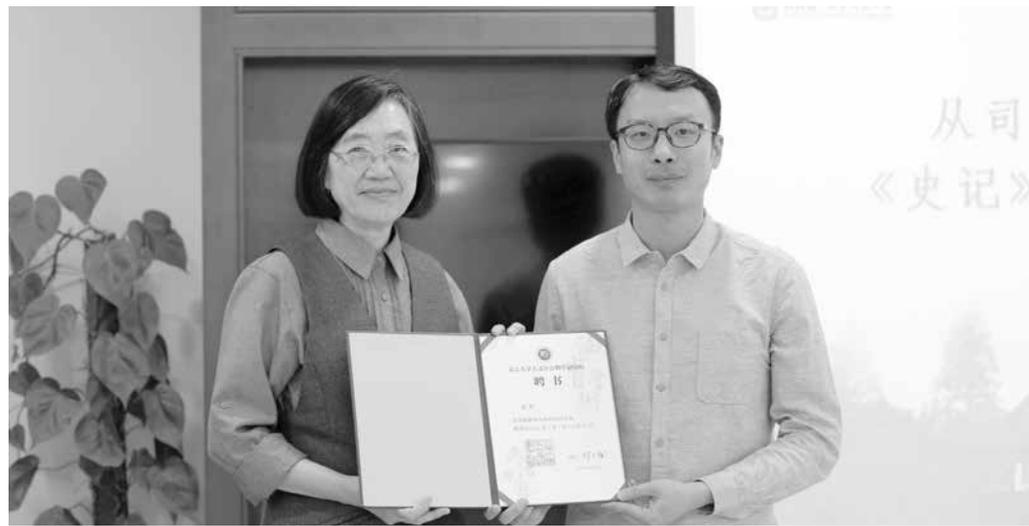
苏芑：

从司马迁到张文虎——《史记》文本的转续与更迭

2018年5月23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司马迁到张文虎——

《史记》文本的转续与更迭”。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访问教授杨建华、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徐建委、张治、戴海斌、孙正军、高波、刘亦师参与讨论。

苏老师首先说明“转续”是借用《史



院长邓小南教授为苏芑副教授（右）颁发聘书

记》引贾谊《鹏鸟赋》的一个词语，所谓“形气转续，化变而嬗”，而司马迁本人所撰的《史记》在其身后两千多年也经历了一个文本转续与更迭的过程。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苏老师在几年前参加过中华书局《史记》的修订工作，并在其间校勘了《史记》的一些宋刻本和古写本。之后，他又陆续围绕《史记》敦煌写本、日藏旧抄本以及裴骃《史记集解》作研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现象，认为可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报告第一部分从日本宫内厅所藏江户晚期写本《史记·高祖本纪》谈起。这是一个裴骃《史记集解》本，由于抄写年代过晚，其价值评判受到影响。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精装本出版后，修订组才获见了这件写本的影印件。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个写本是据古本转写的，将所据原本最早溯源至镰仓时代

（1185—1333）。然而苏老师通过考察其行款形制、用字特点、与传世本的异文、与《汉书》的关系以及避讳现象等多方面信息，判定该卷所承袭的底本应当是唐贞观以前写本，甚至是六朝写本。该卷所存异文多与《汉书》相同，而与传世本《史记》相异。这说明，传世本《史记》的文本也有后世传抄改易的可能，因此过去班马异同论的研究前提值得反思。这一问题又可引发对早期文献中互见性文本的思考——古籍中重出的文献，大都存在一个同源异流的现象，因此就文本而言，孰先孰后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在报告第二部分中，苏老师表示，裴骃《史记集解》是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而成，裴氏自序说“譬嗜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因此，该书性质既不同于何晏《论语集解》，也不同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而重在

梳理与还原《史记》相关史源，并借助对应的旧注来解《史记》。清代学者王鸣盛等认为，《史记集解》下半部分过于简陋，以为这是裴骃的疏失。实际上，这是对《集解》体例认识不足，汉代部分与《史记》对应的史料旧注主要就是《汉书音义》等，远不及先秦文献的汉魏古注那么丰富。借助《集解》的这个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史记》取材与编纂的过程。

报告第三部分围绕《史记》三家注分合与歧变展开。从南朝梁代顾野王编纂的字书《玉篇》征引《史记》旧注看，已多采自裴骃《集解》，可见《集解》成书不久就和《史记》原文合而为一，是最为通行的《史记》注本，而目前可见的唐代以后古写本全是带有夹注的裴骃《史记集解》本。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是在《史记集解》本基础之上又作的新注。如果说《史记》白文本是A，裴骃《集解》是B，司马贞的《索隐》是C1，张守节的《正义》是C2，那么《史记》《集解》与《索隐》或《正义》，就构成了类似儒家经典经、注、疏一样的“ABC三级序列”文本。到了南宋时期，黄善夫《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本将两种不同类型的“三级序列”文本弥合在一起，并进行了大量的删重改造工作。

同时，三家注本包含了四种《史记》的原文文本，存在大量龃龉之处。借助这些差异，有时可以考证司马贞、张守节对裴骃的误读，进而确认注文的文本年代。这种文本上的参差，也会逆向影响后世《史记》整理者对三家注进行改造，比如清末张文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获见了明

代汲古阁所刊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有意识地要在原有三家注本基础上进行增补与调整。于是，他在金陵书局主持校刊的三家注本，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三家注本系统的新版本，也是对两种“三级序列”文本拼合的不同构造。从张文虎调整改动的某些细节之处也能看出，写本与刻本时代古籍整理者对于同一部典籍形态的不同认知。由于金陵书局本校勘精良，被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与2013年修订本选作底本，在当今社会影响深远。

最后，苏老师指出，《史记》以及相关旧注的文本演变过程，是经典流传的一个侧影。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古籍整理中存在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即每部典籍在重新加工过程中都要面对两种原则的考量：学术性与实用性。前者重在“存真”，旨在保持文本的多样性；后者重在“求善”，旨在实现文本的统一性——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古籍整理工作就是在这种背反的张力之下处理变与不变的矛盾，进而不断寻求平衡。

（撰稿：苏芑）

05

孙歌：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

2018年5月30日，文研院第四期访问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孙歌做主题报告，题目为“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参与讨论，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平，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幕唯仁（Viren Murthy）出席。

开始于1946年5月、结束于1948年4月的东京审判，是与冷战的“铁幕”一起拉开的日本战后历史的序幕。时至今日，这个决不单纯的审判仍然构成理解日本政治特征的基本线索，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揭示着构成今日世界张力基础的历史结构关系。

1956年汤因比访日。他的造访在日本知识界引发了对“挑战与回应”这一《历史研究》核心命题的兴趣。

梅棹忠夫在1957年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大胆地提出了重新划分世界认识基准的假说。这个假说提出，由于社会生活的基本样式千差万别，很难认为亚洲这个范畴可以统一地囊括处在亚洲地域的各种文明。亚洲不仅多样，而且



孙歌教授

在历史发展脉络上无法整合为一体。因此，应该避免使用亚洲、欧洲这类范畴，可以把世界分为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第一地域是由西欧和日本构成的，第二地域是由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斯兰四个文明圈构成的。

梅棹的假说在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知识界的热议。竹山道雄于1957年9月在《新潮》上发表了《论日本文化》一文，把梅棹讨论的视点压缩到了“西欧与日本的平行发展”这一个角度，并试图对西欧和日本进行横向比较。他完全无视梅棹建构世界分析新结构的学理目标，无视其学

说中日本与西欧的“平行发展”仅仅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一个环节，而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梅棹的论述直接转化成了确认日本的“西欧”性格，使其置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

1958年，竹内好发表评论《两种亚洲史观——梅棹学说与竹山学说》，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在同样强调日本不属于亚洲且与西欧近似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但是，梅棹赋予日本的这个定位仅仅是为了对共同体生活样式进行功能性分析，他为此而把历史视为“主体环境系的自我运动轨迹”。竹内好认为，这是一种把历史平面化的方法，它使得历史在终极意义上“零化”了，即破除历史进化论的单一想象，承认不同文明历史演变轨迹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健全的现实主义态度。而竹山却在论述日本与西欧平行发展的时候，自觉维护等级化的价值判断，在亚洲与西欧之间建立了一个歧视性的“进步序列”，认为亚洲要以日本为榜样。

1961年，竹内好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他回顾了自己于战前第一次造访中国的经历，进行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价值观翻转。竹内好指出，中国生活着大量与日本人同样的人，他们有着和日本人相近的喜怒哀乐，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日本人意识到。他结合日本的战争责任等课题，进一步深化了上述问题。他特别指出，日本人觉得自己败给了美国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是一种物质至上的想法。除了战后被美国占领这个要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就是蔑视中国，觉得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但是，在现实上中国赢得战争，靠的

是精神力量，也就是中国拥有战胜日本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讲演的最后部分，竹内好回应一位提问者的如下问题：战后日本的教育是把美国的教育制度从外面引进来，这种直接套用以西欧式个人为前提的民主主义规则的做法是否合适？是否应该不要这样追随欧美，而是以亚洲原理作为基础？

在回应的时候，竹内好又进行了一次价值翻转：他强调人类具有等质性，亦即人类在价值意义上是完全相等的。这个判断呼应了他在讲演部分所谈到的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同样的人的说法，强化了人类平等的价值判断；不过竹内好所说的“等质性”并非是“同质性”。换言之，他强调的是价值而不是内容。就人类的内容而言，他说的是“相通”，而不是“相同”。等质而相通的人们，各自具有自己的个别性，却又平等地对其他文化开放——这样的集合体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人类。

竹内好所说的“方法”，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就是说“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个关于获得“亚洲自觉”的运动过程。亚洲自觉并不意味着在实体意义上确定与欧美之间的抗衡关系，而是意味着包括这个抗衡在内、但是同时使其转化为对于各种意义上的等级次序、霸权意识的抵抗。

（撰稿：孙歌）

06

郑振满：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

2018年6月6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郑振满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和美国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合作编撰的《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一书。此书分为二卷，卷一为导论，概述莆田历史上的神明谱系、庙宇系统与仪式传统，探讨宗族与宗教的演变轨迹；卷二为乡村庙宇与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共涉及750多个村落、2800多座庙宇、153个“七境”集团、15座区域中心庙宇。由于此书在国外出版，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目前计划再出简明的中文版，集中探讨仪式联盟的建构过程与理论意义。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显示，莆田平原是沿海湿地，唐以后历经围垦和水利建设，逐渐形成福建沿海四大平原之一。郑振满教授指出，在莆田平原的开发过程中，宗族与宗教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就奠定了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基础。然而，民间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并非一成不变，而在不



郑振满教授

同的历史条件下与国家的礼仪制度与正统意识形态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建构新的仪式传统。我们研究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其实就是为了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

郑振满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不允许普通民众祭祀祖先，自然也不会有民间的宗族组织。莆田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最初在佛教寺院中建功德祠，因此便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仪式联盟。南宋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莆田的士大夫开始创建家族祠堂，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宗族组织。至明代前期，莆田的世家大族都有奉祀始祖的祠堂，宗族的发展突破了国家礼制和程朱理学的限制，成为一种“庶

民化”的宗族组织。

莆田的早期地方神大多是从事“巫祝”的历史人物，并于宋代陆续纳入国家祀典。《宋会要辑稿》中便有不少赐封莆田地方神的记载，海神妈祖是其中之一。宋代士大夫利用祀典制度改革地方神的祭祀仪式，形成以“春祈秋报”“““””迎神赛会为特征的里社祭礼。然而，明初实行的宗教改革要求乡村各里建立“社坛”和“厉坛”，定期举办祭祀社稷之神和孤魂野鬼的仪式活动，禁止举办以地方神庙为中心的迎神赛会。明代初期，莆田各地曾建立符合国家礼制的“社坛”和“厉坛”，但并未废弃原有的地方神庙，不久就恢复了以神庙为中心的迎神赛会。明代中期，莆田地方官曾多次发起“毁淫祀”运动，试图将地方神庙改造为“社学”等教化场所，但最终不了了之。在此过程中，莆田的士大夫设法将“社坛”纳入神庙之中，建构了社、庙合一的仪式传统。

莆田历史上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实际上是民间的自治组织（或说合作体系）。明清时代，随着民间自治化的发展，宗族和宗教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各种超宗族和超村落的仪式联盟。在莆田平原，仪式联盟的基本形态是“七境”集团，即若干个“境”的联盟。所谓“境”，即可以独立举办绕境巡游仪式的社或庙，通常有明确的地域边界。在“七境”集团中，一般都有共同的庙宇和仪式活动，每年定期举办联合巡游、进香及神诞庆典。更为重要的是，“七境”集团通常是负责水利、交通、赋税、治安、教育等公共事务的地域共同体。

自明清以来，聚落形态的变化与水利、市场、土地等利益冲突导致了“七境”集团的分化与重组。清代后期的“乌白旗”分类械斗，集中反映了地域社会的矛盾冲突与仪式联盟的象征意义。“乌白旗”的分类标志是庙里的旗，敌对双方分别树立乌旗或白旗，若持中立立场则必须树红旗。而在实际上，“乌白旗”械斗并非起因于宗教信仰，而是地缘政治。为了压制“乌白旗”械斗，逐渐形成了以区域性庙宇为中心的仪式联盟。这些仪式联盟通常包括当地所有的“七境”集团，其中既有乌旗，也有白旗或红旗。一旦发生分类械斗，区域性庙宇或出面调解，或组织大规模的巡游仪式，使械斗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在晚清、民国的地方权力格局中，这些区域性庙宇实际上就是社区权力中心，其权威超过了地方政府。

最后，郑振满教授指出，莆田历史上的仪式联盟，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仪式化过程。民间的仪式传统源于国家制度，因而也可以被视为“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历史过程。

（撰稿：郑振满）



（五）文研读书

11

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建 ——《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新书研讨会

2018年6月3日下午，“文研读书”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建——《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新书研讨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研究员严志斌、副研究员常怀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教授陈胜前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讨会围绕孙庆伟教授的著作《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以下简称《甬宅禹迹》）展开。研讨会伊始，徐天进教授介绍了组织本次会议的原因、该书的创作背景及其在方法论、历史观上的进步，并传达了因故未出席的李伯谦教授的寄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中将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看作夏文化是夏文化研究的最大成果，同时，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随后，孙庆伟教授发言。他表示，夏文化是能够引起大众共鸣的重大话题。因此，学者在回答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低估社会大众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热情。他强调，在没有确凿证据情况下，且未对传世文献进行系统辩驳之前，不能轻易说夏代不存在。孙庆伟教授还指出，学术界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学者的研究。

李零教授指出，《甬宅禹迹》研究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次研讨会讨论的不仅仅是考古上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夏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历史观问题。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早期历史多有质疑，在《剑桥中国上古史》中第一章，张光直先生使用了“夏问题”一词。“问题”这一措辞本身就说明，有关夏文化还存在很多争论。产生争论的一方面是由于相关证据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方法论和历史观问题。

李零教授进而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特定的价值，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关于夏文化，现有证据和线索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我们应多从方法论和历史观上进行讨论，同时也应看到其作





孙庆伟教授作引言

为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不可急于下结论。

此外，李零教授还对徐天进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夏文化”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从文献角度和历史主体上看，不能否认三代存在，他相信三代的存在，因为都同时提出考古是与历史文献不同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在材料和理论方面会有很多争论。

接下来，朱凤瀚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甯宅禹迹》第一章考证夏代历史，通过对比《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梳理夏王朝世系。该章内容不仅具有原创性，还对东周文献中夏代都邑进行考订。尽管多数还没有得到考古证实，但其收集的原始资料非常全面，且对今后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该书第四章对夏文化各种说法和研究目标进行了梳理，并为日后研究提供框架。

有关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有学者

主张早期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之间应具有某种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朱凤瀚教授认为，春秋中期之前的对应比较科学，而春秋晚期及之后的考古学文化是超族属的概念。如果夏已经有王，那么夏文化应是以姒姓统治者为主体，依附若干个姓族的文化。因此，夏文化应该叫做夏人的文化——是在文化上、语言上、习俗上存在共同认同且居住接近，形成了以王朝为核心的夏文化。

朱凤瀚教授还表示，夏商之变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王朝的更替不一定导致文化的断裂，目前来看，二里头文化越来越接近夏文化。朱凤瀚教授认为，夏代可能已有文字。商人周祭制度严格并一直延续，不可能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因此，商前期应该有文字符号。但其具体形式不明，可能是因为尚未发现或仅被少数人掌握。夏与商前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只是夏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发达程度仍需考古学证明。朱凤瀚教授最后指出，夏文化探索仍在路上，期待日后发现高等级大墓以大大推进研究。他认为，《甯宅禹迹》一书是不回避问题并严肃讨论问题的扎实著作，是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相结合的典范。

韩建业教授提出，在以往，夏文化研究多是论文集，而系统梳理夏的专著很少。《甯宅禹迹》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对新材料产生了新的思考。韩建业教授指出，夏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需要在学术上不断讨论才能进一步推进其发展。任何国家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学术立场，任何学者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学术研究——不能因为背景原因否认学术上的成果。

韩建业教授还对该书有关“禹征三苗”

的研究表示支持。他认为，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讲，这一时期该地区确实存在较大变化。该书将重大历史事件和考古学文化上的变迁相对应，而这对夏的上限研究很有意义。韩建业教授还提出，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不整合的现象：文献记载中禹、启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但龙山后期并未发现有以河南为中心的强势考古学文化。因此，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万国林立。文献记载是夏代晚期或商周时对夏历史的叠加、夸大，因此，在使用文献时首先要对文献有所怀疑，尤其是细节部分，韩建业教授主张在疑古的前提下信古、释古。

随后，袁广阔教授发言。他提出，《甯宅禹迹》是夏文化研究中考古学和文献结合最系统的一部，同时，该书还使用了很多新考古材料。最近，在郑州商城外郭城西南墙发现有两组地层关系。这表明，郑州商城外郭城年代在二里岗下层之前，较之前报告的年代提前很多。

袁广阔教授还对之前讨论的相关问题进行逐一说明。关于夏商分界问题，他表示，二里头文化四期大部分进入商的纪年。其次是新砦期的问题，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王湾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二里头文化诞生于新砦期向洛阳盆地的移动及西方齐家文化因素的融入，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发展表现为从洛阳地区向周边扩散。关于文字问题，他表示，目前可以确定商代中期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而晚商甲骨文字应为早商郑州商城文字的延续，更早的庙底沟文化的刻画文字与后世文字相似，而有关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在方法论等宏观层面上，陈胜前教授比

较关心的是知识生产背景，即外在时代背景和内在理论方法。他表示，若说时代背景是受到种种质疑的民族主义，那么其产生背景则是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考古学诞生之初，汤姆森的三期说即为民族主义，因此，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带有民族主义颜色是较为常见的。以中国为例，考古学研究就经历了外来说、民粹本土说、外来与本土混合说的历程。至于内在理论方法方面，陈胜前教授提出，首先应判断问题是否成立。夏文化确实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且它不是一个学科能解决的，应进行多学科研究。

陈胜前教授还提出，考古学是发现物质遗存的学科，而如何界定物质遗存概念对研究有很大影响，物质遗存能否解决人群、族群关系，可能是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陈胜前教授认同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存在关系，这一关系也得到了民族志记载的证实。但是，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当代学界对族群的认识是多层次、相对性、构建的过程，因此，夏也许只是文化构建意义上的过程，而非客观标准的产物。我们对夏进行研究需要考古学发生转型：从族属到构建，从而进一步转向文化表达。尽管我们的研究也许无法解决夏文化问题，却可以不断地认识问题。

严志斌研究员随后发言。他首先赞同袁广阔教授有关早期文字的看法，并期待日后文字遗存的发现。严志斌研究员认为，《甯宅禹迹》推进了学术史研究，在夏文化讨论上具有很高的作用和地位；书中提出《史记》为代表的上古史体系是可信的，为了构建真正意义上客观存在的夏，在方法论上使用了

在历史、考古、历史情境下考古结合的新思路。

之后，严志斌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若说以《史记》为代表的上古史体系可信，那么，信史是否可以向上追溯到《五帝本纪》？文献与考古相结合互相为证，一方面，审查史料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也应对出土材料进行审查。书中认为，考古学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一脉相承下来，这是否说明二里头文化既是夏又是商？这样的对应关系是否表示我们需对“考古学文化”概念做进一步思考和论证？

接下来发言的是常怀颖副研究员。他指出，《甯宅禹迹》一书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考古材料不够全面，对于夏的遗迹现象（即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城址、墓葬材料未能进行研究、对比；其次，著作重点讨论了夏的形成问题及早期夏文化问题，而对于夏商分界问题的研究比重较小。

常怀颖副研究员还指出，文献中关于早期夏文化、夏灭亡及其与商的战争记载较多，且文本差异不是很大，而有关夏中期的记载差异较大。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往前追溯时就会有夏中期的问题。常怀颖副研究员同时指出，文化的发展是缓慢渐变的过程，很难找到精确的界限将其划分阶段。因此，看待文献的关键是关注语境。由于文献存在各种问题，考古学的探索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尚未发现文字就停滞夏的讨论。换句话说，有无文字不是确定夏文化的关键决定性证据。在考古学的方法论上，论证逻辑和材料之间常常存在缺环，这导致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探索分歧很大——但我们不能因



徐天进教授主持

为文献或自铭文字材料不足就将问题搁置。

许宏研究员随后发言。他首先申明，没有发现文字就无法解决夏文化问题。许宏研究员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且认为必须有类似殷墟自证性文字材料才可证实夏。对于《甯宅禹迹》一书，他认为，这是当前夏文化研究领域一部集大成之作。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是对以往尝试的一种高度的概括和延续，书中的结论仍是推论假说而非定论，并未终结有关夏文化的纷争。

许宏研究员表示，该书的创新点在于首次提出“信史”。但他同时指出，信史应该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推论假说对应传说原史，而确证定论对应信史历史。书中“信史”的概念即相信文献中的夏是存在的，这表示在与考古学对证之前已经存在信史的预设，而科学的学术研究应当是从怀疑入手的。同时，他认为信史不需要人为构建，而应是不证自明、没有争议的，且对“信史”一词在

解题上应存在不同的思考。

许宏研究员还指出，自己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城的假说，同样是谈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假说只代表可能性、是不排他的。有关夏是否存在，他则指出，夏文化是东周文献中构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孙庆伟教授的著作将这种非物质文化转化为物质文化，仍是一种推论，许宏老师认为暂时无法确证夏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

在方法论上，许宏老师指出，二里头文化每一段陶器群组合变化是相对平缓的曲线，没有明显的改朝换代。因此，不能用陶器这种不确定的标准取代文字证据，后者是确认夏文化不可回避的标准。当前研究中存在有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本体论与当代建构、主观认同论的对立。许宏老师认为，考古学研究是有边界的，考古学擅长长时段的研究而不擅长具体细节。基于学科研究的特点，应对是否将夏放在重要地位进行研究提出疑问。最后，许宏老师指出，现在正处于考古学转向社会研究的转型时期，有关夏文化探索还在路上，《甯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孙庆伟教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简单回应。他指出，信比疑更难：在教学过程中常常遇到学生未读先疑的现象，但不能因为怀疑就不读文献、不读《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疑不是研究的结束，疑的终点在于疑之后的信；《甯宅禹迹》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夏代是信史，其余的研究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进一步深化。关于严志斌研究员的问题，孙庆伟教授表示，不可对信史进行无限上溯，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五帝本纪》的内容也值得我们怀疑。

随后，赵辉教授发言。他认为，夏的存在是肯定的。同时，我们在阅读文献时应有选择地相信，越是细节的记载就越应谨慎对待。目前研究中有关考古学材料与文献的不同倾向是方法论的问题。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与夏对应，赵辉教授表示，若从地望、时段以及考古学上识别的文化来看，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文化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考古学在研究上是否存在边界？考古学能够解决什么层次的问题？关于以上两个问题，赵辉教授表示，考古学在描述趋势这种大问题上是有有效的，但很难做到历史事件等具体研究（如夏商分界问题），且考古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大概率的描述。赵辉教授还表示，在夏商考古学研究中，对于是否存在更急迫、考古学更擅长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考古学研究从物质文化史关注年代、谱系、族群族属的讨论，进而转向研究社会层面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将出现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徐天进教授表示，《甯宅禹迹》一书是当前考古学界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且该书中的学术方法、观点、立场非常鲜明。一方面，该书作为阶段性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新的开始；另一方面，也将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并推动相关问题继续发展。

（撰稿：李晓琳）



静园雅集

21

陈海涛： 精神与图像——敦煌北魏二五四窟中的华夏美学

2018年5月1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精神与图像——敦煌北魏二五四窟中的华夏美学”。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陈海涛博士主讲，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杨乐主持。

“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敦煌曾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并留下了包括莫高窟在内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百年以来，包括洞窟壁画造像艺术、敦煌藏经洞文本在内的诸多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已有印象。陈海涛博士认为，就中国艺术史而言，敦煌艺术的重新发现使得人们认识到，在中古时代曾存在不同于后来文人创作的公共艺术领域。僧侣、匠人以及作为供养人的豪门大族成为敦煌艺术创作三个紧密协作的主体，这些主体在敦化壁画中多有体现。就敦煌艺术的内容而言，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是其最大特色，且这些艺术作品充分体现出华夏美学精神。

随后，陈海涛博士结合具体实例表达自己的观点。图像与精神结合，可通过营建于北魏时期的二五四窟得以呈现。北魏二五四窟位于整个洞窟的中层，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塔柱式结构洞窟。该洞窟建造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北魏中期，即公元465至500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艺术创造最为活跃的时期。整个洞窟分前后两室，前室壁画为佛教故事画，经学者们研究，以进窟后右手边为轴，观众会经历一个礼佛的过程。这个洞窟通过空间和时间变化呈现整个过程的面貌，透过佛教的“世界”观念，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整个洞窟的顺序。以中轴线为界点，观众会经过过去千佛、现在千佛和未来千佛的变化，使信众感受到从过去到未来的浩瀚过程以及千佛就在身边的意象。

而洞窟也很好地体现出一种空间属性，底层的夜叉等形象和中层的佛祖释迦前世故事描绘，以及上层的天宫及未来佛形象表现出完整的佛教对空间的构建。二五四窟在现存的洞窟中具有非常好的观看条件：在光线的设计上，洞窟有明窗和



陈海涛老师主讲

门两个进光口，使得光线能很好地进入窟内，方便信众观看壁画。中古时期强调“禅观”，即通过信众自己观看图像而获得信仰感受的修行方式，而这种洞窟设计恰好反映了通过“观看”进行宗教实践的模式。

陈海涛博士认为，对于这一洞窟的理解，还应联系时代特点。这一时期，北魏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就是游牧民族柔然的侵扰。公元460年之后，柔然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地区，而敦煌作为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成为了北魏防御柔然的前哨。自公元470年开始，敦煌多次受到柔然的进攻。此时的敦煌同时受到西域文明、南方吐谷浑、北方游牧文明和自身华夏文化等多重文明的影响。多种文化在此交错，使之在艺术表现上进入一个多彩纷呈的时代。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这种多元文化亦体现在石窟中。在这样纷繁的历史背景中，莫高窟艺术也表达出一个将敦煌各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以慈悲反抗绝望的意象。透过二五四窟，我们可以分析出其具备的三个具体主题，亦即“慈悲能承载”、

“智慧能沟通”、“美能成就”。

接下来，陈海涛博士回到二五四窟的论述中。该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营造出了复杂而又精确的构图设计，并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以“舍身饲虎”这一主题故事为例，它讲述了古印度有王子三兄弟到山中去游玩，看到母虎产下几个虎仔，但因母虎极度虚弱无法捕食饲养幼虎，三兄弟便生施舍之心。其中最小的王子萨多愿以自己的肉身帮助母虎，在支走两个王兄之后，他趴在母虎边等待被捕食。但母虎太过虚弱，无法爬起，萨多便以竹枝刺破自己的颈部，使老虎舔食血迹后再去捕食萨多。最终，当两个王子察觉出异样返回寻找时，萨多只留下一堆白骨。国王和王后在得知小儿子舍身之后，便在其舍身的地点建立一座佛塔，以此象征萨多成正果。这个故事是在佛陀为众弟子说法时，解释一座佛塔的来历讲述的。以此故事，佛陀以萨多为自己的前世，而以众弟子为小虎，表达自己不断舍身普度众生的愿景。这个故事是对慈悲精神的表达，结合临摹、还原创作过程以及联系相关学术研究，我们能对这幅画作产生更为充分的了解，形成可行的研究。

陈海涛博士表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在寺观公共艺术创作兴起后，匠人绘画对画作气势营造的风格特点。而在这幅画作中，更表现出类似西方几何学的绘画特色，同之前华夏的绘画传统非常不同。而与当今观众欣赏画作不同的是，在中古时代，石窟画作是满足信众修行与供奉的作品。因而在画作中会体现出图像和精神

观念的结合，从而形成非常复杂的绘画结构。就具体分析而言，我们也可看到诸多华夏美学因素如“化干戈为玉帛”、“相由心生”等。陈海涛博士最后表示，通过

数字化分析解构与重新研究，我们可将静态的画作变为动态加以研究和呈现。

(撰稿：玉书涵)

22

冷冰川、周晨： 新变里的传统——大书《冷冰川》品读会

2018年6月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新变里的传统——大书《冷冰川》品读会”。著名艺术家冷冰川、设计师周晨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克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出版人汪家明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作为整部书籍的设计师，出版人周晨讲述了大书《冷冰川》的设计缘起。他说，大部分人看到的冷冰川作品都是出版物，他们也许会有一些误解，认为其作品或是黑白画，或是版画作品。然而，版画可以复制，而冷冰川的“刻墨”作品是独幅。“刻墨”的特质是以刀来创作，强化其力量感，每一刀的长短和角度都是推敲的，传递着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周晨强调，该书籍以四色印刷黑白作品，采用推篷装的方式，保留了颜色层次的变化。该书带有艺术家的特别印记，并注重阅读的新体验新感受。同时，《冷冰川》也因其“无限”的意蕴今年4月

份获由米兰政府、米兰设计周组委会颁发“最佳概念奖”和“最佳故事奖”。

随后，本书作者冷冰川表示，此前的书可以被认为是“愤怒的书”，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会受到很多限制。而这本书是完全不计成本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制作的。它使用特殊的纸张和设计，将“刀刻”的灵感放置在书的封面设计中，同时使用推篷装的方式。在威尼斯展示的时候，该书全面展开约有70多米，其“无限”“无穷无尽”的概念跃然纸上。这一概念既含有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又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渠道。资深出版人汪家明认为，关于书籍的设计，一种是给人看的，一种是给人欣赏的——这部书属于后者。本书将原作做到极致，将“墨刻”全部改为“刻墨”，从内容出发进行创作出版。冷冰川的画作与文字互为一体，汪家明当场诵读了十几年来冷冰川书写的文字片段，如“我偏爱在真伪不明中创作。在陌生中寻找单纯的热情——单纯是你对事物独特穿透力

的凭证，它直面人心。当‘一切’（世故）寻不着的时候，创作才有意义。这是我对创作唯一的要求。”这体现了冷冰川对艺术的认知和感悟。

而汪家明当场诵读的画家黄永玉对冷冰川的评价更充分诠释了其画作的内涵。“你的画，是五寸厚的大辞典，每一页，每一行，每一颗字粒，都标识着一个可靠的心地：母亲的细心，父亲的严厉，情人的甜蜜。你让每粒砂石，每片树叶，每根野草，都显出教养的仪态。你把绝望变希望，让流浪的星星都有了归宿之处，风暴变星月满天。你的开垦不再让人们怀疑艺术的市侩和浅薄。”

刘玉才教授认为，本部书利用了中国印刷术之乡的传统，展示了时代装帧设计水准和技术水准，给后人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其制作意义不在于流行，而在于流传。曾为策展人的唐克扬教授表示，艺术需要付出很多技术性的努力和投注较长时间的精力。他惊叹于书籍设计的细致，此书的尺寸也反映了其中所灌注的绵延的工匠精神。同时，他认

为这部书含有对美和欲望的追求，是一部大写的历史。他联系自己在美国学习艺术的经历和最近做的有关摄影的展览、研究，分享了中国传统“计白当黑”“反转”画法中体现的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对画作的新认识恰好体现在《冷冰川》这部著作中。

最后，冷冰川表示，“刻墨”灵感源于鲁迅推崇的画家珂勒惠支、麦绥莱勒崇、比亚兹莱的作品。在16岁未成年时于图书馆看到的同时，他就将中国民间艺术与毕加索、马蒂斯等，将最“洋”的与最“土”的相结合，以随心所欲的“瞎来”的方式进行创作。90年代初，冷冰川从零开始在荷兰学习当代艺术，在进行一系列思想碰撞后自然地回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并从中找寻灵感。最终，他探究出了自身的一种创作方式——“瞎来”。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方式：没有尺寸、没有方法，不离开传统却又蕴含新意——这同时也是本场品读会的主旨。

(撰稿：孙雅馨)



菊生学术论坛

09

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世民研究员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菊生学术论坛”第九期“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菊生学术论坛系由北大文研院会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系为配合北大文研院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及北京大学人文学术学科发展史研究项

目规划而举行。来自中国内地、中东及欧美的二十余位专家学人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熟知众知，近年来随着大量书信、日记、个人回忆录及访谈资料等的出版，学术史研究以及“学术八卦”一直是国内比较活跃且引发较多关注的方面和领域，尤其在网站、微信圈及各种社交媒体，多以奇闻轶事、八卦趣闻等文学形式广泛流传。其中虽不乏新材料、新见解，但限于形式和研究者水平，此样的描述或流于肤浅，或陷于对某个人生活或感情世界的无端猜测，对于学科历史的厘清与进一步研究，并无多少助益。有鉴于此，此次论坛特邀请到一批工作在学界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交流研究心得与彼此所闻；并同时邀请到了极富研究经验的前辈学人（如王世民、李零、罗泰、杨建华等先生），现场点评与指导，从而“明学术，正人心”。

一、主题发言

此次论坛共四场，历时两天。6月22日论坛伊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做第一场主题发言。王先生说：“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最好是由资深的考古学家来进行研究。我用一个俏皮话来说，

我在这几十年当中主要是从事了‘考古打杂学’。什么是‘考古打杂学’？就是被一些人事性和事务性的工作缠身，学无专一。因为自己长期在夏鼐先生还有其他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身边，所以对考古学史上的人和事很感兴趣，也写过一点不太像样的文章，去年凑成集子，即《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讲到近代考古学，特别是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后的研究，对这个标志，过去长时间是把1928年殷墟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时间。现在看起来，1921年安特生周口店和仰韶村的发掘以及1926年李济主持的夏县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很重要的标志。所以整个来讲，整个1920年代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年代，这样说是比较恰当的。”“过去关于考古学史的一些工作，往往就是罗列考古发现，缺乏对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这么多年来，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洪波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对田野工作方法的逐步改进做了很好的思考。最近几年，查晓英对北大从古物学到考古学的变化和活动也做了很好的梳理。这当中还有一本就是中山大学徐坚的《暗流》，他对于殷墟发展以外的一些田野考古工作，包括中研院史语所在安阳以外所做的发掘，乃至安阳、洛阳等地的盗掘出土古物的情况，以及对于田野考古以外的活动应该怎么样来对待，都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但是，哪些属于中国考古学史的范畴，哪些不属于中国考古学史的范畴，恐怕需要有一个界定。”“最

近这二十多年，中国考古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很大的发展，田野工作的技术条件、物质条件都已有很大的改善。文明起源的研究，早期的城址发现不止一处两处。考古队伍的素质也有很大变化。”“现在是全面铺开，特别是比较边远地区的发展尤其明显。还有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包括一些引进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个我们这七十年（按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三十年，这中间值得研究、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有很多。我们大家深入做好这个考古学史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考古学更加健全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我虽然今年83岁了，还应该为这方面尽点绵薄之力。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最近二十多年，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夏鼐先生遗稿、日记、文集的整理当中，最近几年还要继续做这项工作。”

6月23日上午，美国总统世界文化遗产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hausen）教授作主题发言。罗泰先生说：“王先生一开始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同意，写考古学史的应该懂考古，从外行的角度来写，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像记者想写我们重视的问题，往往会弄错。比如说李零教授最近的研究（按指《子弹库帛书》），在《纽约时报》上登了比较长的文章，里面竟然犯了七个大错误，而且不是没有提供资料给他。因为这个人不懂考古，不懂考古学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基本功。所以王先生这句话，我深深同意。但是我想加一句话，

就是说写考古学史而不是做考古，写考古学史就是写历史，而不是做考古。我们作为考古学家写考古学史，常带有一定的冒险。有一部分考古学家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他们当然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天天到坑里发掘或者搞科技考古，或者关心考古理论与方法的人，未必能够把考古学史的要点抓住。所以，这点我们还是需要历史学家帮我们的忙。……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帮助我们。中国考古学史，不止是中国考古学史。考古学史本身之所以重要——我们应该理解这点——王先生昨天表示的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尤其在中国，就是中国考古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这个意义非常大，要能表现很多不限于考古的重要的倾向。”“所以写考古学史，写中国1920年代以来的现代考古学史，都是大的历史重要的部分，可以从侧面给我们暴露出一些很要紧的方面。当然，这点我们早就有讨论。法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家，也就是社会人类学家，有一个观念说‘整面的社会事件’。意思是我们整个社会状况非常庞大，也非常复杂，我们研究一个社会，可以只抽出一个方面，仔细研究这个方面；而通过这个研究，则可以展开对整个社会的充分的理解。”“当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早就主张考古学史可以起这个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我觉得中国考古学史上包括中国考古的人类学研究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者——不是考古学家之间，而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考古材料。如果懂这个，懂有关

这个学术上的分歧，那样才可以真正地明白书里面所描述的社会现象。”

二、要点阐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李旻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源起：徐旭生与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李旻称，20世纪早期，许多学者的思想可以称为结合了现代学术思维、方法与传统文人关怀。但徐旭生先生（1888—1976）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他也对现当代中国考古学思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李零先生写于2017年的《帝繫，族姓的歷史還原》及《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6月的“寻找夏朝”系列文章，都以徐的事迹入题——这是对徐旭生遗产的致敬。他自己着眼于中国考古学这一先锋人物的生平和事业，讨论哪些思想影响了徐的考古研究与实践？徐的作为与思想又如何影响到了中国考古学思想？李旻认为：徐旭生是前现代的文化史与后现代之间的桥梁。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多元文化传统和中原中心三代王权政治版图之间的张力，传说时代多元架构对考古影响深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巍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谁是“殷遗民”？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认知史反思》。他在演讲中谈及自己对“商周分界”的新认识时表示：“近年来，陕西周原、周公庙等遗址商周之际考古遗存的新发现，使得陶器编年更加细化。雷兴山等学者提出高领袋足鬲等原先认为属先周时期的陶器，其下限或可进入西周。关中地区应以商文化（包括商式陶器和腰坑葬俗）的进入作为西周文化的开端。宝

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现，证实高领袋足鬲的下限可进入西周。沔西 H18 及三座‘先周’墓的年代很可能在西周初年，那么其腰坑和殉人葬俗应是受殷遗民影响。”此外，韩巍副教授还表示了个人对目下研究现状“过犹不及”的忧虑：“目前对‘殷遗民’的判断标准似有‘无限扩大’、过多、过细、过死的不良趋向。当某几项标准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以哪一项为‘首要标准’？例如有腰坑的高领袋足鬲墓，究竟是周人采用殷遗民葬俗，还是殷遗民采用周式陶器？不能满足于仅仅用差异来‘区分’殷遗民与周人，还应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究竟是被动接受的固有传统？还是可以随客观环境而变的主动选择？（借用人类学上的‘根基论’和‘工具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宝鸡斗鸡台发掘的特点与意义》。孙庆伟指出，斗鸡台位于宝鸡市东十里铺戴家湾村附近。遗址整体地形北依蟠龙源，南濒渭水，为东西向狭长的一块平缓坡地。中心区以戴家湾村为基准，由村北部自源坡南下的一条喇叭状冲沟界分为沟东、沟西两区。对于此遗址在考古学史上的典型意义，孙教授指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以及苏秉琦瓦鬲研究的关键意义就在于——‘首次为分析一类器物的谱系提供了范例，开创出谱系分析器物的方法，为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定了基础’。或者说，‘这实际是第一次系统运用现已日益广泛采用的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第一次‘根据遗迹、遗物（包括不同型、式）



罗泰教授

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查晓英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童恩正西南考古的参照系》。查晓英教授在演讲中称：“从事于西南地区研究而拥有全国性声誉的考古学家里，童恩正是突出的一例。自从1960年代步入考古学领域后，童恩正的研究对象不出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考古遗存，但其间风格变化，有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的转变。罗泰教授认为，四川地区的民族考古（ethnographic archaeology）传统影响颇深，童恩正是其代表之一。此外，童恩正也受到蒙文通等历史学者的影响。他在1980年代对多元观念的体会，很大程度上是受蒙文通著作的启发。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史多元论，是1980年代新多元论的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域外发达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也使童恩正不再专注于考古遗存与族属的对应关系，转向摸索‘体系化’的考古解



李零教授发言

释学。尽管其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这一转变，体现了 20 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的演讲题目是《陈万里与中国古陶瓷研究之转型》。刘朝晖教授指出，陈万里先生被誉为“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开辟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古陶瓷的新路。“虽然这已成为中国陶瓷研究史的常识，但对陈万里先生在陶瓷研究上的贡献，目前学界似乎还停留在概述阶段，并未有细致系统的分析与讨论。”他的演讲拟把古陶瓷研究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下来考察，以陈万里先生为个案，讨论古陶瓷如何走出鉴赏、走上现代科学研究的转型之路。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洪波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骆越考古：一个当代考古学史案例》。据史书记载，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南方百越民族中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岭南西部，即今天的广西和越南北部，现被认为是中国壮侗语民族及东南亚侗台语民族的祖先。陈洪波教授指出，从《逸周书》到《汉书》，文献中关于骆越的记载十分丰富，而以文献中记载的骆越直接与考古发现对应，体现出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思路。他指出：骆越考古的本质是“壮族探源”，为壮族的“民族身份”寻找“考古学文化”依据；应在现代各种需求之下开展骆越的考古研究，为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服务。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来国龙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夏鼐与中国现代考古发掘技术与考古报告撰写》。来国龙教授指出：“夏先生给我们的榜样精神就是职业精神，对学问的敬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对夏先生的认识，也是我们应该继承他的精神。第二点是现在在做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像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文物保护法，在同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夏先生在文物法制定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因为 1980 年代初的情况，当时文物法的原文里面，是有关于国家文物商品化的问题——我也跟王先生印证了一些——夏先生是动了九牛二虎之力，跟人争取把文物商品条例从法律里面抽出来，所以文物法的法律跟后来的执行条例是有矛盾的。法律没有提到商品化的问题，但是在条例里面有国

家文物商店。那时候已经有国家文物商店，有些文物是可以进出口的。如果这个是按照文物法做的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等于这个在法理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夏先生当时极力反对文物商品化，这也是世界上所有职业考古学家所反对的道路。比如说英国的考古学家就写过书、写过文章，他也非常强调作为考古的立场，文物是不能商品化的。……2002 年文物法修改后，完全偏离了夏先生坚持的道路，包括我们现在走的道路，都是背离了夏先生的意见，背离了包括我们很多职业考古学家的意见。2014 年文物新法更是这样。……这是社会问题，包括整个体制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这个行当里面工作人的应该提出来，文物收藏跟考古学研究的冲突关系大家应该认识到。我们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史语所的传统，李济、傅斯年的传统，夏先生也是受这个影响。所以 2016 年 5 月，我们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达成了共识，郑重宣言第五条遵守职业道德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不收藏文物，不参与文物的买卖，与盗掘和非法盗卖文物行为做坚决斗争，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这是夏先生的影响，在我们文物学界继续留下的。这个在考古学界从业人员里面，还是职业上面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苏荣誉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模”“范”的考古认识史》。苏教授的演讲，分如下七个部分：“原始模如何：涉及到器物设计（功能、艺术与工艺）”、“废弃范的功能（水平分范问题）”、“粉砂范材，如何粘结？”、

“纹饰形成？Pattern block 的出现在安阳还是侯马？”、“操作链与考古遗物的辨识、遗迹的解释”、“如何理解古代工业（组织、运转），如何组织工艺遗址发掘”，以及“如何理解艺术风格、工艺传统、工匠创造、技术选择与地方风格兴起”。苏教授称：“认识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学术史研究揭示这一过程，而范式（paradigm）转化是突破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为了继往开来，对于现在中国考古的黄金季节，尤有价值。青铜冶铸中的模范为案例。”并引李济先生 1964 年时的一段话说：“技术与艺术说起来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人工创造，实在只是同一精神活动的两面；最高的技术成就也代表最高的艺术境界。殷商时代的铸铜业，在技术方面所经过的实验与改进，大部分都反映在装饰的设计与安排。反过来说，好多图案及其构成分子的造詣与形成，都是为技术的新发明所启迪或由于技术的旧习惯所限制的。对于这一亲切的联系认明白了，我们对于古代装饰艺术所引起的若干神话，也就可以‘思过半矣’。根据神话而设计的装饰图案自然是有的，也许很多。但是，这一类图案的设计也要跟随着器物的形态转变，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器物形态或形制又要随时随地，依着制造技术的进步、保守或退化而改变。”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潜伟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考古科技史刍议及几点思考》。潜教授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科技与考古从统一到相对分离再到融合的过程。19 世纪上半叶，建立在地层学和类型学基础上的现代

考古学得到学界普遍认可而产生。从此，考古学就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区系文化类型等理论，自此，考古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色彩更浓厚了。当今考古学在大时空的框架下，与科技更加密不可分，更依赖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考古学已经成为综合运用各种先进科技手段和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并兼顾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交叉学科。

北大文研院项目负责人孟繁之的演讲题目是《一九五〇年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课程规划、目标培养及其他》。他在演讲中说：“诚如昨天诸位师长所谈到的，研究现代学术史，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不容易，禁忌多，忌讳也多。材料虽俯拾皆是，八卦、小道蜚短流长，但许多档案看不了（特别是限于组织和人事），‘视此虽近，貌若山河’，基本还算个禁区。大家是关注者多，真正研究者少。而且因为挨得近，许多现象、问题不容易看清，总会自觉不自觉‘因人依倚’，‘随人喜怒’。过去外间评论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说1949年后中国人文学术一片荒芜，只有考古一枝独秀，知识分子集体折腰，……我们许多年轻的一代也跟着这样认为，包括我自己。近十多年来，因为整理周叔弢先生的古籍题跋、批注、信札、日记及未刊手稿，附带同友人一起编辑《周一良编年事辑》，逐步注意到一个事情：以周一良先生，包括王力先生、傅懋勳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先生，在1950年代后，其个人学术经历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逐

步自觉或受组织指派、政治任务，转向所在学科的规划、创立、建设。如周一良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率先设立亚洲各国史课程，并成立了亚洲史教研室。一良先生毅然服从组织需要，放弃自己熟悉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佛学梵文研究，接受讲授亚洲史及日本史的任务，挑起了在新中国创立亚洲史新学科的重任。……这些先生的贡献，我们结合学科发展史回头去看，他们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一两本著作。”“1949年后，一切走向新的开始（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随着政治、制度的重新确立，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一切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研究1950年代以来的学科发展史，特别是人文学科发展史，必须坚持学校/院系、教师、同学‘三位一体’。要着眼于大时代、大背景下具体现象、具体人事分析，切忌孤立抽取。而且既要看到学校/院系层面为贯彻政策所进行的一切举措，如报告会、条令文件、思想动员、群众运动，也要看到教师因之的思想波动、前后言行、行事态度（如对院系和同学）、立场变化，更要看到同学逐步开始的，对院系、教师的思想变化、态度。此时开始，师生间势位互易，彼此态度，同之前已有很大变化。如1950年代的同学，称呼自己的老师有‘先生’、‘老师’、‘同志’之别，新‘话语体系’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是什么？需要思考。”“研究学术史，特别是关注、思考及从事1950年代以来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发展史研究，非‘了解之同情’，方不囿于俗说。”“从课程规划、目标培养及1958年‘大批判’时北大历史

学系特别是考古学专业师生的情况、所谈论内容，可以概见考古学这门学科在1950年代学生培养层面的大致状况。经过此反复，无疑为学科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如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等地方院校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和人才基础。在此之后，对于地方院校考古学学科建设及整个新中国考古学事业，便是‘即从巴峡穿巫峡，直下襄阳向洛阳’了！”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尤锐（Yuri Pines）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文本与考古的对话：以秦国历史为例》。尤锐教授说：“过去罗泰教授写‘*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Antiquity 1993)，批评中国考古学界过于重视历史文本。中国的考古学确实有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问题。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史学界（无论是文本学家、考古学家还是古文字学家）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司马迁主义’，过于依赖（甚至迷信）《史记》。对许多同仁而言，《史记》所记载的，就是事实。”“研究中国古代史，我们不得不依赖《史记》。然而，要注意的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或者资料内部的矛盾，《史记》的叙述有许多问题、矛盾、缺点等。我们要用出土的资料来弥补《史记》等传世文献的不足，有时甚至可以用新的资料彻底地改写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叙述。”“遵循各自独特的学科规律来分析三类资料（物质文明、出土文字以及传世文献）。在对各种不同的资料进行单独的分析之后，要尝试将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综合起来，重新了解原来的历史面貌。”“在许多方面（经济史、社

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物质资料比传世文献更可靠——要以其为主，以文献为辅。”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李建毛研究员的演讲题目是《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及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上的意义》。李馆长指出：“马王堆汉墓发掘，对当时及后世全国考古工作的影响，也就是王世民先生说的‘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大转折’。……马王堆汉墓对于考古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墓葬本身，即出土文物的珍贵性；二是墓葬结构及随葬品、女尸保存的完整性。并因有着准确的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成为了西汉初年历史文明的标杆。”并引李学勤先生的话说：“我一直这么说，重大的考古发现，应该是通过它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者一种文化的认识。并不是所有的墓都能做到这点的。从这个定义来说，马王堆汉墓无疑是一个重大发现。如果我们现在再发掘一个汉墓，可以发掘出很多很精美、很宝贵的东西，但是它在改变认识方面没有太多的帮助。那么，它也是比不上马王堆汉墓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使我们对于汉初考古的观念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所以，我觉得马王堆汉墓发现的意义应该说特别重大。”引王世民先生的话说：“从汉代的考古研究和古代遗址的研究来说，马王堆汉墓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它带动了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考古研究是件综合性的事情，考古学与多门学科都有关联。马王堆汉墓涉及的面那么广，涉及的学科那样多，由此大大地开阔了考古学界的眼界，



论坛现场

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大转折。”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涇涇子遗址——德国新疆探险的一桩往事》。王丁教授说：1902年至1914年，德国对新疆“丝绸之路”南北道古代遗址进行过四次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考查和发掘，当时出版的报告有 A. Gr ü n w e d e 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 ü n c h e n 1906)；A. von 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RAS*, 1909, pp. 299–322；A. v.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1913)。书中对各处工作过程有详略不一的叙述。此外，Le Coq 还

出版了探险记：*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n* (Leipzig 1926) 及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1928)。后一种书列出了一个考古探查大事表。“四次考察收获品有写本、印本文献、壁画、纺织品以及杂器物等，最初入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König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在入藏时给每件材料都编过目。”“基于上述材料，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Turfanforschung 研究所绘制了一幅文献发现地点 (Textfundstätten) 示意地图，刊布于科学院系列出版物 *Turfan-Brosch ü re* 分册 (2004/22007, S. 20–21)。”“以上的材料中，提到吐鲁番地区的遗址二十余个。其实，德国探险队还在一些小地点进行过工作。因为原始报告记录欠详，早期研究对有关发现品——有时数量也不多——的价值与意义缺乏足

够的认识，本文讨论的 Kindik 遗址就是一例。虽然发现品有部分公布出来，Le Coq 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提及，但更为重要的发现品却因误读原始记录，没有被归到该遗址名下。另外，笔者查阅到德国探险队档案中的该地点照片资料，结合伯希和日记、黄文弼日记对这个路经地点的描述和清代史料记载，可以基本确定该遗址所在范围。”王丁教授的结论有两点：应加强对德国方面的档案资料的重视和利用；这一遗址的再发现，对今后新疆的文物普查工作或将起到提示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张良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国际考古合作的新动向》。张教授称：“考古学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进入中国，很快就中国化，成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工具。1949 年以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仍然是我国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但我国考古学家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一方面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驱使，关心亚非拉国家的考古工作。1980 年代以后，我国与西方关系缓和。但是，我国考古学家不怎么关心外国考古，而集中精力解决我国各个区域的文化序列和文明起源问题。1990 年代以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考古学家来到我国，开展合作考古，带来了我国紧缺的经费以及新的理念和方法。这些新理念和新方法在 2009 年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了 2009 年版《田野考古规程》。这个规程经过国家文物局的强力推行，大大提高了我国考古学家的水平。到了世纪之交，我国经济腾飞，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国门，带着研究经费和工作能力到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考古工作。2012 年，我

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外国考古项目就像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但是，这种迅速发展外国考古项目一方面展现了我国考古界的实力，一方面暴露了我国考古界的一些问题。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已经练就了高超的田野工作技术，而 2009 年版《田野考古规程》的推行确实提高了我国考古学家的理念和资料采集能力；因此，我国考古学家在外国考古项目中注入了调查、发掘和保护并举的理念，同时带去了卓越的田野工作经验和钻探技术。但是，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考古学家刚刚走出去，尚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一是缺乏外国考古人才，目前我国考古学家大多只能用中文发表发掘资料，还没有能力在国际视野下利用这些资料，用外文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我国考古学科仍然只有中国考古专业，因此，急需建立外国考古专业。其二是外国考古项目需要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可以让考古学家长期从事外国考古，但是我国还没有这样的经费来源。现在的项目经费，大部分来自各个单位，但是这种来源不稳定，无法保障外国考古项目长期运行。”

三、点评与总结

6 月 22 日，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杨建华教授做点评与总结发言。杨教授说：“我谈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第一个是王世民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前辈，在考古学界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我记得王世民老师每年都要写当年一年的考古学大事记，这样一年一年下来，对于考古学的历史，他是最有发言

权的。他是非常详细地归纳而来。而且我特别赞同王世民先生讲的，现在的考古学史，1950年代之后是最关键的，但很少有人敢涉及。以前的社科立项几乎没有人敢去摘这个牌。1950年代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很多学者都还建在，这个事情实在不太好评。所以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应该是1950年代以后的考古学的发展。”“再一个对于刚才讲的分期，王世民先生也讲到了，应该从1979年考古学会成立，也就是从中国的政治情况看是‘拨乱反正’之后，这对各个学科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变化的时期。”“所以好的考古学家，不一定从本科就开始学习考古。那样的话他会容易被老师的观点束缚住。反而从外学科回来，然后进入到考古，会有外学科的思维丰富我们的考古学。”“最后，来国龙教授的演讲有关夏鼐先生，我对省略的部分是最感兴趣的，即发掘技术和考古学报告。张光直先生到我们学校讲学的时候，给我们念了一封回复夏鼐先生的信。……类型学划分有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发表资料必须分类。比如说一百个罐子不可能一百个都发，只有分类之后，每一个类就发一个——这是为了介绍资料类型学。还有一种是学术上的类型学，讲内在的发展，我们现在简报主要的要求是为了发表资料的类型学。”“现在关于考古学报告的发表，大家都处于一种困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在这方面做研究，以免报告出来给以后留下遗憾。比如像考古所大甸子报告，现在就要重新补充以前没有发的东西。也就是说，陶器不能按照类型学每个类型挑一件，实际上你认为一样，

别人看则不一样。这就等于考古学报告是给人家一块布料，自己进行裁剪，那样就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研究，因为考古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考古资料有重新发表的必要，当时的图、照片做得都不是特别好。”

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先生的总结发言被安排在论坛第二日，即本次菊生学术论坛临近结束之时。李先生说：“我觉得刚才好几位都谈到反省这段历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就是考古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西方给我们送来了考古学，也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我们送来了考古学。写考古学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这样的背景。特别是汉学家们经常批评的，我想在美国政治正确性里面批评‘民族主义’是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基本上‘民族主义’这个帽子一扣，就说明你很落后、很反动。我听允锐教授的报告里面也谈到很多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跟国家，尤其是近代国家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史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回顾考古学从哪里来。我比较多的工作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总觉得好像历史进步就是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越是以前的，大家就越不重视。我听王世民先生讲，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夏先生在考古研究，实际上对于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兼容并包的。其中，也包括金石学的研究。”“我觉得有一些考古学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原来考古学开过一个会，说与谁共享。现在大家觉得最应该共享的就是科技考古，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可以说

不是考古学家，但是穿白大褂考古，肯定是考古学家。所以它现在主要是向科技考古靠拢。其实在夏先生和苏先生还有张先生，他们经常纠结讨论的一些问题，也是美国考古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究竟是大家想说考古学是人文的，人文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这样的问题。”“无论强调是历史学的趋向还是人类学的趋向，这实际上因为牵扯到跟考古学的看法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夏先生对过程考古学持批评态度，而且他的那段话前面批判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就是史科学，所以夏先生先批评那个，完了就批评过程考古学。”“大家说过程考古学强调科学化，经常想到的科学化就是自然科学化，而不是社会科学化。其实可能更多的，我感觉国内的考古学可能大家比较重视的是说西方的田野方法是什么。相对来说，对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或者考古学理论，可能介绍的相对薄弱。当然夏先生认为可能美国的理论太‘花’了，但是俞伟超先生传递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他为中国建了考古的‘陆海空’三军，还引进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最后都扎根在中国。”“但是这里也牵扯到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体制问题，中国原来做民族学和人类学很多都是南方的学者，也就是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他们都是学人类学系的。而且，做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大家都是到那里去做，那方面有美国比较多的影响。但是在北方，原来的科学院民族学的这摊，也是抽调一些人组建的。包括

考古所两位很有名的学者，也是到了民族所，再从语言所抽出一些人到民族所。民族所成立的时候有民族史这摊，但是不能讲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解放以后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是不讲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原来有好几位很有名的学者，他们在民族所管他们叫民族理论，但是民族理论不是单独的一摊，所以他们也讲课。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虽然在学古文字，我也去听过杨堃先生的课。”“我觉得考古学史里头很重要的是‘文革’中的考古发现，像马王堆，基本上这些都成了几个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些都是在考古学史上奠基性的东西，和苏联对抗挖出来的，只要研究那段考古发现，都跟这个有关系，发掘者经常都是解放军。这对后来的考古学影响特别大。”

（撰稿：孟繁之 审校：来国龙）



10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历史



与会嘉宾合影

2018年6月30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历史”。本次会议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及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会议分为四场专题讨论。第一场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他首先介绍了论坛缘起。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

颖以《激进与保守：南丁格爾的双重性》为题，梳理了历来关于南丁格爾的诸多争议，试图对这位传奇女性做出客观和公证的评价。首先，她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以此为背景，讨论南丁格爾对护理行业与公共卫生改革所做的贡献。之后，她从婚姻观和价值观方面评析南丁格爾对女性主义事业的影响。最后，她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讨论南丁格爾观念中相对保守的一面如何影响护理行业职业化的进程。周颖副研究员认为，南丁格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既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然而，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以及朗费罗等主

流作家的描绘，她被简化为一个“提灯女神”的形象，而这又与中产阶级的淑女观相迎合。这种做法遮蔽了她的多元性，使她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高晓玲的发言题目为《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重点剖析“中产阶级”这一司空见惯却又具有模糊性与内在矛盾的概念。首先，它所诞生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所指涉的会员包括多个阶层；再者，学者们的划分标准极不统一；最后，它所呈现出来的含义非常多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词的使用也表现出一种矛盾性，尤其是中译本统一将它译为资产阶级，使该词在中文语境中更加混乱。基于此，高晓玲从概念产生、划分标准、概念界定、价值观以及地位和影响五个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对笛福、休谟、阿诺德、托克维尔等人的论述加以评析。她指出，中产阶级影响了19世纪的文化生活，是社会价值的承载者和时代的压舱石，使社会结构变得稳定，思想动荡得以平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联璧以《伦敦茶餐厅的兴起与女性书写空间的出现》为题，对茶餐厅的兴起过程做了简单的学术史回顾。她指出，茶餐厅与女性的联系非常密切，因为英国最早的饮茶活动由女性所主导，属于上流社会的雅致文化，而咖啡馆则是极具男性特色的消费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茶成为了英国人最爱饮用的饮料。一方面，是因为茶叶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源于茶餐厅的兴起。19世纪中期之前，女性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公共餐饮场所，然而随着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交通枢纽的出现，其产品和服务开始标准化，价格非常

低廉。其主要的目标群体是女性、游客和工人阶级，这便为开始书写自己的女性提供了自我发现的空间。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过，如爱玛·奥西兹（Emmuska Orczy）的《角落中的老人》、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朝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夜与日》和《雅各的房间》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暗藏杀机》等。

高峰枫教授随后进行评议。他指出，南丁格爾多才多艺，与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关系密切。然而，她在柏拉图全集的译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肖一之提到，充气面包公司茶餐厅在很多作品中有所提及，建议朱联璧老师增加一些例子。韩敏中教授提到中产阶级与 gentry 和 gentleman 的关系，认为其拥有大量土地，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却没有称号或封号。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徐曦指出，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直在变：很多界定者本身属于这个阶级，他们不仅需要强调自身与旧贵族的区别，还要防止底下阶层攀爬上来。北京大学日语系教师刘琳琳指出，中产阶级的译法可能源于日语的转译。

接下来，徐曦以《惩罚与观看：狄更斯笔下的死刑论述》为题作报告。他指出，狄更斯的多部小说中都有关于刑罚的描写，意大利游记中也记录过几次绞刑。公开行刑的目的原本是国家通过对罪犯的惩罚以儆效尤，传达道德教化，以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稳定。然而，如今它却成了一种狂欢化的表演，

悲观态度。乔修峰研究员认为，罗斯金并不主张人对风景的回归，而是现代社会隔离了人和自然，人一直在风景中，未曾离开。

随后，袁欣副教授则以《从互文性看罗塞蒂童话诗中的文化密码》为题，讨论了《小妖精的集市》等文学作品的独特内核。她概括了《集市》的主要情节，认为罗塞蒂在创作童话诗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编制了层层密码，巧妙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女诗人的重重限制，同时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主义思考，传达了超越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讯息。在对作品中的文化密码进行讨论时，袁欣副教授首先分析了小妖精形象的具体由来。她参考维多利亚时期民俗学家的意见，指出罗塞蒂如何精心运用小妖精的典故，通过互文性产生丰富的暗示，从而巧妙地探讨堕落女性这一在当时被视作禁忌的话题。同时，袁欣副教授提及《中洛辛郡的心脏》和《理智与情感》这两部作品，并与《集市》联系起来，讨论了它们处理姐妹关系时的高度雷同与微妙关联。

袁欣副教授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集市》放到十九世纪中期进行考察，并发现这篇童话回应了当时中产阶级热衷的有关女性堕落与贞洁的话题。1840年代开始，文艺界纷纷以堕落女性为题材进行创作，且一致地强调她们的“卑贱和肮脏”。袁欣副教授介绍，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贞节观建立在堕落女性卑微化和对理想女性神圣化的过程中，《集市》在思想上的超越之处恰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它既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也打破了理想女性与堕落女性的界限。

罗塞蒂在创作中抵制了同时期中产阶

级对理想女性非性欲化的要求，反映了女性成长的过程。从互文性的角度可以看出，罗塞蒂跟时代进行了平和又大胆的对话，通过《集市》消解了维多利亚时期中叶女性形象的二元对立，表现对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超越。袁欣副教授也指出，罗塞蒂所采用的多种互文策略（如改写、置换等）极大地丰富了诗歌内涵，揭示这些文化密码能使读者领会诗人的深意与诗歌的价值。

随后，黄淳副教授围绕长诗《吉普赛学者》中的隐藏情节和主题，分享了自己对其中秘术与信仰的研究。她简要介绍了作品情节，并对同一故事在诗歌和原著中的明显区别进行说明：通过整理诗歌的情节，人们会发现诗歌相当完整地复制了施展密术的环节。黄淳副教授认为，诗歌虽然对故事进行了复述，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地位和作用与原著不同。这位叙述者并非单纯的旁观者，还参与到互动关系当中，而我们能通过人称的转换和语气的递进看到人物之间心理距离的接近。对于作品中“密术”的意义问题，黄淳副教授指出，作为怀疑论者的作者并未延续教条主义的道路，而是从自然之处寻求真理。黄淳副教授认为，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并未局限在形而上或认识论的层面，还表达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关怀。人只有敢于质疑，深入探索，才能真正摆脱愚昧和纷争，于最高处寻求完美。就诗歌自身的诠释而言，作者更倾向于在偏见盛行、思想混沌的时代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理性主义。

徐颖副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圣战叙事和集体记忆》。该小说犹太情节中出现的希伯来精神被视为挽救的力量，艾略特用以色列的历史意义和它

坚定的记忆，对抗这个由权利和物质主义构成的社群。该作品叙述了英国情节对十字军圣战的历史想象，描写了犹太情节中十字军东征的集体意义，又最终回归东方与维多利亚语境中的朝圣。徐颖副教授认为，这部小说的产生背景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出现衰退的迹象，主流社会基督徒基于现实的精神需要，从记忆中挖掘并建构起圣战历史想象。

接下来，徐颖副教授列举小说的具体情节，分析作者是如何创造性地通过一个隐藏的犹太人角色对历史进行探索。书中突出了很多对十字军东征的集体记忆与犹太聚集区对比性的场景。随着人物犹太人身份被揭开，他作为局外人对这一民族的天生偏见逐渐转变成苦难者而非基督徒的崭新立场。徐颖副教授认为，艾略特如此安排情节的目的并非政治层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在文化上回溯犹太教和基督教一脉相承的希伯来精神——作为一种隐喻，以精神的朝圣来纪念鲜活的记忆。

高峰枫教授则以《雅弗的扩张》为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介绍了1857年印度叛乱的基本情况以及英国政府和宗教界的回应。为此，英国许多宗教场所举行了大规模的祷告和募款，伦敦地区教堂的悼词摘要也被刊登在报纸上。作为一次集体的情感宣泄，研究者能从中获得对英国宗教界的总体情况的大概了解。高峰枫教授选取了两篇来自小庙的布道词进行具体分析。这两篇布道词均使用《圣经》中雅弗扩张的典故解释了劫难发生的神学背景，并阐述欧洲诸国日益扩张具有正义性与神圣性的原因。此外，布道词还提到英国“要有仁爱精神的报复”，

剿灭叛乱分子、教化野蛮住民。

从这一典故出发，高峰枫教授回顾了“雅弗的扩张”故事的漫长的解释史。他简要概括了原文的具体情节，并列举了一些对此典故进行利用的具体案例，如美国奴隶制合法性讨论中对雅弗典故的应用，以及引用希腊罗马人征服巴基斯坦地区的史实、把这段经文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的解释。但高峰枫教授指出，把雅弗与西方扩张殖民联系起来、作地缘政治的解读并非普遍现象：专业学者或有特定神学倾向的宗教家一般不会进行这样与现实贴合的解读，反倒是与学术没有太大关联、力求与现实接轨的部分人更倾向于利用这些典故进行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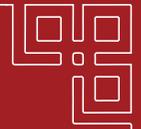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高峰枫教授就雅弗典故的人种学问题作进一步说明。而在回应有关《吉普赛学者》作者所体现的宗教理性化的问题时，黄淳副教授再次强调了作者在写作时具备的笛卡尔式的出发点，以及他通过理性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期望。肖一之老师也从科学概念变化与信仰问题的关系角度作补充，并点明当时科学话语和精神存在的独特联系。

（撰稿：郑春光 陈洁樱）





静园学术



蜀石经三题

2018年5月25日上午，“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蜀石经三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卢芳玉，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芑，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讲师方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楠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进行了学术史回顾。蜀石经既包括后蜀孟昶广政年间由蜀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十种，也包括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田况于益州州学主持刻毕的《公羊》《穀梁》二传，以及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主持镌刻、宣和六年终由彭慤完成的《孟子》。由此可见，蜀石经分为孟蜀石经、宋蜀石经两类，正处于写本时代向刊本时代过渡的节点之上，在经籍史中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北宋时期，蜀石经著录简略，大多是作为追述蜀学背景而出现的。进入南宋，相关著录、征引转盛，以蜀石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也正式出现，专著有晁公武《石经考异》及张《石经注文考异》。南宋著述中征引蜀石经的情况，或正、或反、或付之阙如。而宋人征引石经还存在含混、不确等



问题，故往往需要辨析。例如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董道所记“石经”，均不作具体说明，其实所引为汉石经，虞万里《董道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对此有详细论述。

元明时期，蜀石经原石不见著录，盖已亡佚。拓本流传度藏方面，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孙能传、张萱等编写《内阁藏书目录》时，内阁还存有整套蜀石经拓本。但与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相较，明内府收藏亦有阙损。而万历

三十五年（1607年）徐《石经左氏传跋》记录长兄徐燧旧藏蜀石经《左传》，联系万历三十三年内阁藏书已佚失二十九册《左传》拓本，似乎可以推测此本即内阁流出之副本。除此之外，官私书目中再难觅蜀石经痕迹。伴随原石亡佚、拓本绝少，这一阶段的蜀石经研究也在发生变化，时人著述罕有经眼所得，故讹误较多，由此可见耳食之学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也偶有得自亲见的记述，应予以重视。例如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府学诸刻今皆不存，便说明万历年间蜀石经已佚，据此可知原石的散亡与明末张献忠入蜀无关。

清初开始，明内府所藏一线单传的蜀石经拓本，较之元明已呈流散之势，但正因如此，乾嘉道咸时期的学者得以见到中秘典藏，故以考据为底色，晁公武之后的第二次深入考察也就此展开。而士人雅集的鉴赏活动与书贾求售的增值手段，均围绕残拓产生了大量题跋文字，推动了蜀石经研究。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王天然指出两宋、元明、清至民国三个阶段的学术演进清晰、各具特点，且总体上成果斐然。但也坦陈综观这段学术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蜀石经相关事实不清、文本性质不明、经籍史定位含混失当、缺乏形制探讨等。随后，主讲人围绕蜀石经“子遗综理”、“形制辨识”、“性质讨论”三题展开，回答了一系列疑难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视角、考察取向等作出了展望。

其一为蜀石经子遗综理。通过梳理可知，现存的蜀石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残拓（黄丕烈旧藏部分）、国家图书馆藏蜀石经残拓（刘体乾旧藏部分）、

近代所出蜀石经残石。因国家图书馆原拓暂时无法看到，主讲人以第一、第三部分为主进行讨论。关于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王天然从原拓的行款与字体、钤印情况、朱笔页号与卜煞符号、《毛诗》拓本与清人摹本、《周南》异文辑佚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关于近代所出蜀石经残石，则从残石的发现与递藏、大字与小字的文本特征、残石改刻现象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其二为蜀石经形制辨识。主讲人选取拓本、残石均有存世的《毛诗》为入口，在已知形制信息基础之上，另据传世拓本中所获原石编号，对蜀石经《毛诗》碑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原碑行数，通过对三处与原石布局直接相关的编号进行推算，王天然得出《毛诗》原碑一个编号内约容三十七行的结论，且指出三十七行之数也并非偶然，大概是参考唐开成石经一排约三十七行的结果。关于原碑布局方式，前人多以蜀石经为分排书刻，王天然认为这一判断难以成立并进行了论证。另据《仪礼》残石对上述结论加以检验，所得结果也未对该结论构成明显反证。随后，主讲人展示了《毛诗》整碑复原示意图，据此可以对蜀石经整碑全形有一直观感受，而蜀石经为帖式刻石，由此亦显然可见。本部分最后，还对蜀石经的具体度藏方法、帖式刻石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引申讨论。

其三为蜀石经性质讨论。主讲人首先对孟蜀石经的性质进行考察，大字方面依据唐石经而略有不同；小字方面，《毛诗》《周礼》二经注文具有明显的写本特征，与二者形成强烈对比《左传》注文则与刊本性质接近。通过进一步归纳孟蜀石经与不同刊本系统的异文情况，王天然认为毋昭裔主持镌石工作

的最后阶段很可能利用了五代国子监刊本。这一结论不但更新了以往对孟蜀石经性质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五代国子监刊本经书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样本。其次主讲人对宋蜀石经性质进行分析，指出宋蜀石经《公》《穀》二传不再如孟蜀石经之主体将大字、小字分用底本，而是直接以监本或属于监本系统者为底本。并通过多方论证，认为蜀石经《公羊》所用底本为蜀刻的可能性较大，《穀梁》底本亦属监本系统，而以理推之，二传同时刻石所用底本也应一致。另外，宋蜀石经《孟子》盖据北宋监本刻石，似可排除底本为蜀大字本。

讲座的最后部分为蜀石经研究展望。研究视角方面，因历代著录存在错谬亟待辩证，故应首先选取微观视角，重新审视蜀石经众多相关细节。但也同时注意引申，即根植于微观视角，以坚实的细节考订为基础，同时对书籍史中的若干宏观问题进行观察。如从蜀石经《毛诗》碑制复原，可引申至帖式刻石的意义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物质载体、技术发明、书籍制度等因素对经籍文本的固定、趋同产生的影响。又如从孟蜀石经、宋蜀石经的性质分析，可延展至二者经籍史坐标的确定。考察取向方面，应由传统善本观向关注经籍的形成历史转变，即跳出经传注文的是非优劣之争，转而关注经籍形成的客观历史线索。关注要点方面，主讲人提示以成都为重心的考古发掘、以四川为中心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应成为日后长期追踪的方向。

讨论环节，马楠副教授作出两点补充：第一，天成二年《佛说弥勒上生经》可为形制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石经碑版与传拓之外，五代两宋印本扩大了可供抄写的底本来

源，二者功能有类似之处。第二，王天然的相关考证成果具有进一步精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写时间的价值。卢芳玉副研究员认为蜀刻本刻工与蜀石经刊工之间的关系值得考察，并建议主讲人在后续研究中关注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拓本目录的公布。苏芑副教授以“願”字为例，提示字形的变化或许可以反映蜀石经的渊源，而蜀石经经注合刊的原因也值得思考。方韬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主讲人为何在校勘蜀石经时不直接使用单经注本；第二，蜀石经为经注合刊，由此经注便会随之产生互动，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双向的考虑。辛德勇教授赞扬了主讲人细致的研究工作，认为任何好的研究都建立在具体扎实的细节之上。并提示进一步考虑蜀石经刊刻特点，与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

随后，主讲人就与谈人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回答，并就提示作了进一步引申探讨。例如，根据相关证据认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完成的下限应在乾道六年之前；又如，说明了参校本选定的过程与考量；再如，举出蜀石经注文对经文产生影响的实例，认为此问题值得继续积累例证、加以详论。最后，主持人史睿副研究员作出总结，认为王天然的研究与以往的文献学研究已有较大不同，在文本之外，同时重视载体形制、碑石复原、工艺过程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特点使蜀石经研究达到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并重与平衡。

(撰稿：王梦倩)

全球史与万民法

2018年5月20日下午，“全球史与万民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召开。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讲师刘天骄，北京大学美国史专业博士生滕凯炜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讨会围绕波兰裔国际法学家亚历山大诺维奇的生平与著述展开。阿米蒂奇教授首先点明研究亚历山大诺维奇的

重要性：从各个方面看，他都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学者”，其宽广的视野与深邃的思想仍对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他也是一位被学界所遗忘的学者，其作品散落各处，不易寻觅。鉴于此，阿米蒂奇教授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一道收集和整理出亚历山大诺维奇的文稿，并于2017年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题名《全球史中的万民法》（*The Law of Nations in Global History*）。本次研讨会，阿米蒂奇教授大致从三方面入手讲述其人其作。

第一部分有关国际法研究的“历史



研讨会现场

转向”。通过几部重要文献，阿米蒂奇教授勾勒出西方国际法研究的最新趋向：去欧洲中心观、解构殖民主义以及将国际法理论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这些文献包括两部“牛津指南”系列作品，即《牛津国际法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和《牛津国际法理论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的经典论著《万民的温良教化：一部新国际法史》（*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1870–1960 和犹他大学教授安东尼·安吉（Antony T. Anghie）的《帝国主义、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形成》（*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尽管国际法的“历史转向”与全球史书写是近 20 年学术界兴起的潮流，但该路径已在 50、60 年代亚历山大诺维奇关于国际法史的写作中初现雏形。

第二部分为亚历山大诺维奇的生平简介。阿米蒂奇教授介绍道，亚历山大诺维奇于 1902 年出生在中欧的加利西亚地区（Galicia）。不久前，这个地方还诞生了两位闻名世界的法学家：赫什·劳特派特（Hersh Lauterpacht）与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甚至可以说，现代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法运动就是起源于加利西亚地区。1926 年，亚历山大诺维奇凭借其波兰婚姻法及其历史的研究获得加格罗林大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亚历山大诺维奇加入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主要负责金融方面的工作。1951 年，他应邀赴印度马德拉斯大学任教，而这也成为其

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在印度的十年间，亚历山大诺维奇创建的“马德拉斯学派”成为一支以印度法学家为主的重要学术力量。同时，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法律与宪政的作品，并出任尼赫鲁总理的法律顾问。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印度当地丰富的档案材料研究与揭示国际法在亚洲的历史实践，特别是在印度与欧洲之间。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他对国际法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1961 年，亚历山大诺维奇转赴悉尼大学任教，1967 年退休后回到伦敦定居，并于八年后去世。

第三部分有关亚历山大诺维奇的理论创见。阿米蒂奇教授指出，亚历山大诺维奇一生著述颇丰，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东印度群岛国际法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与《欧洲与非洲的对抗：关于协议制定的研究》（*The European-African Confrontation: A Study in Treaty Making*）。在国际法领域的很多方面，亚历山大诺维奇都作出了极具原创性的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从全球史的角度对 15 世纪至 20 世纪的国际法史作出了理论化的分期与区隔。根据阿米蒂奇教授的总结，亚历山大诺维奇首先否定了所谓现代国际秩序起源于 1648 年的“威斯特法利亚迷思”，而是将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作为“新旧”国际法及国际秩序的分界点。1815 年之前是“万民法”时代，其后是“国际法”时代。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就本质而言，前者具有自然法的特征，而后者是实证主义的；其二，就覆盖范围而言，前者是普世的，后者是欧洲的；其三，从文明、宗教与种族的立场来看，

前者是非歧视性、多元意识形态和平等的，后者是傲慢、单一意识形态与不平等的；其四，在相互关系的维度上，前者是水平的，后者是垂直的。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诺维奇论证，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史就是实证主义的国际法取代自然主义的万民法的过程，这一转变导致帝国构建与殖民扩张的“合法化”。进而，他清晰地揭示出欧洲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国际公法体系在本质上的殖民特性。

在这种问题意识的驱使下，亚历山大诺维奇将历史当作自己批判国际法史的理论工具，并试图通过史学探索发现欧洲国际法秩序的殖民和帝国语境，通过回溯到 1815 年之前的万民法传统解构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国际法观念。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下，亚历山大诺维奇通过跨区域、多中心、不同法律秩序互动视角下的研究，重新确立新的万民法传统。

在这种视角的关照下，阿米蒂奇教授重点讲述了亚历山大诺维奇的四个主要学术观点：其一，二战之后，亚洲国家觉醒，并未建立新的国家，而是重建以往的国家传统；其二，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对于早期近代国际法秩序的认识来自于欧洲对亚洲法的知识经验；其三，追溯了在欧洲实证国际法传统之前，欧亚文明和地区之间平等的条约关系的历史和实践；其四，挖掘了非洲的国际法传统。

最后，与会学者围绕亚历山大诺维奇对于亚洲是否存在“传教使命”意识、社会学对于帝国问题的研究、亚历山大诺维奇关于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亚历山大诺维奇在 19 世纪欧洲大陆公法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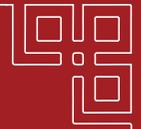
上和卡尔·施密特的观点异同等问题同阿米蒂奇教授进行深入讨论。

（撰稿：滕凯炜）





文研回望



文研院邀访学者项目第四期结束

随着北京大学2018年春季学期期末的到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项目也圆满结束。第四期邀访项目自2018年3月开始,至当年6月末结束,为期4个月,共邀请了19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北大访问、访学,来访学者研究专业覆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建筑史等各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

邀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特邀访问教授、访问教授和访问学者三部分。本学期,文研院先后邀请6位知名学者担任特邀访问教授,举行了一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和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

特邀访问教授



涂逸珊(Isenbike Togan)是国际知名的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内亚史、唐史、妇女史、丝绸之路历史等。访问期间,涂逸珊教授主讲了系列讲座“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性别文化构建与蒙古历史——一项关于性别的历时性研究”“纪念死者的方式”,并主持了三场史学工作坊。

约翰·基恩(John Keane)是悉尼大学和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民主与治理、语言学理论、公共生活中的宗教与世俗化等方面。访问期间,基恩教授主讲的系列讲座集中探讨了西方敌视政治的历史根基,分析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探讨反政治观点的若干局限,细致考察了20世纪的四篇经典文本——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27)、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娜迪亚·乌碧娜蒂《代议制民主:原则与谱系》(2006)。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是著名的思想史和国际史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邀访期间,阿米蒂奇教授主讲了四场系列讲座“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内战:观念中的历史”“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并参加文研院召开的“全球史与万民法”学术研讨会。

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专家,现为哈佛大学海洋史Gardiner讲座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经济、城乡区域关系、跨印度洋贸易研究以及印度的伦理话语、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邀访期间,鲍斯教授主讲了“欧洲之后的亚洲——一个大陆的衰落与崛起”“印度洋地区的帝国与国家”“古吉拉特和孟加拉之间——对甘地和苏巴斯·鲍斯之间关系的再解读”“一位多彩的世界主义者——亚洲和世界之中的泰戈尔”系列讲座;受邀参加“双一流”建设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并在会上发言。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驻访期间,郑振满教授主讲了“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六期“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碑铭解析”,组织并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五期“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共同组织读书班,带领北大历史学系、社会学系的学生阅读民间历史文献。

阿依莎·塞尔柱·艾姆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是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的创院院长。艾姆贝尔教授的研究方向涉及日本与土耳其及穆斯林世界关系史、泛亚细亚主义、土日关系以及土耳其亚洲研究的状态。访问期间,艾姆贝尔教授主讲了系列讲座“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年”“全球化与土耳其的亚洲研究”,参加了论坛“十九世纪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的看法”。此外,她还受邀参加“双一流”建设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并发言。





塔玛·加布(Tamar Garb),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系 Durning Lawrence 讲座教授。加布教授主要关注性别研究,以及 19 至 20 世纪早期法国艺术中的女性艺术家与身体观念等。此外,其研究还包括种族与表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文化与艺术,以及南非摄影史等。访问期间,加布教授主讲了系列讲座“影集与华服:进入非洲档案”“绘画/政治/摄影:马莱内·杜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女性图像”“策展的困境:面向非洲摄影档案的批判性介入”,集

合自身经历,回归到一个身处南非、欧洲及多元文化中的孩童视角。同时,她也关注那些有关自我与他者的摄影,观察它们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置入、运用和掌控,并随之产生出新的意义。此外,她还受邀参加“双一流”建设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并发言。

除特邀教授外,文研院每年设立若干驻访名额,海内外学者可经由自主申请并通过遴选的方式成为文研院的访问教授、学者,驻访时间一般为四个月。文研院根据学者提出的学术研究计划提供“量身定制”的学术支持和行政服务,打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使学者能够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沉淀思想,能够砥砺学问专心写作。文研院同时组织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使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增进交流,碰撞思想,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本学期共有 12 位邀请学者在文研院开展驻院研究。驻访期间,大家一方面静心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报告,一方面也参与、组织文研讲座、文研论坛、读书班等各类学术活动,彼此间从陌生到熟悉、相互切磋问道、结下深厚友谊的同时,也取得了学术交流的丰硕成果。此外,他们还广泛地参加北大相关院系的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为北大整体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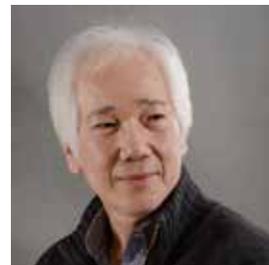
访问教授

杨建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外国考古学史、西亚两河流域史前考古、中国先秦北方与欧亚草原考古。驻访期间,杨建华教授受邀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承担了为第一届外国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西亚暨两河流域史前考古”课程;在文研院,以“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讲了“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七期“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参加了“菊生学术论坛”第九期“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并应邀主讲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学术讲座,完成了《东周时期内蒙古北方青铜器》一书的最终审稿和校对工作。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15 年退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驻访期间,孙歌教授以“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讲了“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一期“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一期“日俄战争、东北亚与世界近现代史的转折——《日俄战争》新书研讨会”,并开设读书班,与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轻学者共同研读沟口雄三著作。

赵刚,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运动、社会理论、社会变迁等。驻访期间,赵刚教授以“细读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讲了“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七期“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真 1960 年的一篇小说谈起”;联合新闻传播学院张慧瑜助理教授,组织陈映真小说系列读书会;应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邀,作名家学术系列讲座。



韩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现象学。发表作品有《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哲学与治术》(译著)等。在文研院驻访期间,韩潮教授以“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表学术报告,组织并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并应邀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自由与法权: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意义”学术研讨会。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与古文字。驻访期间,严志斌教授以“巴蜀符号探索”为题发表学术报告,组织召集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并担任主持人,参加了“北大文研读书”第七期“先秦城邑与社会”、第十一期“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建——《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新书研讨会”。



访问学者



罗念生与钱锺书为代表”。

张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学术、近四百年中西文学交流、林纾研究、钱锺书研究。驻访期间，张治副教授以“钱锺书与西方神秘主义诗学”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组织并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三期“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应邀主讲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讲座“杨绛/钱锺书的翻译：视野、风格与观念”“路吉阿诺斯在中国：以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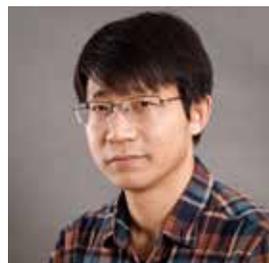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对地方（地域）社会文化史、民国学术史亦有兴趣。驻访期间，戴海斌副教授以“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完成了《晚清人物丛考》正、续两编的最终定稿及文字校订工作。



苏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左传》《史记》《玉篇》等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驻访期间，苏芑副教授以“从司马迁到张文虎——《史记》文本的转续与更迭”为题发表学术报告。



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时代的官僚制度史及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驻访期间，孙正军副教授以“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索”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一期“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北大文研读书”第十期“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读书会”。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领域大体在战国秦汉之间，主要关注早期文本、学术史、书籍与知识史等的相关问题。驻访期间，徐建委副教授以“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为题发表学术报告。

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成果包括对亨利·墨菲的一系列研究等，正在进行对50年代北京现代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研究。驻访期间，刘亦师以“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及其全球传播与实践”为题发表学术报告。



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关注其中政治思想的部分。驻访期间，高波以“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新运用”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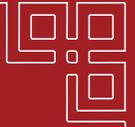


（本文于2018年7月5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2

2018-0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并在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的陪同下在临湖轩看望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代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参加本次会见并向总书记汇报相关工作情况。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新运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郑振满，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芑、徐建委、孙正军、刘亦师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三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9 世纪明治时代日本人眼中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伊斯坦布尔”。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荣休教授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评议。

03

2018-05

巴黎科研人文大学（PSL）国际事务主管副校长齐鹏思（Christopher Cripps）、亚洲合作总监王婧，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院长于贝尔·博斯特（Hubert

04

2018-05

Bost）到访文研院，并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讨未来合作事宜。

5 月 4 日至 6 日，2018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校长论坛在静园二院举办，31 位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校长及相关负责人出席本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本哈根大学。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田刚、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出席。

06

2018-05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太平洋上的中国天文系统？——使‘地’顺应于‘天’的南岛扩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戴木德（Frederick Damon）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并作评议。

07

2018-05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及区域国别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李昀到访文研院并与院务会成员交流。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洲之后的亚洲——一个大陆的衰落与崛起”。“大学堂”讲学计划特邀教授、哈佛大学海洋史 Gardiner 讲座教授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主讲。本次讲座是苏嘉塔·鲍斯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一场。

08

2018-05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郑振满，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张治、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印度洋地区的帝国与国家”。“大学堂”讲学计划特邀教授、哈佛大

09

2018-05

学海洋史 Gardiner 讲座教授苏嘉塔·鲍斯 (Sugata Bose) 主讲。本次讲座是苏嘉塔·鲍斯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二场。

文研院组织第四期邀请学者考察颐和园园林建筑。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国务院参事、原北京市园林局局长刘秀晨全程陪同并讲解。

10

2018-0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向文研院赠送全套 22 本《中国人类学评论》。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何少英一行访问文研院。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古吉拉特和孟加拉之间——对甘地和苏巴斯·鲍斯之间关系的再解读”。“大学堂”讲学计划特邀教授、哈佛大学海洋史 Gardiner 讲座教授苏嘉塔·鲍斯 (Sugata Bose) 主讲。本次讲座是苏嘉塔·鲍斯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三场。

12

2018-05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一位多彩的世界主义者——亚洲和世界之中的泰戈尔”。“大学堂”讲学计划特邀教授、哈佛大学海洋史 Gardiner 讲座教授苏嘉塔·鲍斯 (Sugata Bose) 主讲。本次讲座是苏嘉塔·鲍斯教授系列讲座的第四场。

14

2018-05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社会史角度看陕甘宁边区的起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

15

2018-05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三联书店编辑杨乐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艺术史图书出版事宜。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主持。

16

2018-05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 (第十次) 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杨建华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参与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出席。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五十三期中青班北大考察团一行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

17

2018-05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茶叙 (第四次) 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请学者杨建华、赵刚、韩潮、戴海斌、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出席。本次茶叙，韩潮老师谈“国家理性的图像学”，徐建委老师谈“王羲之的生活、思想与社交网络：基于王羲之书札的研究”。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李溪出席。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三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文研院特邀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福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杜正贞作题为“诉

18

2018-05

讼档案、民间文献与普通人的历史——龙泉档案研究的尝试”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刚评议。

2018年5月1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一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精神与图像——敦煌北魏二五四窟中的华夏美学”。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陈海涛博士主讲，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杨乐主持。

5月18日至24日，由文研院、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及顺德区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合力主办的“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顺德乡村振兴考察活动”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青田全面展开。三十余位学者先后考察青田、古朗、北水、逢简、马冈、碧江、龙江石龙里古建筑群，并观赏粤剧、顺德龙舟说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学者包括：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大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志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王铭铭、周飞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等。

20

2018-05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

“全球史与万民法”学术讨论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召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

21

2018-05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四场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22

2018-05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二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与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23

2018-05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芃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司马迁到张文虎——《史记》文本的转续与更迭”。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访问教授杨建华、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徐建委、张治、戴海斌、孙正军、高波、刘亦师参与讨论。

24

2018-05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作题为“托克维尔论权威与自由”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评议。

25

2018-05

“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蜀石经三题”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主持。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七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作引言。

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题为“欧洲一体化”的演讲，探讨欧盟的优势、风险、应对挑战的办法以及中欧关系等问题。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

26

2018-05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八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作引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27

2018-05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主持。

28

2018-05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韦伯之‘理念型’中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并作评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27）”。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29

2018-05

商务印书馆涵芳楼出版公司总经理王明毅率工作团队来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出版合作事宜。

30

2018-05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孙歌做主题报告，题目为“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郑振满，访问教授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参与讨论，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平，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幕唯仁（Viren Murthy）出席。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二场在廖凯原楼 207 宁肯教室举行，主题为“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一主持。

31

2018-05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彦晶作题为“知识的逻辑——从哲学到人工智能”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林作铨评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碑铭解析”。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作引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李建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同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副部长严军、部长助理谷雪讨论第 15 届北京论坛世界校长高峰论坛成果汇报方式及日后论坛模式的改革与发展事宜。

01

2018-06

文研院第二期邀请教授、鲁汶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高曼士回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交流，并向文研院赠送最新著作。

02

2018-06

“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作召集人。

03

2018-06

“文研读书”第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建——《甯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新书研讨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主持。

05

2018-06

“文科发展调研分组会议”在办公楼 103 室召开，讨论新体制机构评估与调整、运行情况与负责人任命与换届等议题。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新体制机构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近 30 人参加。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06

2018-06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郑振满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三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07

2018-06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茶叙（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请学者郑振满、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出席。本次茶叙，严志斌老师谈“说觚爵”，孙正军老师谈“中国古代官制研究范式的理论与实践”。

08

2018-06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四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娜迪亚·乌碧娜蒂，《代议制民主：原则与谱系》(2006)”。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马啸主持。

“静园雅集”第二十二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新变里的传统——大书《冷冰川》品读会”。著名艺术家冷冰川、设计师周晨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11

2018-06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教授王奇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程乐松到访文研院，并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 2019 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七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持。

12

2018-06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学的若干‘先天不足’——从陈映真 1960 年的一篇小说谈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刚主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张慧瑜主持。

13

2018-06

“‘双一流’视域下的全球布局——2018 北大清华国际合作工作交流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郦金梁分别率领双方部务会成员和相关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主题分享与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介绍了文研院的发展与国际合作情况。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党支部何峰一行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侯磊、蒋宇超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就筹办郑州大学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等事宜交流探讨。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康德哲学的批判之批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庆节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主持。

15

2018-06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月度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北京论坛、文研课程、传承系列活动后续规划等事宜展开讨论。院长邓小南、

19

2018-06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高峰枫、李猛、邢滔滔、张辉、叶炜、张亚光、周飞舟出席。

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茶叙（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请学者郑振满、杨建华、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苏芑、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出席。本次茶叙，郑振满老师、孙歌老师、赵刚老师就顺德乡村振兴考察活动谈自己的感受。

20

2018-06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

“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主持。

21

2018-06

“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持。

22

2018-06

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菊生学术论坛”第九期“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次菊生学术论坛系由北大文研院会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系为配合北大文研院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及北京大学人文学术学科发展史研究项目规划而举行。

“早期中国和突厥的遭遇”学术讨论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

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携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学院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文研院常务副校长渠敬东介绍文研院基本情况与展览概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师生代表近三十人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

24

2018-06

“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纪念死者的方式”。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咎涛主持。

25

2018-06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校领导，文科资深教授，博雅讲席教授，人文社科、经管与理学部负责人，文科相关院系和科研机构负责人，以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300 余人参加大会。院长邓小南汇报了文研院成立近两年来的发展情况。

26

2018-06

中央党校后备干部县委书记学习班一行三十余人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

“亚洲各地葬礼仪式研讨”学术讨论会在静园二院 201 会议室召开。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哈佛燕京学社、文研院合办的“玄学、儒学与佛学——北朝解经学的实践”主题工作坊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主持，文研院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华喆出席并参与会谈。

“回首我们的知识道路”研讨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作召集人，文研院访问学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评议。

27

2018-06

文研院学术委员、燕京学堂院长表明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传承”活动筹备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三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9 世纪明治时代日本人眼中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伊斯坦布尔”。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荣休教授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评议。

“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主持并作引言。

28

2018-06

“信仰、族群与艺术——中古佛教造像的演变”圆桌会议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召开。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主持。

29

2018-06

“《蒙古秘史》和《宝贝念珠》节选研讨”学术讨论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

30

2018-06

“菊生学术论坛”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历史”。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

04

2018-07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到访文研院，并与院务会成员讨论五四百周年纪念与文研院成立两周年相关活动事宜。

06

2018-07

文研院举办行政助理内部培训会。

12

2018-07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合办的“古典中国与古典建筑”主题论坛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论坛分为八个主题，以导论及自由讨论的形式展开，以期科学解读建筑中蕴含的丰富历史与人文信息。

